

CTO

印

论

字

句

5
1975

毛主席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理论学习 双月刊

一九七五年第五期 目录

·用《水浒》做反面教材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鲁迅论《水浒》 (4)

为反修防修评论《水浒》 长铁分局工人业余大学理论组 (5)

修正主义和投降派

——从反面教材《水浒》吸取教训 吉林铁路局工人理论组 (7)
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人理论组
吉林大学劲云戈写作组

从投降派宋江看林彪 吉林铁路局车辆段工人理论组 (12)

一个投降主义的反面教员

——剖析《水浒》中的宋江 肖善因 (16)

剥开宋江假面具 还其庐山真面目 河南安阳驻军 许长志 丁地树 (21)

孔孟的信徒 革命的叛徒

——宋江“反诗”剖视 刘耕路 (25)

改变革命路线就是叛卖革命 四平市植物油厂工人理论组 (29)
四平师院中文系理论组

跪着造反“终于是奴才”

——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 刘含涛 张正一 胡皓 易洪斌 (33)

英雄方腊和叛徒宋江

——兼谈反面教材《水浒》的出笼 史生 (39)

历史宣告了叛徒哲学的破产

——评《水浒》研究中的所谓“农民局限性” 金钟鸣 金恩暉 (43)

“双重性格”论就是美化叛徒 马清福 (48)

短文三篇 《水浒》投降主义的三部曲 丰满发电厂工人理论组 (50)

从李逵之死谈起 延边驻军 李智兵 刘世明 李俊民 (52)

宋江和武训是一丘之貉 李广鼐 (53)

· 学习理论 反修防修。

学理论抓路线促大干的辩证法 纪 哲 (55)

党的团结是争取胜利的基本条件

——学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胡东原 (58)

顾全大局义不容辞(通讯) 吉林化工学校政治理论组 (63)

· 批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谎言掩盖不了历史

——驳斥苏修诬蔑义和团和美化老沙皇的谬论 钟 锣 (66)

苏修的《中国近代史》和艾奇逊的“白皮书” 徐立亭 (73)

· 学一点政治经济学。

给人民公社社员讲点政治经济学(中)

..... 榆树县秀水公社治江大队理论组 (79)
吉林大学经济系教育革命小分队

附刊：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讲话稿)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

用《水浒》做反面教材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鲁迅论《水浒》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

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

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

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

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

第四卷，第一百二十三页)

为反修防修评论《水浒》

长春铁路分局工人业余大学评论组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阐明了评论《水浒》的重大意义，提出了在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是我国人民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对于我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一贯重视这方面的斗争。建国之初，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所宣扬的阶级投降主义的批判，对电影《清宫秘史》所宣扬的卖国主义即民族投降主义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所宣扬的唯心史观的批判。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们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当前，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过去，我们工人看过《水浒》这部书，总觉得不是味，感到很憋气。可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评论却说什么：《水浒》是“农民革命斗争的教科书”，宋江是“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指示，使我们心里亮堂了：《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宋江是一个搞修正主义的投降派。过去对《水浒》的美化和赞扬，是给投降派脸上贴金，是宣扬阶级调和论，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思想的表现。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对于这样重大的是非问题，是绝对不容许颠倒的，必须彻底弄清楚。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必将有力地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通过评论《水浒》，我们认识到：修正主义路线就是投降主义路线，修正主义者就是投降派。《水浒》这部书，歌颂了一条完整的投降主义路线，塑造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典型，贩卖了一整套投降主义哲学，实在是一部投降主义的“百科全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刘少奇、林彪一类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就是现代的投降派。他们对内向地主资产阶级投降，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投降，妄图把我国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搞民族投降主义。揭露和批判古代投降派宋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的丑恶嘴脸。同志们说：“宋江和林彪，两个叛徒，一副面孔，都是投降派”。通过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就会使我们学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各种问题，识别革命路线和错误路线的原

则界限，知道什么是投降派，就会进一步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评论《水浒》，总结历史经验，会使我们进一步认清“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个真理。梁山农民起义军的失败，是地主阶级野心家、阴谋家钻进革命队伍内部篡夺革命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宋江篡权前，梁山农民起义军在晁盖“共聚大义”、革命造反的路线指引下，兵强马壮，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了官军的围剿，出现了一派大好的革命形势。宋江一上梁山，就搞了一系列阴谋诡计，从晁盖手中篡夺了领导权，坐上了梁山的第一把交椅，便立即扯起了“替天行道”的黑旗，“修正”了农民起义造反的革命路线，公开抛出了“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的乞降纲领。使梁山农民起义军由盛而衰，走上了受“招安”的邪路。宋江投降朝廷后，更加凶相毕露，变成了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从这里可以看到，路线是决定一切的。路线对了，农民起义就发展，路线错了，农民起义就失败。而改变正确路线，又往往是从篡夺领导权开始的。我们今天评论《水浒》，就能够从中得到这些有益的启示，从而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更加自觉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防止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使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手里，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可以使我们认识到，要批判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就必须批判孔孟之道。有的工人说：孔孟之道是宋江搞投降的反动思想老根。这话说得对。《水浒》开卷第一回，就迫不及待地亮出了孔老二的“天命论”，说宋江搞投降主义的丑恶勾当，是在“天”的名义下进行的。用“天”来吓唬人，谁要是造反，谁就是“上逆天理”。为了扑灭农民起义的革命烈火，作者还从孔孟之道的垃圾堆里找出了“忠义”二字，向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比武力围剿更毒辣的思想武器。“忠义”究竟是什么货色？拆穿来看，“忠”，是不准反皇帝；“义”，是让李逵等人凡事“听哥哥的”，即听宋江的。宋江不正是在“忠义”的口号下，拉着梁山的农民起义军去投降的吗？最后落得个被斩除净尽的结果。这是十分沉痛的教训。现代投降派林彪，也是以孔老二的“天命论”做为他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思想基础。他抛出了“天才论”，做为反党的理论纲领，以“忠义”为旗号，拼凑了反革命小舰队，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我们批判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要和深入批判孔孟之道结合起来。评论《水浒》，必将把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引向深入，进一步肃清孔孟之道的流毒。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还会使我们认识到，只要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的危险仍然存在，就必然有投降与反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放弃斗争，就是屈膝投降，就要亡国亡党。我们必须坚决批判投降主义，提高革命警惕，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进一步落实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指示，夺取反帝反修斗争的新胜利。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可以使我们增强识别革命派和投降派、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大力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批判，积极投入批判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战斗，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

修 正 主 义 和 投 降 派

——从反面教材《水浒》吸取教训

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人理论组

吉林铁路局工人理论组

吉林大学劲云戈写作组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通观《水浒》，人们可以极其生动具体地看到：一个敌对阶级的代表人物，是怎样混入革命队伍，又是怎样“修正”革命路线，怎样把革命拉向投降道路的。

《水浒》所反映的时代，即北宋末年，封建制度已经没落腐朽，以宋徽宗为代表的封建王朝，极为反动、腐败、昏庸。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如同烈日焦土，空前尖锐。小说所描绘的山山寨寨“盗寇”烽起的局面，正是这种情况的歪曲反映。在这种形势下，一个是把斗争目标对准反动王朝，通过武装革命，推翻赵宋政权的统治；一个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让农民起义“归顺”皇帝，从而维护赵宋反动王朝。两条路线尖锐地摆在人们的面前。就是在这样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生死斗争的典型环境下，《水浒》这部书，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问题：在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反动阶级总是要推出自己的代表人物，混入革命队伍，修改革命路线，以便把革命引上投降道路。反动阶级的这一手，比他们的武力镇压往往还成效十倍。高俅的几十万官军征服不了的梁山英雄，在宋江之流的诱导下，软化了，变质了，泯灭了。

《水浒》的作者尽管把当时社会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贪官污吏的奸贼谗佞，极力混淆阶级界限，抹杀阶级冲突，但我们从字里行间也不难看出分明的阶级对立线条。“自幼读儒，长而通吏”，“仁义礼智信皆备”的宋江，一开始就把皇封世袭的大地主当作靠山，一遇人就表白自己的“忠君”思想和为封建朝廷效劳的决心。对这样一个儒学的化身，地主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代表，赵宋王朝的走狗和奴才，小说作者却以浓墨彩笔着力描绘和歌颂，把他刻画成“忠良”“仗义”的最高典范，把他说成是人世间的“救星”和“及时雨”，甚至说什么，不管是谁，只要听到宋江这个名字，“便下马推金山，倒玉柱地拜”。其实，宋江只不过是陷于灭顶之灾的赵宋王朝的一颗“救星”，是扑灭农民起义燎原烈火的“及时雨”。宋江的“忠”，正是忠于代表整个地主阶级的封建王朝，是“招安”投降路线的概括。宋江的“义”，是实现“招安”投降路线的手段。作者就是紧紧围绕“忠义”这个封建儒教的核心，大唱投降主义路线的赞歌的。以高俅、蔡京等人为代表的势力，是当时地主阶级中的专权派，也就是当权的豪强私门。他们不

仅同广大农民存在着尖锐的生死斗争，对起义农民实行武装镇压，他们与地主阶级中不当道的、不专权的在野派，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斗争。地主阶级中的两派，围绕这个当道与不当道、专权与不专权而展开的争权夺势的激烈斗争，就是宋江这一派地主阶级分子反贪官、不反皇帝，以“招安”农民起义为命，走上梁山的原因。宋江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是一个“恰如猛虎落荒丘，潜伏爪牙忍受”的野心家，他把“奸臣谗佞”看作是自己仕途升迁和实现“尽忠报国”志向的主要障碍。作者为烘托宋江的“忠义”，突出宋江投降路线的高明，也下笔写了一些“反天”的农民、渔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特别引人入胜的是，作者把李逵这个贫雇农的代表，紧紧贴在宋江身边，着意描画。一方面写了李逵的耿直、刚毅、勇敢，他与反动王朝誓不两立，要求斗争到底的革命精神；同时又使这个革命农民阶级的刚直不屈的典型代表，匍匐在封建儒教“义”这条软鞭子下面，虽曾几次反抗，但终未冲破宋江的思想束缚。这就是《水浒》作者向我们交代的：地主阶级内部两派和贫苦农民、渔民、其他下层人民的阶级关系。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水浒》作者，不可能写出一条完整的农民革命路线，也不可能写出代表这条路线的典型人物。“聚义”山寨，主持反叛，实行革命路线的晁盖，只是在一次莽闯中“归天及早”，作了一个空架子上的“天王”。尽管这样，我们从李逵、吴用和阮氏三兄弟这些被歪曲了的劳动农民、渔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的革命活动中，从梁山以外的其他起义军的斗争中，清楚地看到他们“撞破天罗，打开地网”，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正是他们代表了通过武装斗争砸碎反动王朝的革命路线。

宋江是怎样混进革命队伍，蓄意“修正”革命路线，并把革命队伍拉向投降道路的呢？

在《水浒》里，宋江一出场就是一个“疏财仗义”四海闻名的“天下义士”。这个封建制度的端懿诚信之徒，一方面是想让地主阶级特别是皇上，有朝一日明眼瞧见他的“忠肝”、“义胆”，把他扶上高官权势之位，使他能发挥“保国安民”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图谋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运动中，博得威望和地位，以便左右局面，借助东风送他上青云。所谓的宋江的矛盾性格，拆穿了不过如此而已。宋江在诚愿接受皇上法度惩罚而被发配江州时，在怨恨之中提笔写下的那首“反诗”，也是敌视农民革命运动的。他的“敢笑黄巢不丈夫”，实际上是对黄巢造反到底的革命路线的蔑视。“他时若遂凌云志”，是表明如果有朝一日他能够驾驭农民革命力量，就要干出一番与黄巢不同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于是，在百般波折之下，他终于上了梁山，并以“义士”身分被推举为头领。但是，他的上山，用他日后到东京时的自白可以看出，就是“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也就是要借助农民革命的力量，来实现其终身为封建朝廷效忠的宿愿，并使自己封官加爵，青史留名。正是从这个立脚点出发，上山后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修正”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开始，他一有机会就申诉自己“保国安民”的宗旨。对地主、豪强、战败被俘的官兵将领，他一见面就由衷地表述自己“替天行道”，将来归顺朝廷，尽忠保国的忠肝义胆。就是在他的“忠义”的感召下，一大批地主阶级分子和诰命军官混入梁山。他还以晁盖是一山之主为藉口，排斥晁盖于军事、政治斗争之外，把晁盖架空起来。宋江在作者笔下成为一个具有军事政治谋略和组织才

干的首领。就是这个宋江，在梁山农民起义首领晁盖一死，就趁机跳出来大刀阔斧地篡改农民革命路线，另立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他在晁盖死后不久的一次集会上公然打起了“替天行道”的白旗，并且当众宣布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宋江的“忠义”、“替天行道”，同以晁盖为代表的梁山广大起义军的“聚义”造反、“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这是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按照农民的朴素思想，农民起义的最低要求是“论称分银两，成套穿衣裳”，即均贫富；最高要求就是李逵所说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即推翻旧政权，建立农民自己的新政权。当时在南方占有半壁河山的方腊起义，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河北的田虎，江淮的王庆，皆自霸称王，改建年号，他们的目标都是要推翻反动的赵宋王朝。这也就是晁盖上梁山被推为首领后所表述的“共聚大义”的目的和含义！宋江改“聚义”为“忠义”，虽是一字之差，但这一“修正”却使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农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推翻封建王朝。宋江正是从这一点上作了根本的“修正”。反“天子”变成了保“天子”，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变成了为个人和小集团谋利益，革命被取消了。从此以后，一切“义举”、“义行”都要服从“忠君”、“保国”这个总目标了。为了使宋江这条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合法化，小说作者又以天降石碣上书“替天行道”“忠义双全”八个大字和一百〇八人皆属星宿下凡的名次排列，把宋江的这条路线纳入“天命论”，给它蒙上一层神秘的彩色，使之更具有欺骗性。因此，宋江便借天之命，挂上了“忠义堂”的牌额，立起了“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并且要求梁山英雄对天盟誓：“各无异心”、“一同保国安民”，于是，农民革命的“反天命”，变成了“畏天命”，这是思想路线上“修正”。就是在这一系列的巧妙安排之下，宋江在菊花会上唱出了“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心曲。宋江的这种无耻作为，立即遭到了以李逵为代表的革命派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宋江趁机对持不同意见的革命者进行了镇压。这就造成了梁山起义军第一次大分裂。事实证明，要搞修正主义，要投降变节，就要搞阴谋诡计，就要搞分裂。

宋江为了在起义军内建立使投降路线得以推行的阶级基础，也“修正”了农民起义的组织路线。他大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在“替天行道”“归顺皇上”的统一纲领下，他把大地主柴进、李应、穆弘、等，以及呼延灼、关胜等一大批诰命军官，拉进了山寨，并且全都排在领导集团的前列。这一幕的最高潮，是宋江不惜一切代价地把河北大名府头号大地主卢俊义搬上梁山，并让他坐了第二把交椅。梁山起义军的成分变了。“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实际上是让地主阶级篡夺了领导权，溶合了农民革命力量。就是在以宋江为头子的一批地主阶级分子掌握了山寨领导权的情况下，宋江的投降路线才得以贯彻。从此以后，梁山起义军的一切英勇威武的战斗，都只不过是为宋江一伙的投降“招安”创造条件而已。

投降必须修改革命路线，修改革命路线最后是为了投降，这是一个统一的问题，统一的过程。所以，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在完成了修改路线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工作之后，就着手实行他的接受“招安”的投降步骤。为此，他竟不择手段，不惜拜倒在农民起义军的死敌、被农民起义军俘获的高俅面前，乞求他向皇上转告自己对朝廷的忠心；他还急不可耐，亲自跑到受皇上恩宠的妓女李师师那里，渴望她能把自己的义、

忠肝胆禀告皇上；他又不惜以重金贿赂皇帝的近臣、殿前太尉宿元景，直接沟通皇上，打开投降招安的道路。最后终于通过这两个渠道，实现了他的罪恶目的。一个剿不灭、打不垮的农们起义军自动放下武器，向反动王朝感恩谢罪，一场震天动地的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偃旗息鼓，自消自灭了。本来是摧毁反动王朝的农民革命军变成了支撑腐朽反动王朝的支柱，并且调转枪口，完全不顾什么“仁义礼智”地、残酷地平定了那些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原来官军无法平定的，已经燃成燎原大火的田虎、王庆、方腊的起义，也只靠宋江这支“替天行道”、接受招安的“忠义”之军去消灭了。《水浒》在最后把宋江同方腊作了一个对比：“宋江重赏陞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这是对修正主义者、投降派、叛徒的肮脏的赞美。

有人说：《水浒》最后让宋江饮了放进毒药的御酒而死，这是对宋江投降主义的最后否定。这种说法是十分荒诞的。其实，按照《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统一思想，作者在最末一回，苦作匠心毒谋愈肆地作了巧妙的安排：得了重赏，封爵陞官，锦衣还乡的宋江，最后被奸臣谗佞残害了。宋江在这个时候，仍坚守“忠义”二字。高俅与宋江，一个乱臣贼子，一个忠臣贤良，这是作者进一步建树宋江这个形象的得意的最后一笔。宋江为了对反动王朝做到“忠烈义济”，临死之前硬把李逵拉来与他同归于尽。这不仅是宋江向以赵宋王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报以最大的“忠义”，也是宋江对农民革命的最彻底的扼杀。从《水浒》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梁山起义军中，“造反”还是“投降”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贯彻始终的。直到最后，在宋江饮了毒酒找来李逵时，李逵大叫一声：“哥哥反了罢”！李逵这种至死不变的“反骨”，是宋江最害怕的。宋江在蒙骗李逵也吞下毒酒之后，披肝沥胆地说：“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一句话，就是不准造反，只能投降！这是宋江一生政治生涯的总结。一付投降派的丑脸，历历在目。以宋江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和李逵为代表的农民阶级，是誓不两立、不共戴天的。李逵死后，徽宗皇帝在梦里遇见李逵的鬼魂，抡起板斧就要报仇，吓了皇帝一身冷汗。作者有意刻画的农民反叛烈焰，皇帝、高俅扑不灭，只有修正主义“及时雨”宋江，能够降伏。在宋江“忠义”的欺骗下，李逵受骗身死之前竟称道：“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鬼”。最后，作者让“至明至圣”的皇帝出场了。他大骂高俅、杨戬：“败国奸臣，坏寡人天下！”天下的一切灾难的根源，都只不过是几个乱臣贼子而已。“煞咷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今后的任务仍然是皇帝保“忠良”，“忠良”保皇帝，大家都在打倒“贪官”的旗号下，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吧！可是我们在这里还看到：宋江对于奸臣的陷害能够百般地忍受，因为他们之间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相反，宋江对农民起义军，对农民革命者却是那样的狠毒残忍。宋江的反“贪官”到终了只不过是一个幌子，扼杀农民起义才是他的真正本意。对敌人的“忠良”，对人民则是刽子手！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满怀义愤地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修正主义的危险。我们也很自然地在头脑里浮现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接受蒋介石“招安”的陈独秀；抗日战争烽火中要把革命领导权拱手交给蒋介石，最后叛国投修的王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在长沙接受反动军阀的“四书”和“授命”，抗日战争胜利后要党放下武器到蒋介石政府中去做官的刘少奇；还有那吹捧蒋介石为“领袖”，在革命队伍“勉从虎穴

暂栖身”，最后叛国投修的林彪。他们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是在人民革命高潮中抱着另一种政治目的和个人野心，混进革命队伍的。他们又都是搞修正主义的投降派，在国内投降地主资产阶级，在国外投降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近百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修正主义就是投降主义。第二国际的叛徒考茨基适应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背叛无产阶级，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革命，搞修正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路线，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引上了阶级投降的道路。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苏联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搞民族投降主义，对内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压力，搞阶级投降主义，全面“修正”了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用修正主义代替马列主义，把列宁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从苏联变修的沉痛教训中，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到领导权和路线的重要性，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修正主义上台，是必然要向资本主义投降，复辟资本主义的。因此，二十几年来，我们一直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中国能否避免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道路，中国能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必须避免，也是可能避免的，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办法主要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批判修正主义，坚持反对投降主义，就是搞群众运动，使人民都知道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投降派。

《水浒》这部反映修正主义投降派的形象化的反面教材，它可以帮助人们去洞察那些搞修正主义的投降派。《水浒》作者用尽气力为修正主义投降派唱的一曲“赞歌”，今天却变成了对修正主义投降派的一曲“挽歌”。

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正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国内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国外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时刻都在窥测方向，阴谋在我们党内培植他们的代表人物，以便在适当时机，出来修改党的路线，把革命拉向投降道路。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随时识破他们的阴谋。这是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的重大战斗任务。

从投降派宋江看林彪

吉林铁路局车辆段工人理论组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里极力宣扬的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头子宋江，打着“造反”旗号，干着投降叛变的勾当，是个断送农民起义革命成果的古代投降派；资产阶级野心家、大叛徒、卖国贼林彪，大搞阴谋诡计，疯狂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内屈服地主、资产阶级，对外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个地地道道的现代投降派。

无论是古代投降派，还是现代投降派，都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蛀虫，是埋藏在革命堡垒内部的定时炸弹，是反动统治阶级的走狗和奴才。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林彪的丑恶面目。分析一下古代投降派和现代投降派的共同特点，可以使我们认清什么是革命派，什么是投降派，什么是革命路线，什么是投降路线。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一切投降派，他们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搞民族投降，都要推行一条反革命政治路线，宋江的政治路线，就是投降主义路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替天行道”。他所说的“天”，就是宋朝天子，他所说的“道”，就是孔孟之道。“替天行道”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是替封建帝王行孔孟之道。在封建国家里，皇帝是最高统治者，是一切贪官的总后台，是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总祸根，反贪官必须反皇帝，不反皇帝，就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不反皇帝，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就不能彻底解放。宋江扯起“替天行道”的破旗，就是要从内部瓦解农民起义队伍，替宋徽宗的封建王朝效劳。

历史上的一切投降派都懂得，他们搞投降，必然有人反投降，要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必须首先篡夺领导权。宋江上梁山后，便以哥们义气拢络人，为夺权做准备，当晁盖中箭受伤后，宋江便认为夺权时机已到，表面上跑前跑后，挤眼抹泪的假献殷勤，但内心里却是幸灾乐祸，暗藏杀机。他的险恶用心，晁盖有所察觉，在晁盖看来，宋江根本不是一块好料，对他一百个不放心，所以在牺牲之前，他当众公开宣布：“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晁盖的这一嘱托，并不是出自个人恩怨，主要是防止宋江篡权，所以他明确规定，梁山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只能由斗争坚决、作战勇敢、坚持

造反路线的人来领导。但宋江心怀鬼胎，大搞阴谋，晁盖一死，他就以“国一日不可无君，家一日不可无主”为理由，急急忙忙坐上了梁山泊的第一把交椅，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宋江篡权以后，迫不及待地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用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代替了晁盖的农民起义路线。最后，他不顾李逵等人的坚决反对，接受了朝廷招安，把农民起义军引向了失败道路。

古代投降派是现代投降派的样板和祖师爷。林彪为了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他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克己复礼”。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林彪和他的死党连续写下了四条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复礼”就是复辟。林彪拼命鼓吹“克己复礼”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让我们劳动人民重受二遍苦，重遭二茬罪，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同宋江一样，林彪为了推行他的亡党卖国的政治路线，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大搞阴谋诡计。他公开鼓吹，“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念念不忘“权、权、权”，而当某些权力暂时拿到手，他就认为时机已到，得意忘形，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咬牙切齿地要对革命人民下毒手，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

宋江和林彪虽然相隔八百年，但他们是一对情投意合的难兄难弟，一个要“替天行道”一个要“克己复礼”，一个是“借得山东烟水寨”，一个是“勉从虎穴暂栖身”，吹的都是投降号，唱的都是复辟调，耍的都是两面派，用的都是韬晦计，真是柳条串王八——一个枝上的货。

二

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排斥、打击革命派，分裂革命队伍，这一切投降派搞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

宋江混进梁山起义军之后，利用窃取的领导权，千方百计排斥、架空晁盖的领导。晁盖牺牲以后，他为了扫除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障碍，对抵制这条错误路线的革命派，进行公开打击，暗中陷害。宋江在临死前，唯恐李逵这样的人“再去啸聚山林”，亲自用药酒把李逵毒死，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刽子手凶相。

宋江对起义军内部的革命派是这样，而对宋王朝的残兵败将却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为了网罗朝廷将领，组织一支反革命队伍，宋江刚篡权不久，就一心要“赚河北卢俊义上山”入伙。卢俊义本是河北有“海阔一个家业”的大豪富，他对农民起义军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恶狠狠地表示要使梁山泊“人人皆死，个个不留”。这样一个人，竟被宋江请上山来，坐了第二把交椅。每当梁山起义军俘获朝廷将领时，宋江不问其罪恶，不顾起义军的义愤，一律“亲解其缚，扶入帐中，纳头便拜”，“委以重任”。宋江用这一套办法，网罗了大批的朝廷降将，并安排他们做了起义军的上层领导，改变了晁盖领导的起义军的路线和阶级成份。由于梁山起义军的上层领导权被那些“身在梁山，心在朝廷”的阶级异己分子所把持，宋江的投降路线就有了推行的基础，所以在菊花会

上展开的招安与反招安的两条路线的激裂斗争中，革命派受了压抑，而使鼓吹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占了上风。宋江的这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直接为其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服务，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

林彪和宋江所处时代虽然不同，出于叛变、投降的需要，他们的组织路线却是一样的。林彪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公开叫嚷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分裂我党、我军，大搞中央首长的黑材料，利用造谣中伤，栽赃陷害的卑鄙手法，排斥异己、打击革命老干部。表现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极度仇视。相反，他们对一小撮叛徒、反革命分子却爱护备至，又是吹捧又是照象，封官加委，到处安插，形成了一条为其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

三

古代投降派宋江和现代投降派林彪，不仅有相同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还有相同的思想路线。他们都把孔孟之道做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

宋江出身于地主家庭，是豪门富户的子弟。“自幼学儒”，“曾攻经史”，满脑子是孔老二唯心主义的秕糠。他张口一个“忠”字，闭口一个“义”字，他是忠于农民起义军吗？否。他忠的是大宋皇帝，“义”是为了达到“忠”的一种手段。你看他，在呼延灼抓住了官军将领关胜之后，非但不杀，反而亲自松绑，并把关胜扶在正中交椅上，叩首伏罪，丑态百出，表尽了“义重如山”。但是“义气”的假象丝毫不能遮掩宋江忠于皇帝的反动本质和卑劣行径。在义气的后面是不义。我们不会忘记，李逵是他歃血盟誓的“哥兄弟”，可是在李逵怒斥“招安，招安，招甚鸟安”的投降主义时，宋江却反脸不认兄弟，下令将李逵“斩讫报来”，他义气跑到哪里去了呢？可见他的义气是限制在“忠”于皇帝的范围内，只要一超出这个范围，他就凶相毕露，不讲“义”了。

宋江为受招安，大肆鼓吹孔孟之道，用所谓的“忠义”迷惑农民起义军。做为新老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林彪，也是乞灵于孔老二，到处兜售“德”、“仁义”、“忠恕”的破烂货欺骗人民。

林彪鼓吹的“德”是什么呢？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正当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林彪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大书“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为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叫屈，妄图把阶级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大造反革命舆论。这种论调无非是说无产阶级专政过火了，镇压的太利害了。“德”是有阶级性的，我们只要看看林彪这伙反党集团所炮制的《571工程纪要》中闪现的刀光剑影，便可知他们讲的“德”，就是屠杀革命人民的黄世仁和南霸天的“德”，就是宋江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德”。

林彪还叫嚷什么“仁义”、“忠恕”，和宋江的“忠义双全”的陈词滥调如出一辙。宋江“忠”的是剥削、压迫人民的大宋王朝。林彪“忠”的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想当儿皇帝。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把宋江和林彪加以比较，就会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一切投降派都是在政治上搞投机，在组织上搞分裂，在思想上搞欺骗，借革命人民的力量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他们的反革命道路证明：一切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而搞投降，只能走向失败，走向灭亡。宋江喝了他一生孝忠的皇帝的御赐药酒可耻地死了，林彪也毫不例外，在温都尔汗被摔得粉身碎骨。他们的下场是同样可悲的。

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起的是公开的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这一教训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鲁迅说：“古人可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贵的，因为他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益处。”批判、揭露投降派的真面目，认清它的反动本质，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可以帮助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要进一步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识别投降派，警惕投降派，打击投降派，把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上接第20页）

《水浒》中美化宋江的“义”，也是从属于他的忠君思想，都是儒家宣扬的封建伦理道德。孔老二叫嚷“君子义以为质”。又说：“君子有勇而无义成乱，中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就是说，如果不把“义”这一原则看得高于一切，就会出现犯上作乱和造反。所以儒家鼓吹的“义”目的就是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秩序：在统治阶级内部保持等级制度；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就是防止造反。宋江所表现的“义”正是这样。他广为结纳江湖好汉，是为向上爬尽忠皇上创造条件；至于小说写的周济阎婆、唐牛儿及王公等市井小民，也只是宋江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对劳动人民的一种“施舍”，小恩小惠，笼络人心。被一些人称道的“私放晁盖”也并没有超出宋江的忠君思想。宋江放走晁盖，完全出于私谊。他只是希望晁盖远走避难，保全性命。根本就没有想到晁盖会高举义旗“大弄”。这从宋江后来见到梁山“谋反”公文以后的表现可以反证。宋江想：“晁盖等众人，不想做下这般大事，犯了大罪……如此之罪，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可见宋江对晁盖的“大弄”是深感意外的。他完全是从维护封建王法和忠君的立场，来诽谤义军。暴露了他反对农民义军的真面目。

从宋江这个古代投降派身上，又见到了古今投降派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他们都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虔诚地奉行孔孟之道，并且靠这些历史的垃圾为思想基础去搞投降。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不正是如此吗？

从以上剖析可见，宋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一个推行投降路线的反面教员。但是，真正发挥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就必须运用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揭露它的本质，肃清它的流毒，从而使人民从古代投降派身上，去认识现代投降派的丑恶嘴脸。毒草不锄掉不会变成肥料，对于反面教员也只有不断揭露它、批判它，才能真正利用它。

一个投降主义的反面教员

——剖析《水浒》中的宋江

肖 善 因

“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水浒》中的主角宋江，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全书一百二十回，从第十八回“私放晁天王”到最后回“神聚蓼儿洼”，大部分章回中提到他。其中五十多回的回目有宋江的名字；描写宋江活动的篇幅也较多。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反面材料。作者是通过美化歌颂这个主要人物，来宣扬投降路线的。我们今天可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也就是运用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剖析这个古代投降派，以古鉴今，提高识别现代投降派的能力。

要投降，势必要搞修正主义。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正是从篡夺领导权、修正晁盖为首的梁山义军革命路线开始的。

宋江出身于地主家庭，原是山东郓城县的一个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他满脑袋忠义思想，一心只想往上爬。但在贪官污吏当道的官府里，个人野心很难实现，于是就广为结交江湖好汉，“若高若低，无有不纳”，妄图以此笼络人心，为自己往上爬创造有利条件。他上梁山，完全出于无奈。前两次上山都中途溜走，就可说明。后来，杀了阎婆惜，当了囚徒，刺配江州，梁山英雄劫了法场，州郡申报朝廷，宋江无路可走，又不甘引颈就诛的情况下，才说出“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的话来。但是，他人虽上了梁山，心却在赵宋王朝。所谓“权借水泊，暂时避难”，就是说在梁山是暂时的，心里想的还是招安。在他上山不久，积极支持宋江搞投降的戴宗在招来石秀上山时，便泄露了宋江的“天机”。戴宗不仅用有吃有穿来引诱石秀，而且告诉石秀说：“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入伙……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后来，宋江见着降官、降将彭玘、呼延灼、徐宁等人，都反复地唠叨：“只待圣主宽恩”、“专等招安”的话。“招安”成了宋江的口头禅。招安就可以当官，当官就可以“青史留名”，“光宗耀祖”。这就赤裸裸地把宋江上山就是为招安，招安就可以当官的思想说清楚了。

在宋江上山以前，晁盖是梁山泊的领袖。他虽出身“富户”，但背叛了本阶级。“智

“取生辰纲”是他串连吴用、三阮等七人，最先点燃了起义的烈火。上梁山后，和众英雄“竭力同心，共聚大义”，用人唯贤，赏罚分明。他不仅“整点仓库，修理寨栅，打造军器”，“准备迎敌官军”，而且多次打击了进犯敌人，稳定了根据地的局面。正象他手下的朱贵所说：“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一从火并归新主，会见梁山事业新”。就是说，他还要不断发展梁山泊起义大好形势。这个人物在现有的宋元话本《大宋宣和遗事里》还是三十六人之内的。但是，《水浒》的作者出于鼓吹投降的需要，“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有意架空晁盖。宋江上了山，名义是坐第二把交椅，却拼命抓权。三打祝家庄、打高唐州，打华州，都由宋江领兵上阵，为自己捞取资本。在这同时，他又大肆网罗降将，为夺权作好准备。作者还有意写晁盖及早中箭身死，好让“尽忠报国”的宋江“把寨为头”。晁盖一死，宋江认为时机已到，在作了一番假意谦让之后，“权居主位，坐了第一把交椅”，完全窃据了义军的领导权，从此便毫无顾忌地“修正”晁盖的革命路线。

首先，他“修正”了政治路线。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决定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本来有起义或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封建压迫的意思。如小说里写的东溪村七星小聚义，是为了夺取封建官僚从劳动人民那里剥夺来的财产“生辰纲”；又如白龙庙英雄小聚义，是写梁山好汉为反对封建官府进行的武装斗争。把议事的地方定名为“聚义厅”，体现了晁盖为首的梁山义军的革命路线。宋江把它改名为“忠义堂”，虽是一字之差，却是原则上的“修正”。就是让“义”从属于“忠”，把他的封建的忠君思想，强加在梁山全体义军的头上，从根本上篡改了梁山义军的革命路线。

为了实现政治上的投降路线，宋江在组织上也更积极地招降纳叛。开始重用那些原是地主、贵族、反动将领的人。作品描写梁山义军人事上的变动较为显著的有这样几次：初聚义时，王伦用人讲资历、排辈数，嫉贤妒能。“火并王伦”之后，晁盖为领袖，两次人事变动（四十一回，五十一回）都是“巍巍高寨水中央，列职分头任所长”。就是说注意用人唯贤。但是，到宋江篡权以后，就有了根本的变化。如六十回，宋江安排六寨头领，除水军寨外，其余都是地主贵族和刚投降上山不久的将领。从晁盖死去到“英雄排座次”，宋江更千方百计搜罗牛鬼蛇神，为自己搞投降寻求支柱。他不仅招降了关胜、索超、单廷珪、魏定国、董平、张清……等赵宋王朝的将领，而且还把顽固地坚持大地主立场，“一心只要捉强人，那时方表男儿志”，完全与梁山义军为敌的卢俊义拉上山来，作为宋江“替天行道”的帮手。由于宋江积极网罗，属于封建统治阶级上层的旧军官、旧官僚、旧贵族，纷纷混入农民革命队伍，后来竟达三十多名，这些人就成了宋江搞投降路线的组织基础。

宋江为了适应政治上搞投降的需要，在军事上也完全采取消极防御的错误路线。本来在和义军的多次较量中，宋王朝的腐败无能已经暴露无余。梁山义军的力量不断扩大，他们不仅可以攻城夺府，冲州占郡，而且完全可以扩大建立农民革命的政权。然而投降派的头目宋江一心盼招安，根本不反天子，怎能主动进攻去建立农民政权呢？宋江不反对皇帝，还起劲地美化皇帝，说什么“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对一般官僚、地主，宋江也是采取“誓不损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的投降政

策。这样，梁山义军的反抗就只限于反贪官污吏，军事上也只满足于打家劫舍的小规模的斗争。虽然有时也曾攻占过州郡，但往往打击的对象只是童贯、高俅这样一些贪官污吏，以及与“四大奸臣”有关的梁中书等人，目的也只是为救某一个受难的弟兄，人一救出，马上撤回，死守水泊，不敢越雷池一步。根本不去扩大革命根据地，更谈不上去建立农民革命政权了。从宋江这个反面教员身上我们见到：为了投降敌人，必然要搞修正主义。这是古今投降派的一个共同点。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这些修正主义头子，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搞民族投降。他们都和宋江一样，是地地道道的投降派。

—

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在梁山义军内部排斥压服异己，而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

宋江搞修正主义要投降，最先跟着晁盖造反的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等人不愿意投降。特别是历来主张“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李逵，更是反投降。投降和反投降，在义军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在七十一回“英雄排座次”之后就更加表面化。

“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晁盖死后，宋江则利用他的威望来压服其他人。他在“正厅供奉晁天王灵位”，得到一盏九华灯，也“把这碗灯点在晁天王孝堂内”。他打着尊晁盖的旗号，公开地改变晁盖的路线。宋江还依仗手中有权，底下有人，在义军内部压服、欺骗和麻痹革命派。就在“上孝晁天王早生天界”的“罗天大醮”之后的“菊花会”上，大造投降的舆论。他写了一首《满江红》，公开唱出“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投降调子，当即激起了李逵等革命派的反对。武松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李逵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颠做粉碎。面对这种形势，宋江对李逵竟以杀头相威胁，喝令左右推出去斩首，而对于素有招安思想的武松，则采取劝说的软招子。真是软硬兼施，毒辣已极！接着，他又向众头领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这里，他通过美化皇帝来麻痹义军头领的阶级斗争观念，用封建名利思想来腐蚀义军头领的阶级意识，目的无非是制造投降舆论，叫大伙跟他走。值得指出的是，作者为了美化宋江的投降政策，不惜以歪曲、丑化起义英雄李逵来作反衬。李逵是梁山义军中反招安最坚决的一个。“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是他的一贯主张。但是作品却百般丑化歪曲他。用许多篇幅去写他的鲁莽、轻信、好杀人。在九十三回“梦闹天池”中，竟写李逵只砍四个奸臣，对于他素来反对的皇帝却称赞说“原来皇帝也恁般明白”！

宋江在义军内部大造投降的舆论，压服、排斥革命派的同时，对敌人却奴颜婢膝，百般讨好，采取种种卑鄙手段，出卖梁山义军，向封建统治者乞降。打得赢的仗他也不打，应该全歼敌军时也不去全歼。对于前来“征剿”的童贯，本来可以乘胜追击，一举

全歼。但宋江却火急叫戴宗传令收军。对于活捉的敌军将领，也一改过去劝降的作法，而是全部放回。如酆美、韩存保、党世雄等赵宋王朝的反动将领便都是这样放回去的。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他们两个都坚持地主阶级顽固立场，都是忠于赵宋王朝的个人野心家，都想往上爬。只是一个爬上了，属于在朝派；一个暂时没有爬上去，属于在野派。一个领着官军前来“征剿”；一个钻进义军内部，篡夺了领导权，千方百计搞投降。都是梁山义军的死对头。正因为这样，他们两人有时可以阵前交锋，有时又可以举杯共饮，握手言欢。八十回当张顺水渌渌地解来高俅时，宋江竟“慌忙下堂扶住，便取过罗缎新鲜衣服，与高太尉从新换了，扶上堂来，请在正面而坐。宋江纳头便拜，口称‘死罪’。”并且召集义军头领都来参见。

宋江当众向高俅哀告说：“万望太尉慈悯，救援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报”。完全是一付奴才丑相！

为了乞求招安，宋江不惜钱财，不顾羞耻，他不仅千方百计为前来招安的走狗陈宗善、闻焕章等当保镖，而且还两次通过宋徽宗的姘头妓女李师师“走后门”，直接向赵宋皇帝这个地主阶级的头子乞求投降。宋江为了乞降，竟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他不仅“擅拳裸袖，点点指指”和妓女李师师打得火热，而且写诗填词向李师师“尽诉胸中郁结”。“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六六雁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说穿了，就是要李师师使出“枕头上关节”去向地主阶级总头子皇帝献媚，乞求一封允许投降的诏书，这就完完全全暴露了这个出卖义军利益的投降派头目丑恶的灵魂。

由于宋江顽固地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一场轰轰烈烈的梁山农民起义斗争终于被扼杀了。但是，“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正当宋江唱着“莫负天子洪恩”，穿着“御赐锦袍”要去“朝京面圣”时，梁山义军中广大战士，却不以为荣，反以为耻。

“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千人”。这说明宋江投降派的面目暴露之后，广大下层群众便不跟着他走。

三

推行投降路线的宋江，不仅出卖了梁山农民革命事业，而且成为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一回，是宋江受招安后充当赵宋王朝“忠义”奴才的一次表演。当义军内部一军校，由于不能忍受赵宋王朝的走狗廂官的循私舞弊和无礼辱骂，手起刀落杀了廂官时，宋江先是怕自己受连累，接着便假意笑道：“我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了一个。今日一身入官所管，寸步也由我不得。虽是你强气未灭，使不的旧时性格”。这里，宋江一面美化自己，似乎他要处死敢于造反的军校是事出无奈；一面又诬蔑军校的正义反抗是“强气未灭”，“旧时性格”。在掉了几颗鳄鱼的眼泪之后，便将这个军校斩头号令。这一幕悲剧，不仅揭穿了宋江“义”的虚伪性；而且告诉人们：投降派得势之日，便是革命人民人头落地之时。宋江投降之后，多次向赵宋王朝表白：“竭力报国，并无异心，亦无希恩望赐之念”。就是说，要死心塌地的

充当皇帝镇压别的起义军的帮凶。他主动几次要求去征剿其他不“替天行道”的农民起义军。特别是在平方腊的战争中，他派柴进化名柯引，打入方腊义军内部，骗取信任，然后里应外合扼杀方腊起义。当他们攻下清溪后，“把方腊内外宫殿尽皆烧毁，府库钱粮，搜索一空”，甚至烧杀掠夺，“剖腹挖心”，无所不为。在帮源洞战斗中，宋江不仅下令杀死所有被俘的将领，而且还大量屠杀方腊的士兵。“杀的尸横遍野，流血成渠”，斩杀方腊义军“二万余级”。最后方腊也被处死。“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宋江衣锦还乡，他的身上沾满了起义军烈士的多少斑斑血迹！

马克思在评论梯也尔时指出：“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躊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见《法兰西内战》四十页）宋江受招安后的所作所为说明，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赵宋王朝的忠实奴才，屠杀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

四

宋江推行投降路线，必然求助于反动的孔孟之道。而以“忠”为核心的一套封建伦理道德，便是宋江推行投降路线的思想基础。

《水浒》中的宋江，“自幼曾攻经史”，是一个孔孟之道的虔诚信徒。忠君思想更是贯穿他一生的言行。“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这是《水浒》作者忠君思想的反映，也概括了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本质。反对贪官污吏和忠于天子，在他身上是完全统一的。他亮出“替天行道”的旗帜，就是表明他要为赵宋王朝的皇帝，行镇压人民之道。他上山等待招安是忠君，他被招安了又去打方腊，还是为了忠君，甚至最后喝了药酒，死在旦夕，还说什么：“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真是一付愚忠的奴才嘴脸。围绕着忠，作者还竭力宣扬他的“孝”、“义”。吹嘘他“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作者的美化，恰好使我们见到顽固的地主阶级立场、浓厚的封建道德观念正是宋江这个投降派的思想核心。

原来儒家鼓吹的“孝”是和“忠”联系着的。《孝经》里说“以孝事君则忠”。孔老二的门徒有子也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就是说，顺从父母、兄弟的人就不会犯上造反，这当然就有利于维护反动阶级的统治。宋江两次拒绝上梁山，便说明他奉行的正是儒家鼓吹的孝道。大闹清风寨以后，他一时乘兴领着三百多人马上梁山，但在紧要关头，仅仅因为读到一封报丧的假信，就捶胸撞头，大骂自己是“不孝逆子”，扔下众位好汉，独自一人回家奔丧去了。不久宋江便被官府抓住，发配江州，当了囚徒。路经梁山时，众头领劝他留下，他却说：“家中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并且说如果留在梁山，参加义军那就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这一番话，正好暴露所谓忠孝就是尽忠皇上，不许造反的反动的孔孟之道。

（下转第15页）

剥开宋江假面具 还其庐山真面目

河南驻军某部 许长志 丁地树

宋江是《水浒》中的主要人物。自晁盖死后，他在梁山泊“坐了第一把交椅”，他的活动几乎贯穿全书始终。他是作者竭力塑造的“正面人物”。对于宋江的形象，自明代成书到今天的几百年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可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评价宋江的形象，从中引出经验教训，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当前，我国人民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正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社会主义不断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剥开宋江的假面具，还其庐山真面目，是十分有意义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评价宋江，就不难看出，他是一个混进农民起义军中的投机分子，是农民革命队伍中的投降主义代表和可耻的叛徒。

毛主席指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水浒》中的宋江，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艺术典型。为了达到麻痹劳动人民的目的，作者煞费苦心，不惜浓墨重彩，给宋江蒙上了一层层华丽的面纱。

一曰“及时雨”。当宋江粉墨登场，初次和读者见面时，作者就竭力吹捧他是深受人民拥戴的“及时雨”。说他“为人民仗义疏财”，“好做方便”，“扶人之困”，“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山东、河北闻名”，好比“天上下了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凡是具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在那时候，一方面是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一方面是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是荒淫奢侈纸醉金迷；一方面是衣不蔽体，食不饱腹，尸骨遍野……这就是，封建社会鲜血淋漓的阶级斗争现实。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旧社会依据的原则是：不是你掠夺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总之，是一个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人”。（《列宁选集》第四卷，354页）宋江出身在地主家庭，担任过地主阶级政权中的下级官吏。地主阶级的生活准则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做人的诀窍是“为自己”。宋江决不例外。他过的是吃人肉、喝人血的寄生生活。谁也不会相信《水浒》中的宋江会一反剥削阶级的本性，而变成“仗义疏财”、“扶人之困”的“及时雨”。

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同时具备两种社会职能：刽子手的职能和牧师的职能。一方面诉诸武力，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又挂起“乐善好施”的招牌，施

以小恩小惠，作为他们麻痹劳动人民的手段。宋江“仗义疏财”，“济人贫苦”，也不可能超出他的地主阶级利益，无非是为了收买人心，笼络穷人。

宋江懂得，施以小恩小惠，便可以落个好“名声”，捞到向上爬的资本。眼前的施舍，是为了换取日后更残酷地鱼肉穷人。阎婆惜的话倒是说着了本质：“么人见钱，如蝇子见血”，“那个猫儿不吃腥？”与其说是“乐善好施”，莫如说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宋江“仗义疏财”、“济人贫苦”的把戏一戳便破。作者为美化宋江还编造了“宋公明私放晁天王”的故事。农民起义军的晁盖、吴用等“智取生辰纲”，夺了梁中书的十万贯不义之财。这件事发生后，作者为了着意刻画宋江是“周全人性命的”“及时雨”，就设下了宋江给晁盖等人通风报信，放走晁盖的情节。这件事，乍一看，颇有几分宋江“周全人性命”的味道儿！可是仔细一辨别，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江的立场仍然是在地主阶级一边，他的屁股并没有坐在农民起义军的板凳上。宋江之所以要放晁盖，是因为晁盖是他的“心腹兄弟”。“他如今犯了迷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在惊恐之余，才通风报信把晁盖放了。宋江虽然放走了晁盖，但却始终认为晁盖犯了“迷天大罪”，杀了公人，打败官军，是于法度上却饶不得的“灭九族的勾当”。后来，刘唐告诉他晁盖等人已经上山落草做了头领时，宋江恶狠狠地骂道：“那晁盖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可见宋江对造反是何等仇恨，恐惧。如果丢开作者故意给他们拉上“心腹兄弟”的关系，可以断言，宋江一定协同何涛去追捕“智取生辰纲”的“罪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宋江，是一个虔诚的封建卫道士和封建政权的忠实爪牙，而绝不是受人民衷心拥戴的“及时雨”。

二曰“吟反诗”。宋江刺配江州城，浔阳楼酒醉吟反诗，是《水浒》作者精心安排的一个重要情节。作者企图通过这个情节，展现宋江从地主阶级营垒中分化出来，投身农民起义军的思想基础。可是，我们透过宋江吟的所谓“反诗”，正好看出了他封建地主阶级的丑恶灵魂，甘心充当叛徒的咀脸！

宋江“为人一世”，为的是忠君招安，封妻荫子，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没想到，“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这里”，不能尽忠于皇帝。想到这些，宋江悲伤不已，于是在浔阳楼写道：“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好一首“反诗”！如果我们承认它是一首“反诗”，在这里必须弄明白，这首反诗反的是谁？只要我们仔细剖析，就会清楚地看到：宋江的诗“反”的不是北宋王朝，而是反的唐朝农民起义的领袖黄巢，反对黄巢的革命原则性和坚决性。回顾历史，我们知道，早在一千多年前，我国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号称“冲天大将军”扯起造反大旗，率领数十万农民起义大军，在山东、河南、安徽交界地区，发动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农民革命战争。它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击着唐王朝的统治。唐朝统治者眼看用武力不能征服起义军，于是施展招安诱降的毒计，妄图使起义军屈服。在“招安”面前黄巢等人勃然大怒，坚决抵制，使唐王朝统治者阴谋未能得逞。公元八七八年，黄巢率领大军横渡长江，驰骋江西、浙西，攻打福州，包围了广州。

公元八八一年，直捣长安，把唐僖宗赶跑。史实说明，黄巢敢于与朝庭抗争，不受

招安，是一个受人民拥护的农民起义军的杰出领袖。

宋江吟诗“笑”黄巢，丝毫无损于黄巢的高大形象，相反，倒暴露了自己效忠皇帝、热衷招安的卑鄙心理。

宋江攻击黄巢，仇视农民革命，崇尚“招安”，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没落的统治阶级，都要抬出孔老二的这具僵尸来做“敲门砖”敲开他们升官发财的大门。到了宋代，孔老二被抬到至圣文宣王的显赫地位。生活在宋代的宋江，为了早日发迹，他直言不讳地供认“自幼曾攻经史”，标榜自己是一个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孔孟宣扬的“忠”“孝”“仁”“义”浸透宋江的灵魂。这就是他忠君招安的反动思想基础。宋江认为上梁山参加农民起义军是误犯了大罪，因而念念不忘“招安”。他对呼延灼说：“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宋江窃取梁山泊第一把交椅后，更加露骨地号召起义军为投降宋王朝卖命：“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就是宋江要实现的“凌云志”，也是宋江“反诗”的最好注脚！

三曰“反贪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水浒》作者终于把宋江塞进了农民起义军队。这还不够，为了表明宋江是一个背叛了封建阶级，而同农民阶级一道向北宋王朝作斗争的农民“领袖”，作者还特意安排了宋江几次同贪官污吏作斗争的场面。妄图通过这些场面，把宋江打扮成农民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因此，有的人认为，宋江虽不反皇帝但他打击贪官污吏，也不失为“一位农民起义的领袖”。

毛主席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为了弄清宋江反贪官的实质，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他反对封建政权的爪牙——黄文炳的一场斗争吧。黄文炳是江洲一个通判，当他见到宋江题的所谓“反诗”后，三番五次为蔡九知府出谋划策，要把宋江送上断头台。从此，宋江与黄文炳结下了杀身之仇。当农民起义军闹江洲，劫法场，从刀口下把宋江救出来后，他为了报私仇，便凭借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去反“滥官污吏”。活捉黄文炳后，宋江大骂黄文炳说：“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何只要害我？……你哥哥黄文炳与你这厮一母所生，他怎般修善？……我昨夜分毫不曾侵犯他。”此话说得清楚，宋江所以要反对黄文炳这个“贪官”，是因为黄文炳几乎绝了宋江发财升官、忠君报国的希望。由此可见，宋江同高俅的交锋也罢，同黄文炳的斗争也罢，都不过是出于自己的私利，是统治阶级内部大狗与小狗、饱狗与饿狗之间的争斗。宋江并非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同农民起义军一道去反对北宋王朝的贪官污吏。因为，“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宋江，更不可能同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去摧毁“封建统治的基础”。

这样一个宋江，自然不会去反皇帝。他始终认为大宋皇帝是反不得的。宋江杀阎婆

惜，被刺配江洲，途径梁山泊，晁盖等人多方邀请，好意挽留，他却说：“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是苦我”。他认为参加革命队伍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不忠不孝”。宁做刀下鬼，不做造反人。宋江上山以后，朝夕叨念为宋徽宗所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效犬马之劳，他对徐宁说：“见今宋江暂居水泊，专待朝庭招安，尽忠竭力报国。”

请看，在宋江身上哪里有半点“农民起义的领袖”的影子，他与历代农民领袖相比，只不过是一堆黄土，而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则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他们每次起义都把反对贪官，摧毁“封建统治的基础”，同反对封建王朝结合起来，痛快淋漓地提出要消灭“王侯将相”的战斗口号，并为之奋斗一生。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领袖张角等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明确主张推翻东汉政权（苍天）建立农民的政权（黄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领袖洪秀全，把清朝皇帝及官吏地主等反动统治者称作“阎罗妖”及妖徒鬼卒，号召人民“共击灭之”。

就是《水浒》中的农民起义军，他们也是“不怕官司不怕天”的。李逵多次提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主张，只是被宋江为首的投降派镇压下去了。

宋江不反封建朝廷，必然要反对农民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是历史的规律。为了“忠君报国”，宋江一头栽进宋王朝的怀抱里，秉承其主子的旨意，亲自出马，攻打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正象鲁迅所说的那样：“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宋江从不敢触动封建统治的基础，也不敢触动皇帝的一根毫毛，到投降招安，再到镇压农民起义军，这是一条多么完整的投降主义路线，这是一副多么丑恶而又狰狞的叛徒嘴脸！

一部文学作品，总是表现着一定阶级的切身利益和反映出一定阶级的政治倾向。它歌颂什么，暴露什么，美化什么，都体现着鲜明的阶级性。

《水浒》的作者，极力歌颂一个专为“封妻荫子”、“高官厚禄”、“忠君报国”而奔忙的农民革命的叛卖者，又千方百计地给农民起义军脸上抹黑，这说明，《水浒》是为了适应封建统治阶级扼杀农民革命的政治需要应运而生的一部文学作品。它流传很广，影响很坏。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充分利用作者为我们提供的这部反面教材，抓住《水浒》宣扬宋江的反动实质，进行认真地评论和批判，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孔孟的信徒 革命的叛徒

——宋江“反诗”剖析

刘耕路

历来许多评论宋江的文章，都愿意称道宋江在浔阳楼题的“反诗”，认为它表达了宋江的“造反”精神。其实，这种说法不是有意歪曲，也是一种误解。我们把这首“反诗”和整部《水浒》中宋江的所言所行联系起来进行分析，那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宋江不过是个浸透孔孟之道毒汁的反动儒生，一心想爬上更高统治地位的封建奴才，处心积虑出卖农民革命的可耻叛徒。“反诗”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宋江的“夫子自道”，是他一生反革命活动的一个总纲。现在我们就从“反诗”剖析起，看看宋江是个怎样的角色。

“自幼曾攻经史”——反动儒生本色

宋江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他的父亲被称为“宋太公”，家里雇着若干“庄客”，这就说明，宋江是吃剥削饭长大的。他在郓城县做押司，且又“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这又说明他上梁山前，早已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小小的走狗和帮凶。“反诗”中说：“自幼曾攻经史”，什么“经”？在北宋时代，这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用以培养统治人材的所谓“五经”、“四书”，宣扬的无非是“君仁、臣良、父慈、子孝”之类的孔孟之道。什么“史”就是帝王将相家谱式的所谓“历史”，宋江从这里接受的无非是“光宗耀祖”、“青史留名”之类的腐朽思想，所受的教育，完全是儒家的正统教育。难怪乎他满口“忠孝节义”、“忠君报国”，连他的号也叫什么“孝义黑三郎”。这样一个标准的儒生，对封建统治没有丝毫不满，压根儿就没有想走造反的道路。他因杀了姘头阎婆惜被官府逮捕时，向其父亲说：“官司见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撞见一班杀人放火的弟兄们，打在网里，如何能够见父亲面？”你看他宁肯坐牢不愿造反。发配江洲前，老地主宋太公告诫他：“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泊过，倘或他们下山来劫夺你入伙，切不可依随他，教人骂做不忠不孝！”果然，在晁盖等人挽留他时，宋江便摆出“忠孝”的面孔：“这个不是你们兄弟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若是如此来挟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不如死了！”宋江真不愧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孔孟之徒“全忠全孝”的活标本。

有人评论说：“闹了江洲，奔上梁山，是宋江一个很大的转变。”其实不对。宋江上梁山，是因为他的封建主子误解了他的“反诗”，要杀掉他的脑袋，不得已而为之。至于他的世界观，他的本心，从来没有丝毫改变。宋江在梁山，每当朝庭来讨伐，总要毕恭毕敬地忏悔一番：“某等造恶甚多，今者差遣将军来收捕，本合廷领就缚”等等，接着就是奴颜婢膝地恳求：“只待圣祖宽恩赦宥重罪，妄生报国，万死不辞。”儒生本色，始终不变。

宋江在封建统治者面前表现得一身奴颜媚骨，可是在反投降的造反农民面前，却表现出满身杀气。当他篡夺领导权后，在什么“菊花会”上又哼起“招安”的滥调时，李逵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飞起一脚把桌子踢得粉碎。这下宋江露出了豺狼面目，摆出孔老二诛少正卯的架式，高喝：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我们用阶级、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宋江的爱与憎，敬与罚，就可以看出，宋江始终没有忘记孔老二“臣事君以忠”的教诲，始终没有跨越封建统治的规范半步。一次，燕青射下几只雁，他发一通酸腐不堪的议论说：“此禽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备”，接着又“心中凄惨，睹物伤情”，发一通“何时玉关重见”的感慨。甚至在他发觉被高俅等人的鸩酒毒死时，还念念不忘“忠义”，说什么：“宁可朝庭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庭。”这个无可救药的封建奴才，一生都以孔孟之道作为立身行世的标准，他的出卖革命，报效封建统治阶级，完全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

“长成亦有权谋”——两面派的自供

孔孟之徒都与他们的鼻祖孔老二一样，无一不是反革命两面派。宋江吹自己是“长成亦有权谋”，正是他不自觉地自供。如果说宋江象他自谦的那样“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那么他在耍阴谋，弄手段方面，倒是得了儒家真传，颇有一套的。他由一个微不足道的“文面小吏”，爬到农民起义领袖的位置上，恰是凭借了这一点。

宋江懂得，要想“官爵升迁”、“青史留名”，靠老老实实当个押司是办不到的。他在做“刀笔小吏”时，就开始笼络人心，“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有人据此评论说，宋江“热爱人民”，“希望百姓无苦无难”，曲为宋江辩护。试问，在封建社会里，啼饥号寒的百姓何止千万，凭宋江之流的这种假慈悲就能解放得了么？宋江的本意并不在此。他的目的只在于博得“及时甘雨四方称”，做他日晋身的阶梯。

《水浒》的作者虽然着意要把宋江写成个“正人君子”，可是吹得过了头，总要露出破绽。比如宋江发现，路过梁山时，花荣要给他打开行枷，宋江赶紧制止：“贤弟是什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可是到穆家庄借宿时，公人说：“这里又无外人，一发除了行枷快活。”宋江道：“说得是。”当时依允，去了行枷，再不谈什么“法度”了。这类细节活画出宋江伪君子的丑恶嘴脸。

当然，上述这些两面派行为，还仅仅是小试机锋，大展身手，还是宋江上梁山以后的事。

宋江从江洲法场被劫上梁山后，所琢磨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法取得农民军的信任。这时他收起了“不忠不孝”“万劫沉埋”的高调，向晁盖等人指天誓日地表示：“今日同哥哥上山去，这回只得死心踏地与哥哥同死同生！”彷彿真要“造反”了。同时对山上的头领们总是作出“温、良、恭、俭、让”的姿态，再加上他以前在江湖上的“虚名”，捞到梁山泊第二把交椅坐上。从这时开始，他就网罗一些封建官吏上山，暗暗地为投降做组织上的准备。不久，晁盖打曾头市中箭牺牲，吴用等人请宋江做山寨之主，宋江先是假情假意地百般不干，最后才吐出真心“军师言之极当。小可权当此位。”踌躇满志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这还不够，他又拉“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的大地主卢俊义上山，当了二把手。宋江大体完成了投降的组织准备后，得意地声称：“你看我众弟兄们，一大半都是朝庭军官。”这时他用不着再掩饰了，把标志造反的“聚义厅”改为忠于朝庭的“忠义堂”，大肆散布“归顺朝庭”的舆论，并在梁山排座次时玩了个“天眼开”的把戏，以“天命”来强制起义军接受他的投降主义路线。

宋江在“反诗”中说，“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这是他的所谓“权谋”的很恰当的注解。这个“刀笔小吏”出身的家伙，有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他很懂得，什么时候该谈什么话，该干什么事。他知道在不得势时，必须“潜伏爪牙忍受”，而在他认为时机成熟时，就不顾一切地向他准备猎获的目标猛扑过去。宋江这种两面派，是一切蓄意出卖革命的叛徒的共同特点。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今天，我们从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身上，依然可以看到宋江的影子。

“他时若遂凌云志”——如蝇逐臭的名利之徒

人各有志。不同阶级的人有不同的志。宋江的“凌云志”是什么？用《水浒》作者的话说就是“生当鼎食死封侯”。在这一点上，宋江和他所骂的“贪官污吏”高俅之流并无二致。如果说有点什么不同，那仅是走直线与走曲线的区别。

宋江本拟沿着“忠臣孝子”的阶梯爬上去显身扬名，无奈比他更高的统治者没有赏识他的“孤忠”，“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洲”，使得宋江“功又不成，名又不就”，升官发财的迷梦暂时破灭。于是他在浔阳酒楼上，“临风触目，感恨伤怀”，题下了“反诗”。有人说，“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表现了宋江“鲜明的反抗性”。宋江自己说，题诗乃是为了“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睹一番”。他想的是高车驷马，衣锦还乡，并非蓄意谋反。他说的“血染浔阳江口”，是向个别封建官吏报私仇，并非和整个统治阶级作对。后来宋江每当叨念“滥官当道”时，总忘不了颂扬“今皇上至圣至明”，就是他并无反抗性的明证。“牢骚”自然是有的，但那正如被恶仆踢了一脚的狗，向仆人汪汪两声，决不是对主人不满。

宋江为了遂他的“凌云志”，极尽了卑躬曲节之能事。他首先在梁山高树“替天行道”的黑旗，让朝庭不要误会他是真的造反，为将来投降留下后路。不错，宋江上梁山后，确实和官兵打了几仗，但那是为了提高出卖自己的价码。高俅是梁山的死对头，当梁山起义军抓到高俅时，宋江“纳头便拜，口称死罪”，连忙大摆筵宴款待，这回连

“滥官当道”的话头也不敢说了，苦苦哀告：“文面小吏，安敢反逆圣朝……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死图报。”宋江这个名利之徒，为了追求荣华富贵，分得统治阶级的一点残杯冷炙，拚命向其主子靠拢过去。

宋江朝思暮想“招安”终于实现了。朝庭“招安”诏书一到，他“山呼万岁，再拜谢恩”，怀着“封侯拜相”的宿愿，打着“顺天”、“护国”的旗帜，去京城朝拜皇帝。恶贯满盈后，这个可耻的叛徒，用沾满革命农民鲜血的双手，捧着宋徽宗赏给他的“武德大夫”的纸冠和“忠烈义济灵应侯”的灵牌，不大情愿地钻进了坟墓。宋江为实现他的“凌云志”苦苦挣扎一生，落得个“鸠毒埋黄壤”的可卑可耻的下场。

“敢笑黄巢不丈夫”——巨人脚下的侏儒

宋江浔阳楼题诗的最后一句是：“敢笑黄巢不丈夫”。这真是可笑不自量！

黄巢是唐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号称“冲天大将军”。他指挥万马千军，打遍大半个中国，从根本上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对历史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黄巢在起义前，写下了饱含造反精神的诗篇：“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些诗，反映了黄巢反封建潮流，誓不与统治者合作的革命精神。黄巢打着“冲天”的旗帜造反，宋江打着“顺天”的旗帜投降；黄巢要“为青帝”自己做主人，宋江要做“忠臣”，当奴才。这是截然对立的形象，岂可相提并论！黄巢的“我花开后百花杀”，表明了彻底推翻唐王朝统治的革命决心，宋江的“他年若得报冤仇”，只反贪官，保护宋王朝的国家机器，这又是完全对立的两条路线，又岂可同日而语！

是的，宋江嘲笑黄巢，从他的立场看，也许有他的“道理”。黄巢斗争到底，没有象他那样去追求“封侯拜相”，在宋江看来，这就是“不丈夫”。他自己嚼着腐烂发臭的老鼠，还要嘲笑别人辨不出滋味。

对立阶级的人，不可能有共同的思想和语言。宋江厚颜无耻地提到黄巢，他可知道黄巢起义正是由于宋江一类叛徒的出卖，才导致最后失败，黄巢本人也在狼虎谷战斗到最后，壮烈牺牲。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看出，黄巢是冲天而起的雄鹰，宋江不过是在粪坑里蠕动的蛆虫；黄巢是顶天立地的巨人，宋江不过是在巨人脚下爬行的侏儒。

《水浒》里的宋江，只是在农民起义的革命洪流中泛滥起来的一块没落地主阶级的沉渣。然而在过去的《水浒》研究中，居然为他戴上了“英雄”的桂冠。这是需要澄清的一个重要是非问题。通过对宋江的重新评价，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我们进一步认清宋江的阶级本质，就可以在现在和将来，警惕宋江一类的机会主义者混进革命队伍，保证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前进。

改变革命路线就是叛卖革命

四平市植物油厂工人理论组

四平师院中文系理论组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作者出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以梁山泊农民起义为题材，塑造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形象，歌颂了以宋江为头子的投降主义路线怎样一步步取代了以晁盖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使一支好端端的农民革命军竟调转枪口，充当了封建统治阶级镇压农民革命的工具。作者是“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为反衬来歌颂”宋江的，这就更加有利于我们认识什么是投降派和投降派怎样效忠封建王朝，破坏革命的罪恶勾当。从这一点来说，《水浒》是一部十分难得的反面教材。

宋江上梁山以前，《水浒》作者着力描写了梁山泊农民军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这是为了给下文歌颂宋江从内部征服这支强大的农民军，为朝廷建树“奇功大业”打基础的，是作者为了歌颂宋江投降主义路线而事先做的铺陈。

最初占据梁山泊领导地位的是一个“落第腐儒”王伦。在农民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王伦大搞宗派，拒绝吸收新的革命力量，实行了一条关门保守的错误路线，阻碍了革命队伍的发展壮大。晁盖、吴用、阮氏兄弟等人到梁山后，立即与这种关门主义的保守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吴用等人支持下，林冲火并王伦，夺了权，并拥戴晁盖做了领袖。晁盖与吴用阮氏兄弟密切配合，积极屯粮备船，操练水陆义军，实行了一条正确路线，不但干净利落地消灭了前来进剿的官军，而且迅速地发展壮大了起义队伍，使梁山泊“好生兴旺”。

从宋江法场被救上梁山，到晁盖中箭身亡，这是梁山泊起义军空前发展壮大的阶段。在军事上，起义军相继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在组织上，起义军扩充了李逵、武松、鲁智深等新的革命力量。宋江，这个混入革命军内部的封建地主阶级分子的到来，使梁山泊内部的阶级关系起了新的变化。从此，路线斗争出现了新的复杂局面。在全局上，有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晁盖做领袖，梁山泊的政权仍然是农民革命政权。但是，以宋江为头子的投降派正在形成、发展、扩大，他们采取“以屈求伸”的策略结成死党，制造反动舆论，随时准备篡权。在《水浒》四十二回，作者安排了一个九天玄女赐天书的情节，意在说明宋江“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是天意，宋江就是天意的化身。在封建社会中，天意说到底就是皇权之意。因此宋江的投降路线，是封建王朝镇

压农民革命的反动政策在梁山泊起义军内部的反映，而宋江本人正是封建官僚地主阶级打入梁山泊起义军的代理人。宋江表面上装做很尊敬晁盖，但却利用窃居第二号首领的职权，极力拉山头结死党，搞阴谋诡计收买人心。特别是他竟公然以出卖农民革命为条件，奉劝被俘朝廷军官要“暂借水泊安身，只待朝廷招安”，把那些对农民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地主官僚拉入山寨，扩充自己的死党。为了蒙蔽群众，他开口不离“忠义”，极力混淆阶级界限和路线是非，以掩藏自己的地主官僚真面目。为了做好篡权的舆论准备，他一上山就大讲所谓歌颂他的童谣，把自己打扮成天然的领袖。更可鄙的是，当朝廷高官宿太尉被劫持上山后，宋江竟把他“扶在聚义厅当中坐定”，然后，“下了四拜，跪在前面”，极力表白自己要尽忠朝廷的心迹。并与宿太尉拉上了黑关系，放长线，钓大鱼，做为将来实现招安的内线。充分显现了一个混在起义军内部的叛徒、内奸的丑恶嘴脸。

晁盖中箭身亡，谁当领袖？实行什么路线？这是决定梁山泊农民军前途命运的大事。晁盖临终时看着宋江嘱咐道：“贤弟莫怪我说：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表明，晁盖对宋江是有所认识的，因此不同意他接任梁山泊的领袖。而且提出了选择领袖的标准，即要选择那能坚持斗争、把“聚义”造反事业进行到底的坚强者当梁山泊领袖。但由于宋江的山头早已形成，并用“忠义”绞索缚住起义军，因此，在一派“拥戴”声中、宋江坐上了梁山泊第一把交椅。

宋江上台，就是修正主义上台。修正主义上台了，虽然队伍仍然是从前那个队伍，人还是从前那班人，但路线变了，革命军就要逐步丢掉自己的一切。

“一朝权到手，便把令来行。”宋江上台后，一面在聚义厅中间供上了“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的牌位，一面立即抓了背叛晁盖的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宣布“替天行道”的口号，这就把他那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完全合法化了。第二件大事就是改“聚义厅”为“忠义堂”。聚义与忠义，一字之差，却是批判孔孟之道与维护孔孟之道，反抗皇权与心向朝廷的两条路线两种前途的天壤之别。第三件大事就是压制革命派，扫除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障碍。当李逵喊出了要宋江做大宋皇帝的话时，当即遭到宋江的严厉痛斥和压制。这时的宋江，大权已到手，谁胆敢不赞成他的反动路线，他就是要动用手中大权进行专政了。

自此后，在以宋江为头子的反动投降主义路线统治下，梁山泊的农民革命斗争被限定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框子里，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战斗的胜利，但都是为了“替天行道”，剿除贪官污吏罢了。

积极做好接受招安准备工作，是宋江公开推行其投降主义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为了尽早做好组织准备，宋江迫不及待地把一个立志要使梁山泊“人人皆死，个个不留”的大名府大地主卢俊义拉上山寨。并且让他应了晁盖的遗嘱，活捉了杀害晁盖的史文恭，窃居了梁山泊第二把交椅，成为宋江推行其投降主义路线的帮凶和死党。一个虽未捉到史文恭，但骗得众人“拥护”，只好做领袖；一个活捉史文恭，却懂礼让，不争第一把交椅。作者一箭双雕，同时颂扬了两个投降主义路线的头子。但是，这件事正说明宋江等人彻底的背叛了晁盖。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实际上是打着天意的旗号，把宋江及其死党的统治地位，用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完成了投降集团彻底篡权的过程。随后，

宋江又率众将领歃血誓盟，要大家“但存忠义于心，同勤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谁要违背这誓言，就是“存心不仁，制绝大业，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这是为进一步实现招安而进行的思想总动员。但是，要革命的人民是决不允许将革命葬送的，随即公开暴发了菊花会上坚持推行招安与反对实行招安的两条路线的激烈交锋，掀起了梁山泊农民革命路线斗争的又一高峰。但是，《水浒》再一次以李逵等坚持正确路线反对招安的失败，反衬了宋江坚持招安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成功。实际上，菊花会是宋江精心策划的对李逵等人的坚持的正确路线的严厉镇压。经过这次镇压，以宋江、卢俊义为头子的那批出身上层，对当朝皇帝怀有无限忠心的人们，更进一步地把向往招安的愿望变成了争取招安的实际行动。

《水浒》作者站在颂扬投降主义路线最终得势的立场上，描写了三次招安的过程。这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在梁山泊起义军中彻底改变晁盖、李逵正确路线的最高潮。在三次招安的过程中，宋江为了讨取赦罪招安的一纸诏书，极尽其奴颜婢膝之能事。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战斗中，宋江“不肯尽情追杀”，下令“收军，不教追赶”；把起义将士的胜利当成了向皇帝讨取招安的进见礼。特别是为了乞求招安，他居然向自己视为奸邪而双手沾满了革命军鲜血的高俅跪拜求告。为了早日在朝廷谋个尽忠皇帝的奴才位置，他竟在亲自出马之后，又迫不及待地特派燕青带着金珠宝贝器皿及细软之物，不远千里进京走皇帝宠妓李师师及宿太尉的后门，终于达成肮脏交易：一方下了一纸招安的空文，一方出卖梁山泊农民革命。但是接受招安的投降派是不得人心的。因此，几次招安活动都遭到李逵等人的极力抵制与反对。第一次招安，因阮小七偷换御酒，李逵撕诏痛打太尉而宣告破产。第二次招安，因吴用识破了高俅的欺诈，示意花荣一箭射死天使而破产。但由于宋江一伙投降派执意要出卖革命，终于以葬送梁山泊农民革命的巨大代价换来了一纸空文。宋江一伙叛徒内奸不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也就不再跟他走了。当宋江下达了接受招安令后，“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千人”。一百〇八将虽然系于“兄弟义气”而未散伙，但也失去了往日的景气。广大官兵是不愿意投降的。但由于这支农民军的领袖不好，终于导致了线变、权变、人也变，使一支强大的农民军充当了封建皇帝的保镖。鲁迅先生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一语抓住了要害，批得多么深刻。

“宋江投降了，便去打方腊。”这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发展的最后阶段。自此时起以宋江为首的梁山泊农民军已经不再是农民革命军了，而是变成了大宋王朝的御用工具——官军了。在他们赴京朝觐途中和接受天子检阅时，都打着“顺天”、“护国”的两面大旗，连“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也丢弃了。特别是宋江带人回山寨发送眷属，拆毁城垣，处置战船时，干脆一把火烧了晁天王的牌位。连最后一层遮丑的面纱也揭掉了。因此宋江南征北战，接连为朝廷卖命，残酷地镇压了田虎、王庆、方腊等农民革命。直“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渠”。正在宋江喜庆自己被朝廷加封为“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时，方腊于东京市曹凌迟处死。刷了三日，而原来的起义军将士呢？也在这一次自相残杀中死的死、散的散，一百〇八将仅存二十七员。一支声威浩大的农民革

命军，终于被搞垮了。这是多么沉痛的历史教训！

在宋江为大宋圣朝竭力尽忠的过程中，起义军内部反抗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义军接受招安后，一直不准进京入城。在征辽回来后，仍屯兵城外，李逵便不肯受这口气，要“再上梁山”，众将“尽有反心”。李俊、张横、张顺、阮氏兄弟干脆请了军师吴用商议造反，但都遭到了死心塌地当奴才的宋江严厉镇压和破坏。他搬出甚至封建王朝教训奴才的口吻教训众人，说什么：“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成什么？就是要起义军将领们从思想上彻底解除武装，忍受封建压迫当奴才。直到最后宋江喝了带药的御酒之后临死还怀着对大宋圣朝的无限忠心，唯恐李逵造反，特地把李逵叫到跟前。李逵大叫：“哥哥，反了吧！”这喊声代表了梁山泊农民军向投降主义反抗的路线，向反动腐朽的大宋圣朝发出的最后抗争。但由于李逵不能识破宋江，还是被骗，喝了毒酒一同死去了。这些反抗情节的安排，也都是作者为了最后完成对宋江及其所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的反衬而精心安排的。

毛主席早在对电影《武训传》批判时指出：象武训那样的“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水浒》作者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极力歌颂宋江那种对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的丑恶行为，赞美宋江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肆意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妄图保存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为我们提供了投降派是怎样从改变革命路线着手，与反动封建统治阶级里应外合，搞垮一支强大的农民革命军的一个难得的反面教材。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它进行分析批判，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正确路线是革命军的生命线，生存线，丧失了正确路线，必然丧失一切。因此，谁改变革命路线，就是对革命的叛卖。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我们看到，通过改变革命路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事例也有，苏修就是一个典型。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手段做了希特勒法西斯不曾做到的事，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在我国，刘少奇、林彪一类投降主义者就是投机革命的蛀虫。他们代表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的利益，妄图从内部瓦解革命，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他们的种种罪恶行径，很象当年的宋江，他们正是要做苏修已经做过的事。评论《水浒》，可以使我懂得：对于修正主义，对于混入革命队伍的内奸、叛徒、卖国贼，必须提高警惕。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跪着造反，“终于是奴才”

——论宋江反对高俅的斗争

刘含涛 张正一 胡皓 易洪斌

《水浒》中的宋江，本是个“自幼学儒”、“曾攻经史”的封建“循吏”，他是以“忠君报国”为其最高政治目标的，可是后来竟然与皇帝的宠臣高俅一派发生冲突，以致反上梁山干他认为是“灭九族的勾当”去了；上梁山后，宋江不但数挫朝廷派来征剿的官军，而且“三败高太尉”，然而一旦将高俅俘获上山，宋江却向这昔日的仇人“纳头便拜，口称‘死罪’”，哀恳“慈悯”，乞求“招安”。一部《水浒》，围绕着宋江与高俅的冲突，摆出了多么矛盾的现象！

马克思说过：“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要搞清宋江反高俅的真相，必须用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按迹寻踪”地分析一下宋、高矛盾由产生、发展到解决的全过程。

宋江和高俅之间的矛盾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内容？这种矛盾在其逐步激化的过程中采取了怎样的表现形态？弄明白这个问题，才能把握住宋、高矛盾冲突的思想脉络及其阶级实质。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历史上的任何阶级社会，都要建立与该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法律等上层建筑，都要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在封建社会，“和在到处一样，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利害关系，总是要使现状，当作法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要把它由习惯和传统而固定化的各种限制，当作法律的限制固定下来。”这种“由习惯和传统而固定化的各种限制”，就是封建统治者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榨取民脂民膏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人民无法生存，势必导致“官逼民反”的社会危机，造成封建王朝的崩溃。但是，地主阶级无限制的贪欲又总是要由其内部最反动、最黑暗的一派势力表现出来，他们总是想撕掉法律的遮羞布，突破这个“限制”，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勾当。这在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北宋末期尤为严重，所谓“政日以墮，民日以困”，就说明了这一点。这就必然要与地主阶级内部企求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的另

一派官僚发生矛盾。于是，为了挽救封建王朝这艘古老巨舟的沉没，在地主阶级内部，围绕着如何行使权力和怎样榨取财富的问题，展开了如《水浒》中描写的宋江与高俅的斗争。

宋江同高俅同属于地主阶级，其凶残、贪婪、仇视人民革命的反动阶级本性毫无二致，但是，在用什么方法统治人民这一点上却存在着策略上的分歧。高俅、蔡京、童贯、杨戬代表了地主阶级内部最黑暗、最腐朽的一派政治势力，他们根本“不满足于法定权利而又呼吁自己的习惯权利”，为达到毫无限制的挥霍享乐，甚至连他们自己制定的封建“法度”也不放在眼里，露出了赤裸裸的吃人凶相。像梁中书通过巧取豪夺搜括了十万贯礼物给丈人蔡京庆贺生辰，即是一例。至于他们庇护下在城乡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的豪绅恶霸、流氓泼皮，如强逼民女为妾的郑屠、霸占快活林的蒋门神、狼狈为奸陷于死命的张都监等等，更是擢发难数。他们上连下结，织成了一张遍布全国的黑暗罗网，不但逼使广大农民、市民堕入绝境，就是中小地主阶级（如王进、史进、鲁智深等）也深受其害。高俅等人如一伙贪得无厌的蛀虫，从内里蛀蚀着封建大厦的根基，加速着宋王朝的崩溃。宋江呢？在《水浒》中，他是高俅一类贪官的对立面，“自幼学儒”，“曾攻经史”，浑身上下浸透了孔孟之道的毒汁，对封建皇帝忠心耿耿，顶礼膜拜，一再颂扬“今皇上至圣至明”，他的政治理想是儒家的“王道之治”，即用更加阴险、更加狡猾的手段统治人民，消弭人民的反抗，维持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宋江自己对这一套身体力行，他从榨取来的大量财物中拿出一小部分“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骗取了“仗义疏财”的好名声。因此，他对“不会”“仁、义、礼、智、信、行、忠、良”这一套精致的骗人术，而又身居高位的高俅一派“贪官”“奸臣”十分嫉恨，对他们全不顾“大宋皇帝”统治安危而只顾填自己欲壑造成的“政日以墮”、“民日以反”的局面痛心疾首。这，就是地主阶级内部宋、高两派斗争的政治实质，也是这两派争名于朝的思想渊源。

在用什么方法统治人民这一问题上的思想分歧，迟早会转变成官场斗争。宋江的“凌云志”是要通过排除贪官、“整顿朝纲”，尽其一片忠君之心，以遂其“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之愿的。因此，宋江上梁山前后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这个既定不移的轴心转动。上山前的宋江，总想通过仕途爬上朝廷执政的高位。然而可憎得很，虽然“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由“浮浪破落户子弟”一跃成为暴发户的高俅一派是不容宋江一派来同自己分享权力和财富的。宋江“官爵升迁”的青云之路被堵死了，弄得三十多岁了还“名又不成，功又不就”，甚至刺配江州，在这场争权夺利的头几个回合完完全全被高俅一派击败了。这使得宋江怒火烧心，难怪乎他一提起高俅一伙来就愤恨之声不绝：“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至于“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这两句自述诗，更是逼真地描出了宋江以屈求伸、窥伺时机，时刻准备卷土重来，参与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的野心家嘴脸。

但是，地主阶级的残忍本性驱使着高俅一派要置宋江于死地。他们以宋江浔阳楼“故吟反诗”为由，毫不犹豫地将宋江推上法场问斩。在这生死关头，是梁山起义军的英雄们闹江州、劫法场，救得了他的一条性命。这次死里逃生，促使宋江不得不“权借水泊”，

暂时避难”，也使他找到了同高俅斗争的另一种形式和武器，这就是利用梁山起义军。这个一心除贪官、清吏治、忠君王的死硬分子眼看着通过仕途爬上去的希望已成泡影，自己在同高俅的斗争中又赤手空拳，农民起义军又是一只“小觑不得”的巨大力量，这就使他有绝处逢生之感，如他后来所供认，是可以“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借农民起义军来实现自己原来无法实现的政治目的。这一“借”一“买”，把宋江这个企图借农民起义军来买招安的投机分子真的面目暴露无遗！

毛主席深刻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这是“忠臣”与“奸臣”的斗争，也是“在野”派与“在朝”派、“失意”的奴才与“得意”的奴才的斗争。宋江的“逼上梁山”，既非“君逼臣反”更非“官逼民反”，而是“奸”逼“忠”反。宋江一类阴谋家混进革命队伍搞投机，这是历次革命闹得火热时常见的现象。从表面上看，宋江上梁山，结束了他同高俅的派别斗争，实质上，只不过是以起义队伍的阶级斗争掩盖其地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罢了。

二

宋江在高俅一类还没有堵死他通过仕途向上爬之前，开口闭口攻击造反是“于法度上却饶不得”的“灭九族的勾当”；“落难”后，虽然不再公开诅咒农民起义，但却劝要投农民起义军的武松“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上梁山后，宋江又一再对人表白心迹：“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可见，宋江的上梁山，只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策略上的转变。这就决定了宋江千方百计使这支起义队伍迎合“大宋皇帝”巩固其反动统治的需要，使梁山义军对封建统治者“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从而背叛晁盖的“托胆称王”，“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革命路线，推行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变农民起义军领导集团的阶级成份和力量对比，用忠于皇帝的保皇派取代了反抗皇帝的造反派。

晁盖是梁山革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他一道奠定梁山革命事业的还有吴用、三阮、杜迁、宋万、朱贵等革命派。待到宋江上了梁山，先是想方设法架空晁盖、排挤晁盖，晁盖一死，宋江便发动突然袭击，劳师远征，把一个狂叫要梁山起义军“人人皆死，个个不留”的河北大地主卢俊义硬拉上山来，让他“坐第一把交椅”，“作山寨之主”，企图以有“名望”的卢俊义作梁山头头来标明自己“官匪一家”的心迹，取得封建统治者的欢心、放心。此计虽遭众头领反对未得逞，但还是强行让卢窃取了副头领的要职，成为宋江执行投降路线的得力帮手。就是用这种“纳头便拜，叩首伏罪”，忏悔自己“造反”罪孽的卑鄙手段，宋江先后有目的、有计划地招降了大批反动军官和地主。这些人本来是镇压农民起义运动的刽子手，之所以能摇身一变而为义军头领，无非是由于宋江向他们保

证将来“等朝廷见用，受了招安”，共同“尽忠报国”。他们同宋江一样，反动阶级本性不变，一个个“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打的是农民起义的旗号，想的是“官爵升迁”的勾当。就是这些人，纷纷窃得梁山义军中的种种要职。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过去有的人以为这表现了梁山农民革命事业的鼎盛局面，是一次革命造反力量的大检阅，殊不知这实质上是投降主义力量的大示威，修正主义彻底篡权的大展览。请看：反动大地主卢俊义窃取了副总兵都头领的重权，成了宋江制定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干将和助手；世袭贵族柴进、地主阶级分子李应掌管了起义军的财政大权；反动军官关胜、呼延灼、董平、徐宁、张清、杨志、索超等不是“马军五虎将”、“马军八骠骑兼先锋使”，便是“马军小彪将兼远出哨头领”，他们是宋江搞阶级投降主义的骨干队伍。而梁山泊根据地的老战士杜迁、宋万只是个“步军将校”，朱贵仅仅管个“南山酒店”，而那位不“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誓不罢休的黑旋风李逵以及嫉恶如仇的鲁智深、武松等人则做个区区“步军头领”。正是因为网罗了这样一批臭味相投的人，宋江才在同高俅的派别斗争中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捞到了日后进身之阶的资本；同时，也由于这伙人作后盾，宋江才敢在一百〇八人大聚会时，公开抛出了“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的乞降纲领，并进而“菊花会”上得意忘形、踌躇满志地吟出了“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反动词句。

第二，按照“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路线，限制农民起义军的活动范围和打击对象，千方百计使农民革命变成他为“大宋皇帝”除贪官、整朝纲、清吏治、“曲线尽忠”的工具，以便在同高俅派的斗争中占据一个优势地位。

按照晁盖立志“要和大宋皇帝作对”的“聚义”造反路线，梁山起义军是一支冲击封建皇帝的“黑旋风”，它攻城夺府，扩大地盘，最终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推翻大宋王朝。然而，这对宋江来说是万万行不得的！于是，晁盖一死，宋江就用“忠义”取代了“聚义”，把农民起义军活动死死地控制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范围内。宋江为什么攻高唐，闹华州，打大名府？因为：高唐的知府高廉，是高俅的叔伯兄弟，“依仗他哥哥势要，在这里无所不为”，纵容妻舅殷天锡，陷柴进于高唐；华州贺太守“原是蔡太师门人，那厮为官贪滥，非理害民”，逮捕了鲁智深和武松；至于大名府梁中书，则是“蔡太师女婿，惯取不义之财”，而且将宋江仰慕备至的卢俊义“押去大牢监禁”。总之，宋江同这些人作对，一因为他们是高俅一类的贪官，二因为他们公开触犯梁山，其余如宋江三打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原因也不外乎此，而对其他大部分官府或大地主都是“秋毫无犯”。宋江是要以此向朝廷表明，他与高俅孰优孰劣。果然，“大宋皇帝”一旦“闻宋江等，不侵州府，不掠良民”，“专一替天行道”，便对宋江的一片忠心大加赞赏。正因为宋江篡改了梁山起义军作战的宗旨，所以他们血战多年，地盘始终限于水泊梁山，不但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大宋王朝”的统治，反而起到了为“大宋皇帝”除贪官，清吏治，整朝纲，修补地主阶级国家机器的作用，这就是《水浒》津津乐道的“替天行道”。可以说宋江上梁山前无力实现的“治国平天下”的“凌云志”，无法向皇帝尽的“忠”，现在踩在起义农民的头上部分地实现了；而朝廷依靠地主阶级国家机器无法做到的“清吏治”的事，现在通过宋江部分地做到了；宋江在同高俅的派

别斗争也已由劣势转到至少旗鼓相当了，从而可以开始完成其投降主义路线的最后一步——受“招安”。

第三，篡改梁山义军的奋斗目标，把破坏农民起义当作资本向宋王朝“入股”，以与另一派的“全面和解”来达到“尽忠朝廷”，“官爵升迁”的目的。

在尖锐的国内阶级矛盾面前的“大宋皇帝”对高俅和宋江两派都是需要的，既要利用高俅一派来高压和搜刮人民，满足自己的腐化贪欲，又要宋江一派来替他作政治支柱，澄清吏治；瓦解义军。而此时的宋江已经假手农民起义军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在地主阶级的派别斗争中抬高了身价；他又网罗了一批和自己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和高俅存在着矛盾的地主分子、反动军官作羽翼，增加了讨价还价的资本。特别在当时还存在着方腊等三支坚持革命的农民起义队伍威胁的情况下，地主阶级的利益迫切需要这两派消除宿怨，携手合作。这样，宋江同高俅的“共主”宋徽宗一声令下，两者的“全面和解”就水到渠成。“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所以，高俅一旦被俘上山，宋江便演出了“纳头便拜，口称‘死罪’”的丑剧，进而专走皇帝的姘头李师师的后门，终于争取了受招安。

综观宋江由上梁山“替天行道”，到受招安“顺天”“护国”这条“曲线尽忠”的路子，完全证实了宋代一句“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民谚：“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是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所造成的历史现象。

三

宋江争取到了梦寐以求的招安，自以为“云开见日”，得遂平生之志了。但是，事不尽然。尽管《水浒》作者吹捧“至圣至明”的天子“欲加官爵，敕令宋江等来日受职”，可是，高俅等“奸臣”却嫉恨宋江的骤然荣贵，因而几次三番向天子密奏宋江“其心不改”，是“国家之患”。这样一来，在封建官场上隐蔽进行着的派别斗争，就驱使着奴才宋江要用田虎、王庆、方腊等革命农民的鲜血，来向皇帝进一步表明“尽忠报国”的心迹。如果说，宋江在梁山打击高俅是以阶级斗争的形式掩盖着他和高俅同属地主阶级的本质，那么，现在的宋江就公开表明，他那地主阶级固有的对农民凶残、狠毒决不在高俅之下。

田虎、王庆、方腊与宋江本是同列于大宋皇帝书房屏风上的“四大寇”，但是他们与屈膝投降的宋江不同。你看：田虎占据五府五十六县，改年建号，自称霸王。王庆“于南丰城中，建造宝殿，内苑宫阙，僭号改元。”方腊“占了八州二十五县，……自号为一国”，“擅改年号”，“南面为君”。这些都象晁盖一样“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的造反英雄，宋江当然万万容不得，是必欲“灭此朝食”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动向大宋皇帝请求带兵“前去征剿”，真是“席不暇暖，马不停蹄”地为封建统治者效犬马之劳。在镇压起义农民的屠场上，宋江这个“替天行道”的强盗，一反当年在朝廷被俘军官面前“纳头便拜，叩伏请罪”的常态，对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恶狠狠地叫嚷“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仅征方腊的帮源洞一战，就杀了“方腊蛮兵二万

余级”！

就是以这样血的代价，宋江在地主阶级内部权利与财产的再分配中染红了“绯红锦袍”，爬上了“加授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的高位，获得了“衣锦还乡”的荣宠。

那么，宋江从此就交上“好运”了吗？没有。高俅等“奸臣”对宋江“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和自己一派分掌大权，“心内好生不然”，最终还是在御酒中下了毒，杀了宋江。而这个“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的顽固分子，临死前还竭力表白：“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值得指出的是，在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中，类似宋江这样叛变投敌，乞求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忠实奴才得到可耻下场，这是封建社会后期带有规律性的一种政治现象，它表明整个封建地主阶级已经腐朽透顶，除了彻底垮台之外，再也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了。

通过剖析宋江与高俅矛盾产生、发展和解决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宋江尽管由于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对立阶级之间三翻三复，但他万变不离其宗，从来没有越出封建雷池半步。他同高俅同是大宋皇帝的奴才，不过是“两种色彩的奴才”，即主张用不同方法“治民”的奴才。他们之间的差别，“丝毫不比黄鬼与兰鬼的差别大”。《水浒》的作者煞费苦心地想“表明兰鬼比黄鬼好”，这当然是极其荒谬而又徒劳的。宋江的“造反”，正象列宁当年形容俄国马赫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这真是‘跪着造反’”。

“跪着造反”——这是古今中外一切投降派的一大特色。不管他们打出什么旗号，手法多么隐晦曲折，但从本质上讲，他们终于是奴才，他们的行动准则和最高目的只能是：

“给宫廷和平，对茅屋宣战！”刘少奇、林彪一类现代投降派也正是如此，他们都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向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屈膝，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投降。今天，我们拨开笼罩在宋、高斗争上的迷雾，还宋江一类“跪着造反”的奴才的本来面目，对于我们识别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刘少奇、林彪一类现代投降派，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有着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英雄方腊和叛徒宋江

——兼谈反面教材《水浒》的出笼

史 生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发生了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这些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用革命暴力调整了生产关系，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英勇悲壮的史篇。但是，由于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混入和封建统治者对农民起义领袖的收买，以及孔孟之道的腐蚀，在农民起义队伍中产生了两条原则上尖锐对立的路线：一条是为了反对残酷的封建统治，而英勇不屈地与封建统治者奋战到底的革命路线；一条是贪官求荣，接受封建朝廷的招安，向统治者屈膝投降的路线。北宋梁山泊宋江则执行了投降主义路线。反面教材《水浒》就是一部宣扬宋江投降主义路线，恶毒咒骂方腊坚持起义革命路线的大毒草。

—

十二世纪最初的二十五年，中国处在以宋徽宗为首的腐朽的封建王朝统治之下。宋徽宗是一个极端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皇帝。他宠信被人民所切齿痛恨的“六贼”（蔡京、王甫、童贯、杨戬、朱勔、李彦），和他们勾结在一起，想方设法对人民进行盘剥压榨。为了把宫廷搞得富丽堂皇，提出了一个所谓“丰亨豫大”的口号，要把天下的奇花异石、珍玩珠宝全部集中到开封，供他玩乐享受。一一〇二年（崇宁元年）命童贯在苏杭等地设置“造作局”，集中各种工匠一千多名，进行雕刻、装画、织绣、糊抹，所需要的材料物品都是直接从东南人民身上搜刮得来的。三年之后，又设立了“应奉局”，用“六贼”之一的朱勔主持，向东南各地居民搜刮花石竹木和珍异物品。凡是看到谁家有“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指为御前之物，使护视之。”搬运的时候则“撤屋抉墙以出”。应奉局人员还借机讹诈，无数人家为此卖儿卖女、倾家荡产。搜刮得来的东西，用大量船只向开封运送，每十船组成一纲，称为“花石纲”，甚至从太湖取“高广数丈”的巨石，“载以大舟，挽以千夫，凿城断桥，毁垣折牖”，运送数月，才能到达开封。运河两岸的居民大受骚扰，人民苦不堪言。方腊就是因为“两浙苦花石之扰”，而揭起了革命的义旗。

由于宋徽宗的奢侈浪费，财政搞得十分紧张，全年的财政收入只能够八、九个月的

支用。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就多次铸造当五当十的大钱，造成封建社会的通货膨胀。另外，苛捐杂税层出不穷，还大量无偿榨取手工业者的绢帛。但仍不能应付巨大的政府开支，终于对人民仅有的一点土地下手了。在一一年（政和元年）开始设置了一个专门掠夺土地的机关，叫“西城括田所”，“六贼”中的杨戩李彥先后主管其事。名义上没收荒地和绝户土地作为公田，实际上是强占人民的肥沃土地。河南汝州鲁山县的土地适于种植水稻，就被全部括为公田，使成千上万的农民丧失土地，冻馁致死。这样的掠夺，后来一直发展到山东、河朔、淮南、江浙一带。所有湖泊的退滩地，黄河决口淹没过的土地，全部作为无主荒地没收。在朝廷大肆掠夺土地的同时，一些大官僚大地主也疯狂对农民的土地进行兼并。“六贼”中的朱勔就占有三十万亩土地，每年收租十多万石。敲骨吸髓的剥削和疯狂的土地兼并，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相继爆发了以方腊为首的江浙农民大起义和梁山泊的宋江起义。

方腊起义是公元一一二〇年（贵和二年）十一月，在睦州青溪（浙江淳安县）爆发的。起义前，他以“食菜事魔”这一民间的宗教形式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教旨（即纲领）是：“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是一种朴素的民主平等思想。这个思想的提出，是宋代农民起义的一大贡献。“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表示出要推翻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打倒封建皇帝的革命信念。反不反皇帝是农民革命队伍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不反皇帝，必然导致投降主义。方腊就是反对皇帝，争取平等的农民英雄。就在起义那天，方腊面对着许多无衣无食，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民，沉痛地激愤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所造成的罪恶。他诉说了广大农民终年劳累，所得的粮食，布帛都被北宋王朝榨去进行挥霍浪费的不平等现象，描述了老百姓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稍不如意，还要遭到鞭笞凌辱的悲惨情景。方腊的讲话，深深打动了怒火满腔的农民群众的心。所以，在方腊提出一条军事行动计划后，起义很快发动起来。方腊关于平等的主张，符合当时广大受压迫人民的要求，几天的时间，就有十多万人参加起义队伍。随即消灭了朝廷派来镇压的东南将领蔡遵、颜坦所率领的五千部队，又以破竹之势攻下东南的重要城市杭州。这时江南其他小股农民起义军也纷纷响应方腊起义，出现了“合党应之、东南大震”的局面。义军人数发展到了一百多万，控制了江浙，势力波及江西。

宋江起义发生在梁山泊地区。梁山泊位于现在山东省寿张县东南部的梁山（今梁山县）。从后晋到北宋，由于黄河两度决口，梁山周围的地区全部被黄水淹没，形成了周围八百里的大湖。“西城括田所”就把湖周围的土地全部收归朝廷。湖旁的人民无衣无食，转徙于沟壑。或被迫入湖打渔，并要纳种种捐税。在这种情况下，一一九年左右，梁山泊农民起义爆发了。起义军主要在山东、河北、河南、苏北一带活动，给了宋王朝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使“数万官军，无敢抗者”。

这两支义军使赵宋王朝惊恐万状，慌忙派兵镇压，但几次都被义军击败。这时朝廷就使出刽子手和牧师的两手政策。一方面调遣精兵，把集中在汴京准备联金抗辽的精锐部队都投入镇压农民起义的战场；一方面对义军“赦罪招安”。更为毒辣的是，想使两支义军互相残杀。当时摆在义军面前的就是两条路线：一条是把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革

命战争进行到底；一条是向封建统治者投降，并反戈镇压农民起义，充当地主阶级的奴才。佃农出身，对赵宋王朝怀有深刻阶级仇恨的方腊，领导起义军执行了一条坚持斗争到底的正确路线。当时，宋徽宗派了他的亲信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出动了最精锐的京几禁军进行镇压，方腊亲率起义军英勇抗击。最后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回帮沅洞。在敌人放火烧洞的情况下，一一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高举争取农民平等革命大旗的英雄方腊，在浴血奋战中被俘，惨遭反动统治者杀害。

宋江和方腊相反，当梁山义军横行河塑，官军无法抗拒的时候，反动的宋朝统治者就看中了他。闲居在外的刽子手侯蒙上书朝廷，建议招降宋江，让宋江去打方腊。^①朝廷非常赞赏侯蒙的建议，在一一一九年十二月（贵和元年）下诏“招抚”宋江。^②海州知州张叔夜接“招抚”宋江的诏令后，侦察到宋江想乘船下海，在一一二一年二月，预先在海边设伏，以少量部队引诱义军上岸作战，待义军离船后，伏兵乘机烧毁了船只，战斗中义军副将被俘，宋江也主动向敌人缴械投降了。^③投降后，参加镇压农民起义。《水浒》写了宋江投降打方腊的全部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

二

在宋江投降赵宋王朝这一历史事实基础上，元末产生了反动小说《水浒》。在北宋末年的农民革命中，方腊起义是主要的革命势力，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加速了北宋王朝的灭亡，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从方腊起义本身来说，很具有故事性和波澜壮阔的斗争场面。从以宗教形式的准备起义到起义的发动宣言，从抗击官军的剿捕到据州夺县，还有巍峨险峻的地理环境，优美动人的民间传说，都值得大书特书的。特别是方腊这样顶天立地的英雄，方百花这样的妇女领袖，本身就具有文艺色彩。他们的事迹长期的在民间流传不息，为我国人民所景仰和爱戴。可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除了民间传说外，没有任何一部传奇或小说之类来歌颂他们。《水浒》把历史背景放在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上，不写方腊，不写坚持斗争的革命精神，而对他们这种革命精神给以种种歪曲漫骂，用来反衬宋江的“英雄”形象，这就清楚地看出《水浒》这部书的反动立场。它适应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政治需要，力图通过歌颂北宋末年农民革命队伍中的投降主义和叛徒，来达到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反动作用。

《水浒》产生在元末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这不是文人创作的偶然现象。封建社会到了宋朝，走下坡路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农民起义的革命浪潮则越来越高涨。从北宋末年燃起的农民革命烽火，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南宋，燃烧得更加猛烈了。据记载，南宋时期大小农民起义有一百多次。反动朝廷的武力镇压失去了效用。统治阶级在这种形势下，变换手法，加强了孔孟之道的宣传，拾出程朱理学，用封建主义思想意识来腐蚀广大人民。程朱理学把孔孟之道给了哲学的概括和总结，系统化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为了适应地主阶级的需要，出现了用话本、剧本、戏曲等容易接受的文艺形式宣传封建主义思想的作品。宋江和《水浒》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街头巷尾以说话、演剧的

形式流传的。据有关资料记载，反动的封建统治者不但不禁止传播，甚至鼓励这种传播。有的封建文人，写了《宋江三十六人赞》，还有的给三十六人画了像。这足以证明宋江的阶级性质，也能够说明宋江从起义到投降基本符合地主阶级的要求。宋江和《水浒》的故事在传播过程中，揉进了许多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封建主义思想，到了宋末元初出现了《宣和遗事》这个结构比较完整的话本，这个话本描写了宋江从起义到投降，又去打方腊的全过程，公认是《水浒》最早的底本。到了元末，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激化，红巾军大起义敲响了元朝统治的丧钟。而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统治阶级认识到抚比剿更起作用。因此，更重视了剿抚两手的并用。有一些打着农民起义旗号的人，就接受了元朝的招安、封号，转而和红巾军对立。有一些有个人野心又不得志的地主阶级人物，这时就力图通过投农民革命之机来入朝当官。有的农民起义领袖被混进农民革命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所腐蚀，改变了阶级立场，也接受了封建朝廷的招安。元末农民起义军中的张士诚、方国珍就分别是这两种人物的代表。他们把受招安的思想带进农民起义队伍，并通过对起义队伍的领导权，使这种思想形成一条路线，即农民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路线。这是反动朝廷的招安政策和混入农民起义队伍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相互作用的结果。在阶级斗争的发展中，出现了这种新形势、新特点，已经不是片断的章节的话本戏曲所能反映得了的。阶级斗争的发展，要求有一种文艺形式更完整、更系统的表现这种大规模的复杂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水浒》这样长篇小说在这个时期产生的社会根源。决不象有些文学史家所说的，是文体发展的结果。唐朝就有了结构完整的传奇，到了宋朝的话本，文体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变化，而这个期间有五百多年。但从南宋到元末一百多年的时间，就从话本发展到《水浒》这样的长篇小说，除了阶级斗争的需要能够产生这样强大的推动力以外，没有第二种解释。而《水浒》就是适应着这种阶级斗争的发展，反映着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政治需要而产生的。

在元末的农民大起义中，张士诚是农民起义队伍里投降主义路线的代表。他接受了元朝政府的龙衣、御酒、官号，背叛了农民革命，并为元政府从海道运粮，支持这个垂死的政权。后来，他发展成为割据一方的封建军阀，被朱元璋灭掉。《水浒》的作者施耐庵和张士诚的部将卞元和是好友，据传说，还曾参加过张士诚的起义。而为《水浒》编次，和施耐庵有师生关系的罗贯中，更是一个有强烈正统观念的封建文人。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必然要反映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政治要求，为巩固封建秩序服务。施耐庵以一个失意的封建文人身份，十分容易接受张士诚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并站在地主阶级立场鼓吹这种路线。他有了现实中投降主义的思想基础，又有了历史上宋江搞投降主义的原始素材，这就产生了《水浒》这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作品。历史上的投降主义亡灵通过元末的投降主义路线在《水浒》中复活了。宋江经过乔装打扮，成为作者观念的化身，为我们今天研究投降主义提供了一部极好的反面教材！

注释：

- ①《东都事略·徽宗纪》 ②《皇宋十朝纲要·徽宗》 ③关于宋江打方腊的记载可分别见：（一）宋史、侯蒙传》《宋史·张叔夜传》，这是利用宋江征方腊的第一步骤；（二）《资治通鉴长编·宣和三年四月》《皇宋十朝纲要·宣和三年六月》《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二和卷二一二。这是宋江征方腊的过程。

历史宣告了叛徒哲学的破产

——评《水浒》研究中的所谓“农民的局限性”论

金钟鸣 金恩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大量的评论都是肯定和推崇《水浒》以及它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美化和歌颂宋江这个农民革命叛徒的。这些评论中的一个基本观点，便是所谓的“农民的局限性”论。

一定的思潮和理论，总是为一定阶级推行其政治路线制造舆论。“农民的局限性”论，正是适应刘少奇、林彪之流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搞民族投降的需要而产生的，是涂上了一层金粉的叛徒哲学。按照这种理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是所谓“农民的局限性”；宋江乞求招安、向封建王朝屈膝投降，也是所谓“农民的局限性”。这种理论使假乱了真，黑变成白，谬误冒充真理。农民革命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被抹煞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一锅煮了，斗争不屈而失败的英雄脸上抹了黑，追求升官而投降的叛徒却彪炳于史册，是非混乱到了极其荒谬的地步！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谬论，是不折不扣的阶级调和论。今天，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它进行深入的彻底的批判。

什么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农民的局限性”论认为，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提不出合乎“社会发展的先进思想”，“宋江受招安，是农民思想的反映”，农民革命最终总是要失败的，不受招安，也要以另外的形式失败（或被镇压，或被利用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因此，接受招安只不过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失败的一种形式，同其它失败结局比较，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农民起义提不出合乎“社会发展的先进思想”吗？不对。革命的农民有着合乎社会发展的先进思想武器。仅以宋代农民起义为例：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明确提出“均贫富”，和宋江同时的方腊起义提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南宋钟相、杨么起义进一步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这些响亮的战斗口号，震撼了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猛烈地冲击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

土地，实现平等、民主的革命愿望。当然，在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只能是封建的思想，这是符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的。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作为地主阶级的对立面而存在，它所处的被剥削地位，决定了他们必然产生反抗地主阶级、否定封建制度的革命思想，这同样是符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的。所谓农民造反提不出合乎社会发展的先进思想，完全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歪曲，是为了替《水浒》中的宋江投降主义路线进行辩护。

“宋江受招安，是农民思想的反映”吗？不是。中国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毛主席说：“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我国历史上，无数起义农民在反抗封建黑暗统治的斗争中，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英勇战斗，壮烈牺牲，这才是我国历史上革命农民的高贵品质，也是农民起义所以能够发展壮大，有力地打击封建王朝，取得一定胜利的重要因素。至于农民革命队伍中出现宋江这类叛徒，或者他们本来就是打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或者是受了地主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把宋江乞求招安、叛变投降，说成是“农民思想”，就是对我国农民革命传统的诬蔑。

在这里，所谓“农民的局限性”论，实际上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推动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农民起义，如大海之怒涛，所到之处，官府的赋税不纳了，劳役不服了，地主阶级的威风扫地以尽，动摇了以至推翻了旧的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因此，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历史上的陈胜、吴广、黄巢、王小波、方腊、钟相、李自成、洪秀全等领导的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对封建王朝的斗争，都是“政治变革的基础，并且最终决定一切政治变革的命运。”在《水浒》中，宋江从维护和巩固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出发，变梁山泊农民起义军为替地主阶级效劳的反革命武装，疯狂镇压其它农民革命队伍，替封建阶级扑灭了熊熊燃烧的农民革命烈火，这怎么能同革命农民坚持起义的路线、斗争失败同日而语？这种倒行逆施的反革命活动，是同历史发展背道而驰的，是地主阶级掀起的反革命逆流，根本不是什么“农民的局限性”！

诚然，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当时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领导，农民起义不能牢固地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不能结束封建制度，最终总不免归于失败。对于这种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可以也只能从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从当时的具体的阶级和历史条件上，加以科学的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指出这种局限性，是以充分肯定农民起义的革命性为前提的。列宁指出：“根据社会主义的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根据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学说，前进的动力是社会上所有认识到某种制度‘不完善’的人的团结精神。前一种学说是唯物主义的，后一种学说是唯心主义的。”我国千百次农民起义历史证明，只有把革命斗争坚持到底，才能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宋江反贪官、尊皇帝，向封建王朝投降，只能把历史拉向倒退。把宋江投降说成是“农民的局限性”，是诬蔑农民革命、否定封建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

谬论，是地地道道的历史唯心主义，今天，该是澄清的时候了！

什么是坚持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

为了替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寻找理论根据，所谓“农民的局限性”论还把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革命都说成是只能反对贪官而不反对皇帝的。它认为，这种“农民局限性”，反映在《水浒》里，就是一方面杀贪官污吏，一方面寄希望于皇帝，准备接受招安。有的还说：“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忠君’与‘爱国’是可以结合的”，甚至把宋江向封建王朝投降，说成是由于民族矛盾加剧的必然结果，说宋江是“概括了宋元以来农民起义军领袖性格历史真实性的一个方面”。

众所周知，每一个阶级的统治，都是通过自己阶级的代表人物来进行的，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则是通过封建皇帝这个总代表来维持统治的。农民起来造反，当然要反对贪官污吏、地主豪绅，打倒封建统治赖以生存的基础，反贪官是为了反皇帝，为了推翻封建王朝。如果不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皇帝，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就是一句空话。在我国历史上，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就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革命口号，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提出“冲天”的战斗口号，直指以“天子”为象征的地主阶级专政。坚持以反对皇帝为中心内容的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是贯穿于整个中国农民革命史册上的一条鲜明的红线，代表社会前进的主流。

寄希望于皇帝的，是混入农民起义队伍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叛徒。陈胜、吴广起义，曾混进一些奴隶主余孽孔鲋、张耳、陈余之流，把武臣等起义将领拉下了水，使这次起义走上了分裂、失败的道路；黄巢起义军建立的大齐政权，使唐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反动派从内部收买了起义军重要将领朱温，里应外合，使革命失败。历史上武臣、朱温之流的路线，同《水浒》中的宋江的路线一样，就是农民革命队伍内部的一条投降主义路线。这条不反皇帝、接受招安的路线，从来就不是什么“农民的局限性”，而是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本性在农民起义队伍内部的曲折表现，是封建皇帝对农民起义实行收买政策的产物。如果把《水浒》中宋江标榜的“替天行道”，也即替皇帝行孔孟之道，为“至圣至明”的“天子”“整顿朝纲”，除掉“贼臣”，修补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也叫做什么“农民的局限性”，那末，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原则斗争，岂不就不复存在了吗！

至于借口宋元时期民族矛盾尖锐化，把“忠君”和“爱国”调和起来，为宋江的阶级投降主义辩护，这种论据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北宋王朝当时，我国边疆辽和西夏奴隶制残余的军事政权对北方地区的侵扰，形成了这两个民族统治者同北宋政权和广大人民的尖锐矛盾。北宋统治者认为，“外扰”“皆可预防”，而“内患”“深可惧也”，对辽和西夏两个军事政权的进逼一味容忍妥协，而倾其主要力量加强对农民阶级的控制，对农民起义加紧镇压和收买。这个民族投降主义路线的头子，就是北宋皇帝。到宋徽宗时，这种民族投降主义路线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水浒》中的宋江，诚惶诚恐“忠”于这样的“君”，他的“爱国主义”云云，岂不是一句骗人的鬼话！《水浒》的作者由于受其反动的阶级立场决定，

在书中编造了宋江招安后征辽的情节，不仅把宋江这个农民革命的叛徒，打扮成民族的英雄，而且为北宋王朝对内搞阶级镇压，对外搞民族投降涂脂抹粉，这个险恶的政治目的，今天也该是彻底戳穿的时候了！

谁是值得歌颂的农民起义的英雄

《水浒》中的宋江，是中国“农民运动领导者不朽的典型”——所谓“农民的局限性”论，多年来唱着这样的赞美词。为了维护宋江这顶桂冠的神圣，还指责别人，不该怨宋江“妥协”，不该“骂他是投降主义者，出卖了革命”，“这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农民的局限性”使“起义农民不可能没有荣华富贵之心”，所以宋江为了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也就无可非议了。

这样，所谓“农民的局限性”论，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问题：到底谁是值得歌颂的农民起义的英雄？

宋江真的是值得歌颂的“农民运动领导者不朽的典型”吗？否！农民起义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是革命同反革命、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生死搏斗。两军对战，营垒分明，毫无调和的余地。在这场斗争中，站在农民一边，反对地主的，就是革命派；站在地主一面，反对农民的，就是反革命派。混入起义队伍，干着替封建王朝效劳的勾当的，是内奸；曾经站在农民一面，又站到了地主一面的，是叛徒。“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宋江，是个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分子，他以阴谋诡计篡夺梁山泊领导权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晁盖“要和大宋皇帝作对”的革命路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他既是瓦解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骗子，又是镇压其它农民起义军的屠夫。他是农民革命队伍中的内奸和叛徒的双料货。对于宋江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农民的局限性”问题，他只有反对农民革命、瓦解农民起义队伍、镇压农民革命斗争的地主阶级本性。如果把宋江的叛卖革命说成是“农民的局限性”，就是向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宣扬不要革命、不要斗争的阶级投降论，就是向已经举起长矛、大刀奋起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人民，鼓吹放下武器、屈膝投降的叛徒哲学。

“宁为断剑头，毋为曲如钩”，我国农民革命运动史上，千百万起义的领袖和群众，在封建王朝的残酷镇压面前，都坚持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即使是在革命失败的时候，也是宁死不屈。象宋江那样的叛徒，充其量不过是一小撮。不防仍以与宋江几乎同时的方腊起义为例，在北宋王朝的反革命围剿下，这支队伍临近失败，被敌人包围以后，以方腊为首的革命农民，英勇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全部就义，没有一个投降的。相比之下，宋江却在梁山泊起义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打出白旗，投降朝廷。前者难道不值得大书特书，永远令人景仰吗？后者难道不应该受到谴责，永远叫人唾弃吗？

鲁迅对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无数坚持斗争、反对投降的英雄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水浒》宣扬投降主义，为叛徒

宋江树碑立传，歪曲农民英雄，但也不能完全掩住李逵、吴用、阮氏兄弟的革命气概。而“农民的局限性”论却是在为《水浒》补苴罅漏，把叛徒宋江捧上了天，用“农民的局限性”的药方洗刷叛徒的无耻，抹煞英雄的崇高，一笔勾销叛徒和英雄的根本区别，这难道不是一种典型的叛徒哲学吗！

宋江投降，根本不是什么“农民的局限性”，而是地主阶级的反动本性。宣扬宋江投降是“农民的局限性”，就是为一切混入革命队伍的内奸、叛徒干叛卖的勾当，开了绿灯。这是我们所绝对不能容忍的！无情的历史将永远把一切叛徒和叛徒哲学推上审判台！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的指示，拨开了笼罩在《水浒》研究和宋江评价问题上的重重迷雾，也宣告了所谓“农民的局限性”等替《水浒》的投降主义和宋江的叛徒哲学辩护的理论的彻底破产。

八百年前，《水浒》中宋江这个古代投降派，“大军一到，便受招安”，在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面前，被碾得粉碎，去见他的九天玄女娘娘了；八百多年以后的今天，林彪这个现代投降派，未等苏修“大军”来到，就仓惶跑去投降，落得折戟沉沙、身败名裂、化为粪土的可耻下场。然而，革命没有完，斗争在继续。让我们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的大旗，充分利用《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深入批判反动的阶级调和论和叛徒哲学，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英勇战斗！

“双重性格”论就是美化叛徒

马清福

毛主席最近关于评《水浒》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戳穿了宋江搞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反革命真面目，是我们开展对《水浒》评论的思想理论基础。对照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看看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最近几年来关于《水浒》的一些评论，就会发现有些评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美化甚至肯定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把宋江这个投降派的代表说成是农民起义的英雄，把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同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混为一谈，散布了一系列的阶级调和论。

因此，在开展对于《水浒》的评论和讨论的同时，对这种阶级调和论也必须给以批判，以便澄清思想，肃清流毒。

《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表现在对宋江这个投降派代表的性格的分析中，表现在对宋江所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的看法上。有的认为：“宋江的思想性格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在他身上既有革命、反抗的一面，……又有软弱、妥协、动摇的一面。”这就是所谓宋江既有妥协性又有革命性的“双重性格”论。这种理论正是阶级斗争调和的理论，是形而上学的折中主义、二元论，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阶级社会里，一个人的性格，不管多么复杂，多么充满着矛盾，但总是有它的阶级本质的。马克思说过：“资本家的一切动作只是资本的机能”。这也就是说，不管资本家的性格多么复杂，多么充满矛盾，但他的活动仍然是“资本”这个本质的反映，他仍然是资产阶级分子；宋江也是一样，不管他的性格多么复杂，多么充满着矛盾，他仍然是一个地主阶级分子，他在梁山所推行的一条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路线，恰恰是他地主阶级本质的反映，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复杂的充满矛盾的现象中揭示人的阶级本质和人们之间的阶级区别。“双重性格”论者，恰恰离开了阶级分析的观点，陷入了阶级斗争调和论的泥坑。

“双重性格”论者硬说宋江这个农民起义的叛徒身上还有什么革命的反抗一面，他们还找了一系列站不住脚的理由，做了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所谓分析：浔阳楼题“反诗”表现了宋江内心存在的“革命的愿望”呀！是宋江“转变的新起点”呀！真的是这样的吗？浔阳楼题“反诗”，只不过是宋江在功不成名不就而又被判刑、刺配的情况下所发的一点牢骚，根本不是什么“转变的新起点”；诗中所抒发的是一个阴谋家“怀才不遇”的反革命的抱负，根本不是什么“革命的愿望”。“他时若随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充分暴露了他的地主阶级立场。黄巢号称“冲天大将军”，是要造

封建天子的反，宋江是要“替天行道”，即替封建皇帝镇压人民之道，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敢笑黄巢不丈夫”，只能是宋江反革命野心的写照，决不象“双重性格”论者所说的“他要做一番比黄巢更大的革命事业”。“反诗”不反，宋江的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没变。

宋江上梁山“开始了革命生涯”呀！“做了一系列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呀！这是“双重性格”论者又一论调。为了证明这种论调的正确，他们竟不惜为宋江这个农民起义的叛徒评功摆好，说什么宋江上梁山后“四方豪杰望风而来”；说宋江在起义军内部的“团结上起了作用”。

什么“四方豪杰望风而来”，实际是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望风而来”的无非是卢俊义、呼延灼之类世袭贵族、失意的官吏和豪绅地主，而对于真正的革命派，他是压制、排斥的，宋江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受招安拼凑反革命的黑班底。

宋江上梁山，推行投降主义，压制以李逵为代表的农民起义的路线，破坏了起义军内部的团结，导致了起义军队伍的分裂。宋江一宣布投降，“当下辞去的就有三五千人”，难道这是增强了“团结”吗？宋江一打方腊，“众弟兄”死的死、散的散，难道这也是增强了“团结”吗？不是，完全不是，这是对农民起义军团结的最大破坏。

宋江搞的所谓“团结”实际上就是镇压李逵等所代表的正确路线。李逵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宋江认为这厮胡来。“忠义”乃“哥们”的信条。宋江就是以这种政治手腕，利用“哥们义气”的所谓团结，把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这些反对投降主义的英雄给压下去了，同时又是利用“哥们义气”的所谓“团结”混淆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从而使“众兄弟”为自己的投降主义效劳。什么“义重如山”呀，什么“四海之内皆兄弟”呀，统统不过是一场骗局。当面说得好听，背地又在捣鬼，这一切投降派、阴谋家惯用的伎俩。所谓“哥们义气”的所谓团结，实际是宋江使用的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这才是宋江所谓的团结的实质。梁山农民起义正是在宋江投降路线操纵下，分裂而失败了。

毛主席说：“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的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又说“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宋江的性格，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投降主义的方面决定的，他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投降派，根本谈不到还有什么革命性。

“双重性格”论者看不到“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方面所规定的”这一真理，因而抹杀了阶级界限，看不清事物的本质，从而掩盖了事物的真相。

折中主义，二元论，往往冒充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把两点中的重点论偷偷地抽去。“双重性格”论者就是这样地掩盖了宋江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陷入了阶级斗争调和论，起了替叛徒涂脂抹粉的作用。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最近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提高认识，肃清流毒，学会识别投降派，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水浒》投降主义的三部曲

丰满发电厂工人理论组

毛主席关于《水浒》的重要指示，深刻揭露了《水浒》投降主义的反动实质。学习和领会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水浒》投降主义路线的主要内容。《水浒》中这样写道：“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还通过宋江之口，一再表白：“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从始至终都表明以宋江为头子的农民起义是只反贪官，不反朝廷的。

在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上，有过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吗？

请看唐朝末年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黄巢起义明确宣布斗争纲领，立誓杀尽贪官污吏，推翻唐朝的反动统治。黄巢号曰“冲天大将军”，冲天，就是冲击皇帝，冲击天子，冲击唐朝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黄巢亲帅六十万大军，攻占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历时三年。黄巢农民大起义奏响了反贪官又反皇帝的气壮山河的乐曲，谱写了农民起义的壮丽史诗。

反贪官又反皇帝，这是自陈涉、吴广起两千一百余年大小数百次起义的共同特点和斗争目标，这是起义农民在血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最宝贵的革命经验。

我们知道，皇帝是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是地主阶级的总后台，总根子。一切贪官都是源于皇帝的。贪官坏，该反！皇帝更坏，更该反。农民阶级要获得自身的解放，就非反皇帝不可。宋江以前的农民起义是反贪官又反皇帝的，宋江以后的农民起义也是既反贪官又反皇帝的。只是宋江及其别的农民起义的叛徒们例外。因此，反贪官又反皇帝，这就是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反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便是农民起义中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投降主义路线。

受招安是贯穿于《水浒》全书的一条投降主义路线的黑纲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受招安的前提，受招安则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必然结果。

《水浒》写宋江在上梁山之前，就对去二龙山入伙的武松说：“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留得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宋江上梁山后，这种受招安的投降欲望更加强烈，投降主义的立场更加坚定，他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他在一百零八个首领的大聚会上公开宣布“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的乞求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的黑纲

领，还写了一首满江红词，其最后两句为“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当太尉陈宗善进山寨颁布招安的诏书时，宋江便如获至宝，欢喜若狂，倒头便拜，活画出了投降派宋江死心踏地地效忠大宋王朝的奴才嘴脸。

在官场上奔走钻营了大半生的宋江，形成了一整套地主阶级腐朽反动的世界观。他有野心，那就是要改变他这个饿狗的地位，想当饱狗高俅那么大的官；他有个人的卑鄙私欲，那就是“封妻荫子”、“光耀祖宗”、“青史留名”。他要手腕，大搞阴谋诡计，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把卢俊义这样的大地主、大恶霸也拉来坐上了梁山第二把交椅。使梁山农民起义的领导权完全落在阶级异己分子的手里了，“大军一到，便受招安”，就成为必然的了。篡权为招安，招安为做官，这就是宋江搞投降主义路线的根本目的。

《水浒》的作者企图把受招安的宋江做为样板，让农民起义都走这条投降的路。这是一条地主阶级永远统治农民的路。无数史实证明，地主阶级从未给农民以出路，也从未叫农民安宁过。相反，地主阶级给与反对过他们的革命农民的，只是杀头，杀头，杀头！血淋淋的阶级斗争史实，教育着代代农民，使农民们看清了地主阶级的假仁假义，所以，不断地暴发农民大起义。

宋江受招安搞投降主义，是古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搞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是现代投降派。他们都是投降派，是一丘之貉，一路货色，没有什么区别。

“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宋江接受招安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打不受招安、同宋徽宗斗争到底的方腊。

方腊是我国北宋末年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一位伟大的农民英雄。早在准备起义的漆园会上，方腊就发表了庄严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方腊深刻指出：“当轴者皆龌龊邪佞之徒，在外监司牧守，亦皆贪鄙成风”。“龌龊邪佞”的“当轴者”指的就是宋江认为的“至圣至明”的宋徽宗等当权派，“贪鄙成风”的“监司牧守”就是那些贪官污吏。方腊说得何等好啊！他把腐败透顶的北宋王朝揭露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在这个宣言中方腊又说：“画江为界，轻徭薄赋，以宽民力，十年之内，终当混一。”这里，方腊为农民起义、统一全国，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思想，表现了农民英雄的宽广博大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见识，以及推翻北宋王朝的坚强意志。方腊起义后，身先士卒，英勇善战，置生死于度外，深得人民拥护，起义军迅速壮大到百万以上，占据了八州二十五县。后来，方腊在战斗中不幸被俘，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慷慨就义。

对方腊取什么态度，支持还是反对，这是鉴别革命派或者反革命派的试金石。宋江接受招安之后，一反在封建统治阶级面前奴颜婢膝的常态，在打方腊的过程中却摆出了杀气腾腾的架式，声称“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反革命立场何等坚定，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在我们缅怀先烈，追念方腊英雄业绩的时候，更加激起我们对宋江这个反革命投降派满腔的愤怒和无比的仇恨。

不管《水浒》作者怎样为投降派树碑立传，也不管《水浒》的颂扬者为它演奏几部赞美曲，我们总是要扒去《水浒》的画皮，还其投降主义路线的真面目。我们就是要反《水浒》作者颂扬投降主义之道而行之，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开展对《水浒》

的评论，投入这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继续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续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上层建筑领域里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从李逵之死谈起

延边驻军 李智兵 刘世明 李俊民

宣扬投降主义哲学的《水浒》最后一回里有这样的描写：正当宋江飞黄腾达、踌躇满志的时候，宋天子为了杜绝后患，给他送去了“御赐”鸩酒。宋江饮后，知道自己再也不能为天子效忠了，但只恐“结义兄弟”李逵造反，坏了他“一世清名”，于是，便连夜设计骗来李逵，把鸩酒给李逵喝了。第二天，当李逵听说皇帝送来了毒药酒时，大声叫道：“哥哥，反了罢！”不料，宋江却说：“我已经服了，死在旦夕。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已与你药酒吃了。”李逵听了这话，猛然醒悟，不禁两眼垂泪，终于成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牺牲品。

这个撼地摇天的“黑旋风”李逵，为什么会这样死去呢？关键在于他上了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宋江所施的“义气”的当。只认“哥哥”，不认路线，没有识破宋江的反动真面目。早在上梁山之前，地主家庭出身的宋江，为了达到“官爵升迁”的卑鄙目的，以标榜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骗取了人们的赞扬，被称为什么“呼保义”、“孝义黑三郎”、“及时雨”等等。李逵是被压在封建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怀着满腔的阶级仇恨，要反抗封建皇帝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在江州监狱里和宋江偶然相会，李逵当即拜宋江为结义“哥哥”，并想方设法救护宋江。上梁山以后，宋江窃取了梁山农民起义的领导权。当宋江提出投降招安时，李逵坚决反对，宋江就以“义气”感化，先下令叫：“斩讫报来”！后又假惺惺地滴着眼泪对众人说：“我在江州，醉后误吟了反诗，得他气力，他与我身上情分最重，如骨肉一般。”接着又说：“且看众兄弟之面，寄下你项上一刀。”单具有造反精神，却缺乏一定政治觉悟的起义农民代表李逵，只以为宋江有“义气”，那里知道在“义气”的背后隐藏着“投降”和“杀机”因而连声道谢，还表示：“哥哥剐我也不怨，杀我也不恨。”结果被宋江以封建“义气”蒙住了眼睛，使李逵不自觉地充当了投降主义路线的俘虏，以至被断送了性命。

李逵坚决反对皇帝，反对投降，最后不但不曾反了，而且成了宋江效忠皇帝的牺牲品。这一沉痛教训，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不但要敢于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且要在革命过程中，同竭力维护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必然要像宋江那样，乞

求于孔孟之道，利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传统，腐蚀、毒害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垂死挣扎。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宣扬什么“仁者爱人”、“以仁爱之心待人”、“杀身以成仁”等反动思想，就是一个例证。今后，随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深入进行，新的修正主义分子将还会不断变换手法，改变策略，向无产阶级展开进攻。要防止李造的悲剧在今天重演，我们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思想上与旧的传统观念划清界限，“同万恶的资产阶级制度的种种残余，同深深盘踞在工人意识中的小私有者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宋江和武训是一丘之貉

李广鼎

在《水浒》和《武训传》这两部歌颂投降主义的姊妹篇里，主人公宋江和武训，一个号称“呼保义”，一个号称“义学正”，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无耻奴才。

武训讲“良心”，宋江讲“忠义”。何为“良心”？武训用自己的行动做了恰到好处的注脚。在大地主张举人家，他象一条百依百顺的狗，总是拣“顶苦顶脏的活”干。扛麦子，“别人扛一袋，他却扛三袋”。狗腿子有意“戏弄他”，给他再加上一袋，弄个嘴啃泥，他也不在乎。了头小桃骂他软骨头，他却美其名曰，我这叫“凭良心”。张举人欺他熊包，骗他三年工钱，把他打的死去活来，长工周大义愤填膺，毅然把他救出虎口，发誓要“杀尽这些吃人的虎狼”，让“将来的天下都是咱穷人的”。武训却坚决反对，大声疾呼：“大家要凭良心啊！”可见武训的“良心”就是要甘心情愿地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不能反抗。

宋江的“忠义”又是什么货色呢？他认为，“起义”、“造反”，是干了“灭九族的勾当”。“忠”是忠于朝庭，“义”又必须从属于“忠”。所以几次拒绝上梁山。在发配江州的路上，他被梁山起义军救出时，为表示自己忠于国家的“法度”，竟连套在脖子上的长枷也不许打开。直到临死前还念念有词：“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凭“良心”，只能当奴才，讲“忠义”，必然要投降。武训的“良心”也好，宋江的“忠义”也罢，都只不过是甘当奴才的代名词罢了。其宗旨就是死心塌地地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其实质都是“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在充当地主阶级奴才的罪恶勾当中，武训挑出了“行乞兴学”的幌子，宋江挂出了“替天行道”的招牌。

“行乞兴学”就是利用行乞的方法讨钱“修义学”，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为巩固反动的封建统治效劳。武训身为乞丐，面对大地主张举人那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却垂涎三尺，望眼欲穿。他妄图利用“行乞兴学”作阶梯，爬上那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白玉杏坛”，挤进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列，更恶毒的是他借鼓吹人们念书之机，到处散布“助兴义学”可以“解放穷人”，“准叫你子子孙孙坐八抬大轿”之类谬论，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使人们都顺从其“良心”。他“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起到了在朝的统治者起不了的作用。

宋江“替天行道”，就是替封建朝廷行孔孟之道，瓦解和镇压农民起义。宋江出身地主，本人又是个“刀笔精通，吏道纯熟”的小官吏，由于在地主阶级狗咬狗的争斗中落了伍，不得不“暂占水泊，权时避难。”梦想通过“替天行道”这条“杀人放火受招安”的“终南捷径”，“博得个封妻荫子”、“青史留名”，把农民起义队伍引向毁灭的道路，为其封建主子效劳。与武训的招法比较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武训“行乞兴学”和宋江“替天行道”的肮脏历史中，他们“对反动派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表现了一付丑恶的奴才相。为了两个铜钱，武训装疯卖傻；当驴变马，猪狗不如，竟然跪在血债累累，罪恶多端的赵熊魏面前苦苦哀求：“来吧，你们打吧，一锤两个钱，一脚三个钱。”让他们随意踢打和侮辱，脸上被打出血来，还要喊声“谢谢”。这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达到了何等猖狂的地步。而“自幼学儒”的宋江，为讨“皇帝一道招安赦书”，在梁山的死对头高求被擒上山后，亲解其缚，低三下四地乞求“恩悯”。还象他的祖师爷孔老二那样去走勾栏妓女李师师的后门，派人去宿太尉处行贿，下流到不能再下流的地步。比之武训，并不逊色。

宋江和武训，一个是“义士”，一个是“义丐”，两人形影相吊，是一丘之貉。我们一定要积极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批判宋江之类的投降派，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努力战斗。

学理论抓路线促大干的辩证法

纪 哲

当前，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指引下，一个学理论、抓路线、促大干的社会主义高潮正在兴起，各条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断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革命和生产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局面。

实践证明，学理论、抓路线、促大干，是把贯彻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同贯彻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紧密结合起来，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的基本路子。它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理论和路线，革命和生产的辩证关系。我们要掌握对立统一规律，正确认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学理论、抓路线、促大干，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新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我们观察和认识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是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不仅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鲜明地提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并且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揭示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新事物与旧残余相互联系、相互斗争的发展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和实际内容。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才能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有的同志初步学习后，就觉得“差不多”了，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对学习理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学理论和抓路线的关系认识不清。理论是路线的思想基础，是革命行动的指南。不认真学习理论，对重大的理论问题不弄清楚，就不可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社会主义社会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许多事物的两重性也都反映着这样的特点，修正主义往往把那些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东西加以扩大或歪曲，从“左”右两个方面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搞不清楚，就很容易上当受骗。为什么有的同志主观上想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实践中却左右摇摆，甚至跟着错误路线跑？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修正主义东西，又重新拣了起来？为什么对几个“一部分”中刮起的资产风，不能有力地打击和自觉地抵制？许多单位的同志通过学习理论，找到了答案，就是没有在理论上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因此，不能识别和抵制刘少奇、林彪一类的修正主义路线，对于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根源就更不清楚了。有些单位虽然注意了和资本主义倾向斗争，但光是掐“尖子”，

没有做铲除旧土壤的工作，因而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原因也在这里。我们要十分珍惜这次学习的大好时机，认真学习，力求学得深一些，扎实一些。理论问题搞清楚了，行动才有正确的方向，才能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从而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做到学懂弄通，必须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努力。要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方面都有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学习理论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因此，我们的学习决不能离开对于实际情况的研究和分析。许多单位通过认真读书，联系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已经对那里的学习运动起了比较明显的推动作用。他们说：理论联系实际，威力大无边，再多的问题也能解决，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再差的单位也能变面貌。实践证明，通过联系实际，解决问题，提高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会更加感到学习理论的重要，进一步把学习引向深入。

毛主席指出：“路线是个纲。”路线是一个阶级的利益、要求和世界观的集中体现，是指导行动的准则。路线是决定一切的。路线对了就前进，路线错了就倒退，路线摇摆就徘徊，这是为马克思主义反复阐明也为革命实践反复证实了的一条真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能够帮助我们自觉地去端正路线。在贯彻执行路线的实践中，会碰到许多问题，又可以促进我们进一步学习理论。毛主席说：“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这就向我们尖锐的指出，一个单位的好坏，关键在于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在于领导班子执行什么路线。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武器，认真分析本部门、本单位的方向路线上存在的问题。就一个单位来说，影响革命和生产的问题可能很多，有内部的外部的，有领导的群众的，有政治思想上的，生产、生活上的等等，但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要从领导班子内部解决问题。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不解决内因问题，不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路线是不能端正的。过去，有的单位遇到问题，总是在设备上，原材料上，在群众中找原因，往往对自己的问题不认识，既或认识了，也觉得“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因此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今年以来，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他们通过举办领导班子学习班，学习理论，联系本单位的阶级斗争实际，回顾历史，分析现状，上下结合找内因，解剖典型看路线，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提高。他们明确提出：不能用外部条件掩盖内部问题；不能用群众中的问题掩盖领导中的问题；不能纠缠历史旧帐掩盖现实问题。问题越摆越明，路线是非越分越清，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实践证明，路线端正了，对阶级斗争敢抓了，对歪风邪气敢管了，促进了上上下下在革命基础上的团结，调动了方方面面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就可以创造一个生气勃勃的新局面。

学理论，抓路线，促大干，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即“抓革命，促生产”的过程，“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学理论，抓路线，即坚持抓革命，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它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强大动力；促大干，即精神变物质，促进生产发展，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学理论，抓路线，促大干，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

体。在学理论，抓路线，同促大干这对矛盾中，理论，路线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列宁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我们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也就是强调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对物质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全面理解这条路子，既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也不能把它们并列起来。精神变物质，学理论，抓路线，促大干，是经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来实现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体，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时代的主人。只要我们善于从本质上发现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任何人间奇迹都能够创造出来，这股力量是不可估量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焕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我们大干社会主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力量源泉。能不能把这个力量挖掘出来，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同志是坚信政治挂帅，还是信“赵公元帅。”有的同志不了解革命理论的威力，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半信半疑，思想深处总是认为“物质刺激”管用，这实际上是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没肃清，还是“赵公元帅”在起作用。许多单位的广大工人总结了过去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他们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奖金名目繁多，生产却徘徊不前；前几年，厂里又以“劳动竞赛”为名，变相搞奖金挂帅，生产也没刺激上去。大家认识到，搞物质刺激，信“赵公元帅”，并不能把生产搞上去，反而会腐蚀工人的思想，破坏工人的团结。刘少奇、林彪一伙拼命鼓吹它，实质上是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妄图改变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复辟资本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必须靠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丢掉“赵公元帅”，进一步清除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使我们的方向、路线得到端正。各条战线要密切联系本战线的情况，紧紧围绕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中心问题，学习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批判孔孟之道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认真解决好路线问题。理论学好了，路线对了头，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定能调动起来，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四届人大提出在本世纪内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从国际上看，是天下大乱，革命和战争因素都在增长，美苏两霸激烈竞争，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我们要坚持学理论，抓路线，促大干，争取时间，全面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要防御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从思想上、政治上、物质上，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党的团结是争取胜利的基本条件

——学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胡 东 原

四十年前，我们党进行了一次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做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重要报告，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批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科学地系统地总结了党内第六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今天，我们重温这篇文章，回顾党内斗争的历史，对于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大好形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与党的团结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团结是争取胜利的基本条件，没有党的团结，就没有革命的胜利，破坏党的团结，必然破坏革命。张国焘在长征途中两次分裂党和红军，给革命带来的危害，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一九三五年一月，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六月，中央红军与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合。党中央召开“两河口会议”，会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焘提出向川康少数民族地区退却的错误主张，立即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批评与否定。会议分析了全国革命形势，研究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推动全国的抗日斗争。张国焘对会议决议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妄图篡党夺权。八月五日，中央“毛儿盖会议”再次肯定了“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方针，强调了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作用。会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分别北上。右路军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通过茫茫草地，到达川北的巴西。左路军到达四川西北的阿坝地区。篡夺了领导权的张国焘却公开打出了分裂主义黑旗，擅自决定红四方面军南下。毛主席、党中央电令其继续北上，张国焘不但拒不服从，反而密电右路军中四方面军负责人胁迫一方面军南下，并且阴谋用武力危害毛主席和党中央。在这种紧急情况下

下，党中央在巴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把中央红军编成抗日支队，连夜行军，脱离了险区，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欺骗与蒙蔽下，重过草地，南下至天全、芦山一带。十月五日，张国焘在绵木碉另立“中央”，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府”，自封“主席”揭出了叛党旗帜，严重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统一。在这条错误路线指导下，南下红军虽然英勇顽强，浴血奋战，但却遭到严重挫败，最后被迫退至西康甘孜。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张国焘又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路线，共同反对党中央。由于毛主席和党中央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原则、和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抵制张国焘的分裂路线，使张国焘的阴谋再一次遭到破产。他被迫取消伪中央，与红二方面军一同北上。但他贼心不死，到达甘肃后，盗用中央军委的名义，打着“建立河西根据地”的幌子，命令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向青海退却，继续分裂党和红军。党中央发现后，命令他回师抗日，张国焘拒不执行。结果几乎全军覆灭，只剩下八百人于一九三七年底回到延安。毛主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长征途中的右倾分裂主义给党和红军带来严重危害。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伟大胜利。一九三七年四月，党中央召开“延安会议”，全面地系统地批判了张国焘路线，团结教育了红四方面军及其广大干部。张国焘本人拒绝党的批评教育，大耍两面派，最后孤家寡人叛党投敌，成了可耻的叛徒。

党内第六次路线斗争的胜利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给革命带来的危害，告诉我们一条深刻的道理：革命需要团结，分裂破坏革命。因此“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建国以来，我们正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高饶、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次分裂阴谋，巩固了党的团结，才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实践证明，党的团结，是我们争取胜利的基本条件。

—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党内历次出现的分裂主义，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分裂主义渊源于机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因此，要加强党的团结，就必须与机会主义路线做坚决的斗争，必须克服我们头脑里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彻底改造世界观。

一切机会主义者都是分裂派。组织路线历来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必定有什么样的组织路线。搞机会主义必然反对马克思主义，而党的统一团结是他们推行机会主义路线的最大障碍。所以，他们要采取种种伎俩破坏党的团结。长征途中，张国焘之所以分裂党和红军都是根源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错误地估计当时的革

命形势，过份夸大敌人的力量，过低估计革命的力量，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因此，主张红军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无限制退却。“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制定了北上抗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方针。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上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所以“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和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截然相反的。因此，这中间必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正是机会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斗争的反映，正是为推行其右倾逃跑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林彪之流搞分裂，也是如此。他们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是实现这条反动路线的最大障碍，所以他们大肆进行分裂活动，破坏党的团结，制造反革命舆论，炮制反革命“政治纲领”、“理论纲领”，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更有甚者，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步张国焘后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搞分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见，为了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张国焘、林彪之流简直成了分裂狂！正是由于我们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革命，坚持斗争，战胜了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才取得了团结统一。

世界观是总开关。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分裂主义的思想基础。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决定着他们总是对革命形势做出错误估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极端虚伪性，决定着他们必然发展为革命阵营里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分裂党，破坏革命。张国焘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出身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混入党内后，由于拒绝世界观的改造，屡犯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党的第一、三次代表大会上，他是“左”倾机会主义代表。在北伐战争时期，他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积极支持者。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又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在五次反围剿战役中，他推行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路线。长征途中，搞分裂，破坏革命。毛主席说：

“张国焘不是‘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那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一语道破了张国焘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真面目。由于张国焘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拒绝世界观的改造，决定着他必然在政治上搞机会主义，在组织上搞分裂主义，最后只身叛党，投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里，成为可耻的叛徒。党的斗争历史充分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人，都是投降派，这是一条规律。我们每个革命同志，要想增强革命团结，一定要把思想政治路线搞对头，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努力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才是搞好团结的根本。

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说明，要制定和执行一条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认真改造世界观，就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历史知识，对实际运

动做深刻的理解。毛主席在这篇光辉文献中，号召广大党员，特别是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指出，不这样做，“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只有理论联系实际地学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对现实斗争情况做认真地调查才能使我们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排除错误路线的干扰、影响，铲除分裂主义、投降主义滋生的土壤。当前，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断深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更加激烈复杂，这就更加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明眼亮，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真正做到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三

要团结还是搞分裂，往往是围绕着加强党的领导还是反对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还是破坏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还是违背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等方面的斗争展开的。只有加强党的领导，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正确地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干部政策，才能从组织上保证党的统一团结。

毛主席说：“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加强党的领导，是巩固党内团结的重要条件。一切分裂主义者总是反对党的领导。张国焘搞分裂正是如此。他轻视党，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一九三五年八月，当左路军到达阿坝时，他妄图用枪杆子指挥党，要求改组党中央，反对红军北上。林彪一小撮反党分子为了分裂我们的党和国家，极力贬低党的领导，鼓吹“军党论”，胡说什么“军队是复辟不复辟诸因素中重要因素的重要因素，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只要军队不变颜色，那么其他党、政出问题，就有办法对付”。我们要加强党的团结，必须与这种破坏党的领导的行为做坚决的斗争，自觉地维护党的领导。

党的纪律是加强党的领导，保证革命团结的法规。破坏了党的纪律，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团结。张国焘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分裂党和红军，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纪律。毛主席在总结这一沉痛教训时明确指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张国焘把个人的威信与党的威信对立起来，在党内大搞家长制，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在长征途中，屡次三番拒不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并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张国焘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纪律，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统一团结，给革命带来严重损失。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

加强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纪律，要注意反对两面派行为。机会主义在我们党内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总是以两面派手法欺骗党。张国焘在党内屡次犯错误，在党的六大

上，又犯右倾错误，后来，几次写悔过书，表示承认自己的错误，骗取中央的信任。长征途中，当他分裂党和红军阴谋被揭露后，假检讨，蒙混过关，最后叛变降敌。“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林彪是一个把孔孟之道的“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奉为信条的大阴谋家，他在我们党内经营了几十年，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因此，要巩固党的统一团结，就必须提高对两面派行为的警惕，万万不可麻痹大意。

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干部政策是我们党统一团结的可靠保证。“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一切机会主义者要分裂我们的党，总是要大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张国焘历来如此。他担任鄂豫皖苏区领导工作期间，用资产阶级政客的庸俗作风拉拢一些人，打击坚决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张国焘“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鉴于张国焘的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总结第六次路线斗争经验，可以做为今天的借鉴。只有加强党的团结，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才能调动千军万马，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促进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只要我们能团结，这个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上接第 72 页)

注：

- ①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第444页。
- ②《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74页。
- ③远东外交委员会编：《最近十年中俄交涉》，1923年哈尔滨出版，第6页。
- ④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三卷，1918年赤塔出版，第83页。
- ⑤⑥⑦兰森：《俄中战争》
- ⑧⑨⑩《瑷珲县志》
- ⑪《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24卷，第5页。
- ⑫《帝俄霸占江东六十四屯的前前后后——七十三位老人访问记》
- ⑬锐利沙金：《满洲旅行记》
- ⑭1900年8月17日（俄历8月4日）《阿穆尔报》
- ⑮《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第五卷，第37页。
- ⑯纳罗奇尼茨基等：《远东国际关系》第一卷，第204—205页。
- ⑰⑱⑲纳罗奇尼茨等：《远东国际关系》第一卷，第207—209页。
- ⑳瓦德西：《拳乱笔记》，见《义和团丛刊》第三册，第12—13页。
- ㉑《在停滞的中国城墙内外》，第355页。
- ㉒瓦德西：《拳乱笔记》，见《义和团》丛刊第三册，第81—82页。
- ㉓1900年11月28日《北华捷报》（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26页。）
- ㉔罗曼诺夫：《俄国在满州》，第262页。

顾 全 大 局 义 不 容 辞

在上海金山工地上，一场为毛主席争光，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的硬仗，正在激烈地进行。从那江海相连，焊花飞舞，日夜沸腾的金山工地，到北国江城炉火正红的化建直属加工班，人们仿佛感受到同一个脉搏在跳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岗位，互不相识的人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心往一处想，汗往一块流，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并肩战斗。

吉林化建公司直属加工班，这个充满着革命豪情的战斗集体，在老班长李国才的带领下，学理论，抓路线，促大干，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的群众运动，正搞得热火朝天。

四月的一天，来自上海金山工地的两名同志，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跨进了这个普普通通的加工班。

“我们是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的，会战遇到了难题，请你们大力支援。”两位金山工人恳切谦逊地说。

原来上海金山工地的数万名建设者以大庆为榜样，正在高速度、高质量地建设着一个全国也很少有的巨大工程。可是，正当总厂当中的关键厂——腈纶厂进入紧张安装的关键时刻，一个严重的问题卡住了！一种特殊钢的弯头，用一般的常规办法加工，怎么也解决不了。金山工人不远千里迢迢，拜访了全国各地一些著名的弯头工厂之后，来到了加工班。

接待金山工人的加工班师傅，听了情况介绍，对金山工人深表敬意。但一听是要加工薄皮的特殊钢弯头，却有些踌躇了。这样的活不仅过去没干过，甚至连想也不敢想，于是只好说明了加工班的目前的能力状况，婉言拒绝了。

就在这个时候，李国才从市里开回来。他问明了情况，马上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李国才想，金山工程虽在上海，但它是关系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自力更生路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大局。顾全大局，是我们工人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他激动地说：

“好！你们金山工人自力更生搞争气厂，要为毛主席争光，那我们也要学习你们的榜样，就是头拱地、脱层皮，也要把你们需要的这种弯头压出来。这样的活，非干不可！这口气，非争不可！”

李国才的这席话，感动得金山工人连声说：“李师傅，李师傅！你的精神使我们深受教育。就是解决不了这个弯头，也使我们受鼓舞。”

“你们上海金山工人干得好！我们要向金山工人学习！我们誓与金山工人并肩战斗！”李国才笑了笑，又说：“请你们马上把料拿来进行试验。如果不行，再想别的办

法，一定让你们满意地回上海。”

要走自己的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照别人的描，都是昨天的东西，不生动，要写生，那才是生动的，多样化的，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拄着洋人的拐棍走，快不了，爬着走，只能落在后面。这是李国才一贯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搞出了当年的“争气弯头”，回击了“为中国可怜的配管而干杯”的嚣张挑战，有力地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今天，当金山工人靠自己的力量搞争气厂的时候，李国才带领加工班的同志又倾注了全部感情，为金山工人叫好！他们要拿出全部力量，支援金山工人，打胜这一仗。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紧密联系实际。支援金山工人打胜这一仗，是打击两霸的需要，更是捍卫毛主席自力更生路线的需要，一句话，是维护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大局。顾全大局，用实际行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破除本位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本分。”李国才反复向加工班同志讲清支援金山工地，是一项政治任务，并着重强调说：“顾全大局，早日建成金山石油化工厂，我们都有一份责任。我们一定要把上海工人炼出来的争气钢压成高质量的争气弯头，用最快的速度送到金山工地。”

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加工班的工人，更加充分认识到支援金山工程的重大政治意义，激发起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责任感，个个磨拳擦掌、斗志昂扬，大家一致表示：“这样的活，我们要痛痛快快地干，乐乐呵呵地干，不惜一切地干！”

从五月三日开始试验，人们总觉得时间过的太快了。八小时，不够！十六小时，也不够！李国才豪迈地说：“我们要做二十四小时的细致工作。必须千方百计地走在时间的前头。耽误一分钟，就影响一分钟的进步。”在李国才同志带领下，加工班的同志经过多次的反复实践，发现主要矛盾是胎具不适应。于是，动手全部革新胎具。就这样，用两天两夜的时间，经过上百次的试验，终于搞出全套的特殊钢弯头新胎具。

五月五日，李国才一大早就来到加工班，把早已想好的试验方案，向大伙详细地说了一遍，并着重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对这次的特殊弯头的质量负责，要超过外国的，差一点也不行。这要看我们的真功夫、硬功夫了！”

关景春师傅按照要求下料，装好。一按开关，油压机“哼”地一声闷响，压下来了！人们的心，也跟着“怦怦”地跳动，也象预感到胜利的喜悦就要到来。

油压机徐徐升起，一个镏光铮亮的弯头，工工整整地躺在胎具里。一个小青年，霍地跳起来，高声喊：“成了！成了！”关景春师傅竭力控制着内心的激动，轻轻地拿起弯头，一面说：“吵吵什么，小声点。”

“干什么那么怕人？我们要高声喊，中国工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又填补了一项重要空白！”李国才刚跟班长王善商量完一项方案，回到油压机旁，正赶上这有趣的场面，说了这一句，便爽朗地哈哈笑了起来。人们从这熟悉的笑声中，感到了胜利的喜悦。

李国才把弯头举起来，左看右看，半晌才说：“嗯，这回可以了。继续对其它几种规格进行试验”。

工人同志们一鼓作气，不到一周的时间，口径 89、108 等六种规格的特殊钢弯头都

试验成功了。

产品出来后，双方签定了加工合同，金山工人提出时间要求。李国才斩钉截铁地表示说：“只要你们的料来得及时，我们的弯头保证不拖工程的后腿。”

当金山工人把四十五吨特殊钢料，从上海运到了加工班后。一场大干特殊弯头的战斗打响了。

油压机昼夜不停地开动。党支部副书记李学恩始终以顽强的毅力带病战斗在油压机旁。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有时白天去公司开会或者处理班里的其它事情，晚上还要带领几个徒工顶班生产。白天实在困了，就在门房或者其他地方睡一觉，接着又干起来了。在李学恩同志那种拼命干革命的精神的鼓舞下，加工班工人，用困难促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你追我赶，谱写了一曲社会主义大协作的颂歌。

六十开外的包庆洪老师傅，也同样不服老。他说：“咱们大伙都在向高峰攀登，李师傅走在前面，我们决不甘心落后，我有一份力量就要尽一份责任。”他领着小青年，把生产出来的弯头，一个一个地检查，仔细地包装，嘴里还不住地叮咛着：“包要打结实，号码要写清楚，免得路上出麻烦！”

“包师傅，你放心吧，准让咱们的弯头一路平安到金山。”一个小青年调皮地说了这一句，逗得大伙哈哈大笑。

胜利永远属于顾全大局、勇于实践的人们。一垛垛弯头齐唰唰地排在那里，实在喜人！一个小青年神气地说：“这种特殊钢弯头，是用咱自己的油压机，自己的高压泵，自己的一双手干出来的，送到金山，安装在咱自己的化工厂里，多带劲。”李国才笑呵呵地接过来说：“对了！这就叫做在中国的土地上，开中国的花，结中国的果，自力更生。”

这不是普通的弯头每一个弯头都凝结着上海钢铁工人、铁路工人和吉林加工班工人日日夜夜的辛勤劳动，饱蕴着多少深情厚意。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拿出成批的、高质量的特殊钢弯头。这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想象的奇迹！从争气钢、争气弯头，到争气厂这一事实，生动地显示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工人阶级自觉树立全局观念，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影响，发扬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挑重担，一方有困难，八方来支援，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的人与人相互关系正在不断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吉林化工学校政治理论组

古一范行里义 激我已在了义中“地 国避无是宅唐私，整半固属肖珥侵沙片治日

谎言掩盖不了历史

——驳苏修诬蔑义和团和美化老沙皇的谬论

钟 钞

震撼世界的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起义，是不甘做奴隶的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革命运动，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妄野心，在中国和世界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如同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切革命运动曾经历的情景一样，义和团运动从爆发之日起就遭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和恶毒攻击。今天，苏修御用文人齐赫文斯基等人出于反华、反共的反革命需要，也对义和团运动抱着极端仇视的态度。他们打着“重新分析”历史的旗号，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卑劣手法，一面假惺惺地承认义和团运动“矛头基本指向帝国主义的压迫”，“是广泛的人民群众的运动”，一面大肆诬蔑和攻击义和团极端“保守”、“蒙昧”，“盲目仇视外国文化”，“甚至否定一般进步事物”。与此同时，他们极力为沙皇的血腥侵略政策辩解，说什么沙俄在中国实行“温和的方针”，等等。在齐赫文斯基等人看来，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无非是“仇视文明的骚乱”，同帝国主义浴血奋战的义和团战士简直是“野蛮的暴徒”，而凶恶的沙俄帝国主义倒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苏修的谎言决然掩盖不住铁的事实。请看义和团运动的历史真相。

(一)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这也就是我们与齐赫文斯基等人的根本分歧所在。

十九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的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的对象。沙俄政府是最先向中国伸出魔掌的一个。一八九七年，沙俄同德国政府就瓜分中国问题进行密商，达成“谅解”，在沙俄的默许下，德国

占领了胶州湾，接着沙俄武装侵占了旅顺口。其后，日、法、英等国竞相效尤，形成了一个瓜分中国的狂潮。它们割占中国土地，强设租界，开办工厂，修筑铁路，划分势力范围，为所欲为。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再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鹰犬——传教士横行中国内地，兼併盘剥，百般肆虐，更使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哪里有压迫，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义和团运动就是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义愤的一次总爆发。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群众满怀激昂的反帝爱国热情，手持大刀长矛，不惜流血牺牲，奋起驱逐侵略者。“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充分显示出中国人民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世界民族解放斗争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在义和团革命铁拳的打击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机构一个个土崩瓦解。国际资本为了维护它在中国的侵略特权，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它们极力诬蔑义和团群众是仇视“欧洲文化”的“暴徒”和“凶手”，并且兴师动众，疯狂镇压，将中国人民置于血泊之中。现在，齐赫文斯基之流跟着老沙皇亦步亦趋，诬蔑义和团极端“保守”、“蒙昧”、“落后”，否定“欧洲文化”，这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打击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反帝斗争的语言，和当年帝国主义者唱的是一个调子。

由于义和团对于帝国主义还处于“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对于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奴役的根源缺少科学的认识，因此，在他们武装反抗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把捣毁给他们带来巨大损害的教堂、铁路和洋货作为一种斗争手段。这种情况与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初期首先毁坏资本家的机器一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齐赫文斯基等人却不惜篇幅，大讲义和团如何捣毁和焚烧外国商品、铁路、洋人住宅，企图以此证明义和团“完全否定欧洲文化和最新的科学成就”^①的谬论，是多么荒唐。试问：沙俄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经营的“文明”事业，究竟是对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还是用来欺骗、掠夺和镇压中国人民的工具？恩格斯在揭露英国资产阶级“极力要修筑中国的铁路”的后果时曾经指出：“这意味着中国小农经济和家庭工业的整个基础的破坏……亿万居民将陷于无法生存的境地。”列宁也曾说：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筑铁路，实际上是“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十亿人民（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毛主席更一针见血地指出：抓在资本家手里的科学、技术，“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帝国主义正是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在中国推行掠夺政策的。他们是十足的“文明”强盗。以沙俄为例，它在我国东北强行修筑中东铁路，使大片田园庐陵横遭破坏，给铁路沿线的中国居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十余万筑路土工在沙俄军队监视下每天从事奴隶般的劳动，灭绝人性的沙俄侵略者甚至枪杀中国土工。^②中东铁路修成后，沿线地区成了沙俄的“殖民区域，界内一切政权，悉操俄人之手”。^③沙俄就是通过这条铁路不断向我国伸展侵略势力，吮吸中国人民的膏血的。而当中国人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这伙殖民盗强又利用铁路调兵遣将，屠杀中国人民。因此，义和团的英雄们起来砸烂帝国主义的殖民枷锁、抗击外国侵略军队的时候，就不

可避免地要破坏帝国主义的这些“文明”。齐赫文斯基等人故意避而不谈“谁侵略谁”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俨然以“欧洲文化”的代言人自居，对义和团横加指责，恰好说明他们是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伟大导师列宁早有定论。在《中国的战争》这篇著名文章中，列宁满腔热情地赞扬和支持了中国人民这一反帝义举，愤怒地谴责了沙皇俄国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大肆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无情地驳斥了沙皇政府诬蔑和攻击义和团运动，为其侵略中国进行辩护的反革命谬论。苏修却公然和列宁唱反调，恶毒地咒骂义和团“蒙昧”、“野蛮”、“仇视文明”，粉饰沙俄的对华侵略，这就清楚地表明，这些自封的“列宁事业的继承人”，其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耻叛徒。

(二)

沙俄帝国主义在中国到底是执行了什么“文明使命”，还是推行了赤裸裸的犯罪政策？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伟大的列宁早在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当年就无情地抨击了沙俄的侵华政策，尖锐指出，沙俄侵略强盗在中国“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就是沙俄对中国实行犯罪政策的一个铁证。

海兰泡原是黑龙江畔的一个中国村庄。一八五六年沙俄侵略军在该地非法设立乌斯特——结雅哨所④。一八五六年，沙俄迫签《瑷珲条约》，割占我国黑龙江左岸六十多平方公里土地后，又擅自把它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到一九〇〇年，这里大约有三万八千居民，其中大半是中国人。⑤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左岸、精奇里江口以南至霍尔莫勒津屯一带，“纵一百四十里，横五十里至七十里，率皆豪腴”，人口达万余人⑥。这片土地历来是中国人民居住的地方，即使1858年不平等的《瑷珲条约》也明确规定：该处“原住之满洲人等(按：即中国人，下同)，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着满洲国(按指清政府)大臣官员管理”，俄国“不得侵犯”。一八六〇年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又重申了此项规定。这就是说，沙俄确认中国人民在这里的永久居住权；中国政府对该处的行政管辖权，是不可侵犯的。但是，沙俄早就垂涎这块中国人民开发的沃土，蓄谋久占。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他们认为时机已到，终于向这里居民挥起了屠刀。

一九〇〇年七月九日，沙皇政府发出了入侵我国东北的命令。十三日，沙俄兵船五艘下驶，十四日俄兵强行登岸。清政府驻瑷珲的军队奉命阻拦，俄兵首先开炮。接着沙俄一手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向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⑦

大屠杀前夕，海兰泡沙俄当局扬言，要把中国居民迁往江右，各户不得闭门上锁。七月十六日，他们强行把数千名中国居民，不问男女老幼，“都象关进兽栏子一样赶进了警察署。”中国居民的住宅和商店随即被洗劫一空。附近的中国村民也横遭搜捕，凡

三
管
瓦
苏
布
恩

五
华
中
策
犯
斯
多
○
、
豪
的
其
”。
人
早
，
，
艘
一
⑦
道。
进
凡

进行抵抗的都被刺杀。被关押的人越来越多，警察署容纳不下，晚上又被带到精奇里江畔一个木材厂的院子里。第二天，七月十七日，第一批中国居民大约有三千至三千五百人，被沙俄哥萨克兵押往上海兰泡北六英里的黑龙江边，途中掉队的人都被哥萨克兵活活砍死。当时江面最窄的地点仍有七百英尺宽，水流湍急，狂风呼啸，连一只船也没有，哥萨克兵强迫中国人泅渡，先下水的立即沉溺，不敢下水的遭到俄军的射击和砍杀，半小时后岸上中国人的尸体堆积如山。^⑧当时对岸的中国人民目击这一惨剧，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鼻酸，重伤者毙岸，轻伤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有随波力拥过者八十余名，赤身露体，昏迷不能作语。……询知惨杀溺毙者五千余名”。^⑨从七月十七日到七月二十一日，俄军又进行了三次同样的屠杀。一份俄国的官方笔录说，“目击者的全部证词令人相信，这实际上不是渡江，而是把中国人斩尽杀绝和淹死。”^⑩

就在老沙皇一手制造了海兰泡大血案的同时，七月十七日，沙俄侵略军又把屠刀伸向江东六十四屯，将“各屯居民聚于一大屋中，焚毙无算，其余幸免者皆逃江右。”^⑪在逃难中不少人淹死在黑龙江，来不及逃走的惨遭杀害。俄国军队在这两次屠杀中，夺去了上万无辜中国居民的生命。中国人民的鲜血把黑龙江都染红了。据亲身经历这一事件的老人回忆：六月二十四日（公历七月二十日）那天下雨打雷，江里的死尸都漂上来了，象冰排似的流了四五天，水面浮着一层油，江水都不能喝了。^⑫实际情况比这位老人的回忆更为悲惨。请看一个俄国军官三个星期之后在黑龙江上所看到的情景吧！一具具中国人的溺尸在“黑龙江宽阔的江面上漂浮，好象在追逐着我们的轮船”，“很难估计我们这一天赶上了多少尸体。但是根据判断，仅在一个小沙嘴上，我们共数出一百五十具尸体。可以想见，中国人的尸体是不少的。”^⑬这是俄国人自己对老沙皇罪行的记录，齐赫文斯基们是抵赖不了的。俄军血洗江东六十四屯之后，俄国阿穆尔斯军事长官格里布斯基根据阿穆尔总督的命令悍然宣布：“根据《瑷珲条约》规定一直归中国当局管辖的前满洲外结雅地区（按：即江东六十四屯）及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右岸为我军占领之满洲土地，已给俄国当局管辖；凡离开我方河岸的中国居民，不准重返外结雅地方，他们的土地将交给俄国移民者，供其专用。”^⑭就这样，中国人民长期辛勤开发的田地被霸占，用血汗积累的大量财产被抢走了。^⑮“黄童离家长号，白叟恋产叫哭，扶老携幼，奔逃瑷珲对过，长江阻梗，绕越不能，露守江滩，群号惨人。”^⑯滚滚的黑龙江水流不尽中国人民的血泪，齐赫文斯基之流纵然决伏尔加河之水也洗刷不了老沙皇的罪行。

沙俄政府制造了江东大惨案之后，接着出动五路大军侵占我国东北，血腥镇压义和团运动，继续疯狂屠杀中国人民。侵略者发出一片战争狂叫，格里布斯基公然威胁说：“胆敢进攻俄国人（按：指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坚强反抗）的瑷珲城以及黑龙江沿岸诸村庄已被焚毁”，“满洲人尸横遍野，血染黑龙江。”他还声称谁敢继续抵抗，俄国人“就将举火把有关村庄或城镇烧毁，不让一个人活着！”^⑰十月一日，俄军占领盛京（今沈阳）后，东北三省全部沦陷，十七万三千名俄国兵、三千九百名军官盘踞在我国东北地区，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充分暴露出沙俄侵略强盗野蛮残忍的本性。

事实具在，铁证如山。七十多年不过是历史上短暂的一瞬。当年老沙皇在我国东北等地烧杀的遗迹至今还随处可见，从老沙皇屠刀下死里逃生的至今尚有人在。沙俄帝国主义强盗血腥镇压义和团运动、疯狂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中国人民还是记忆犹新，那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齐赫文斯基们绝口不提这些血迹斑斑的事实，把沙皇对中国的“犯罪政策”说成是“文明使命”，是为了保证妇女和儿童的“撤退”^⑯，这是十足的强盗逻辑。其实，这种论调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当年的老沙皇就曾叫嚣，沙俄军队入侵中国东北是为了“击退义和团的侵略”，是执行“文明使命”。今天，苏修御用文人的谬论，完全是老沙皇的旧调重弹。所谓“文明使命”，无非是苏修用来掩饰老沙皇侵华罪行的遮羞布，同时也说明，苏修为了实现其争霸世界的狂妄野心，已经堕落到从老牌殖民主义那里寻找思想武器了。正象恩格斯所揭示的那样：“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苏修御用文人们不惜用颠倒黑白的手法为老沙皇辩护，充分暴露了他们社会帝国主义的可耻嘴脸。

(三)

齐赫文斯基之流还蓄意把老沙皇打扮成和平天使，硬说沙皇俄国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不同”，对中国实行的是“温和的方针”^⑯。其一曰：沙皇政府“反对俄国军队参加向北京的进军，并无论如何坚持俄国的司令官不担任远征军的领导。”^⑰其二曰：八月里俄国就开始从北京撤走军队，也准备从东北撤军。^⑱其三曰：在缔结和约时，俄国“主张比较缓和的条件”，“不希望过分削弱中国”，不要赔款。^⑲这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不难看出，在齐赫文斯基们的笔下，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例外”，它不受帝国主义的基本规律制约，放弃了对殖民地人民的掠夺和镇压，而成了他们的“朋友”——至少比其他帝国主义要好得多。可惜，这种沙俄“例外论”编造得实在是太拙劣了。

列宁指出，沙俄制度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它“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变本加厉了。”它的疯狂侵略本性，在对中国的政策中暴露得尤其突出。

十九世纪末，沙皇俄国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其侵略扩张的野心也进一步膨胀起来。它通过外交讹诈，军事占领，重金收买清政府的权臣等手段，在甲午战争以后的短短几年间，在我国东北地区取得了一系列的特权。义和团起义前夕，沙俄政府用修铁路，开银行，兴办实业等方式，不断扩展它在我国东北的侵略势力，妄图进而实现吞并东北的目标，即所谓“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后，满洲（按：指我国东北）将如已熟之果，落在我们（指俄国）手中。”^⑳然后以我国东北为“出发点”，进一步侵吞中国和朝鲜内地，以实现它妄图鲸吞中国的野心。如果沙俄被赶出东北，那么它的一切侵略计划就要落空。因此，沙俄政府首先要保住在我国东北的既得利益，同时尽量攫取在华北地区的利益。它对清政府伪装“友好”，完全是为了给自己谋取最大的侵略权益；同时又积极参加列强的武装进攻，入伙分赃。

北国沈对十军用沙到要白

国参八国的，的是
集。起短，北在，落利参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沙俄代理外交大臣致旅顺口海军中将阿历克谢耶夫的密电供认：“（俄国）不和其他国家分开，以便密切注视他们的行动，并能在任何时间宣布自己的要求，可是我们应当避免可能使我们完全自由行动多少受到束缚，或者在中国人眼中证实俄国有敌视意图的一切事情。”这就是当时沙俄阴险狡猾的侵华方针，既要派大兵入伙分赃，还要保持单独勒索更多东西的“自由”，又不抛头露面，免得落一个带头侵略中国的臭名，真是阴险狡猾得很！齐赫文斯基之流所说的老沙皇坚持俄国的司令官不担任联军头目的真相就是这样。

齐赫文斯基之流所谓沙俄政府反对俄国军队参加向北京进军，这也是无稽之谈。一九〇〇年的六、七月份，义和团运动迅猛发展，给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帝国主义强盗以沉重打击。多年盘踞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沙俄侵略者被打得望风逃窜。面对这种形势，沙俄政府根据既定的侵略方针，一面借口应英国之请，派数千俄军赶赴天津，一面以“护路”为名，从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悍然出动十多万军队大举入侵我国东北地区。狡猾的沙皇梦想独占我国东北，又不准备贸然和清政府彻底决裂，以换取清政府的“好感”，承认它在东北的特殊地位，所以曾一度假惺惺地表示反对联军向北京进军。但是，当其他帝国主义决定向北京进军时，老沙皇就立即抢在前头。八月三日，沙俄侵略军头目里涅维奇亲自在天津召集联军会议，决定第二天向北京进军^④。联军到了北京城下，沙俄侵略军又抢先攻打北京城。齐赫文斯基之流故意掩盖上述历史事实，制造老沙皇对中国“友好”的假象，结果只能是弄巧成拙，欲盖弥彰。

八月二十五日，沙俄照会各国，宣布“首先”从北京撤出它的军队。齐赫文斯基等人对此津津乐道，说什么这就是沙俄政府对中国采取“温和方针”的明证。其实，沙俄这一行动也不过是它妄想独占我国东北而玩弄的阴谋。就连八国联军强盗头子瓦德西都说：“余现在复得俄国方面可靠消息，谓满州现象极不可乐观；……余相信（俄国）撤兵直隶之举，实与此事有关。”^⑤而且沙俄所谓从北京撤军，撤到天津也罢，东北也罢，撤来撤去还是盘踞在中国领土上，践踏中国的大好河山。除了殖民强盗，谁能说这是沙俄对中国“温和”、“宽大”呢？

至于所谓准备从东北撤军，更是沙俄政府骗人的鬼话。事实上，当时老沙皇不但没有从东北撤军，而且还在继续向东北增兵。甚至当其他帝国主义的军队从中国撤走之后，老沙皇的军队还继续在中国东北镇压和屠杀中国人民，直到一九〇二年，沙俄为了暂时缓和它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因争夺中国东北而引起的尖锐矛盾，才同中国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假意表示要从东北撤兵。但是，到一九〇三年一月下旬，条约规定的第二期撤军期限将到时，沙俄非但以种种借口拒不撤兵，反而继续增兵，并在同年十一月重占沈阳。沙俄帝国主义阴谋独占东北，引起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冲突，以至爆发了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战争。这是世人皆知的史实。对老沙皇那个充满虚伪词句和强盗逻辑的八月二十五日照会，列宁在《中国的战争》一文中给予了辛辣地讽刺和严厉地驳斥。列宁指出：沙皇俄国“简直象基督教徒那样毫无私心”，“几年以前，它毫无私心地侵占了旅顺口，现在又毫无私心地侵占满洲（按：指中国东北）”。齐赫文斯基等人对列宁的上述批判故意视而不见，却恬不知耻地引证老沙皇的这个照会，来说明老沙皇要从中

中 露 看 正 以 中 国 成 和 大 同 宣 表 国 住 反 定 于 于

国东北撤军的“诚意”。试问，你们到底要置伟大革命导师列宁于何地？

齐赫文斯基等人说，老沙皇在缔结和约时，“主张比较缓和的条件”，“不希望过分削弱中国”，不要中国赔款。这更是一派胡言。当时上海的《北华捷报》就道破了其中的奥秘，指出李鸿章“曾经同俄国代表洽商好，俄国应该竭尽一切力量阻挠联盟各国……从中国索取赔偿的企图，交换条件是中国默认俄国的占领满州。”^{②0}当时沙俄财政部也不得不承认：“在北京谈判时俄国的任务应该是尽可能减低各国的赔款额要求，而保有的俄国的一份，俄国认为可以代之以在中国东北的补充特权。”^{②1}可见，不要中国赔款是假，妄想攫取东北是真。所谓不要赔款，不过是老沙皇同其他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一种手段和策略，而且还以其他帝国主义也不要赔款为前提条件。况且清政府已经同意赔款，所谓不要赔款之说早已成为空话。事实上，沙皇帝国主义从中国勒索了一亿三千多万元两赔款，占庚子赔款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是八个帝国主义强盗中最多的一份。连当年老沙皇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都承认，那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②2}而齐赫文斯基之流竟然一字不提，干脆来个不认帐。这说明他们已经堕落到了何等可悲的地步。

事实说明，沙皇俄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是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它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更凶残、更狡猾、更富侵略性。苏修御用文人制造的沙俄“例外论”，是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伟大学说的无耻背叛，无非是给老沙皇加上一层新沙皇的油彩而已。

* * *

打着“重新分析”的幌子，全面篡改和伪造历史，是苏修历史学的重要特点。齐赫文斯基等人对义和团运动的诬蔑，替老沙皇的侵略罪行辩护，只不过是他们伪造中国历史的一个例子。这种现象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简单地说，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历史学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的改变，只能从人们社会关系的改变中，从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找到根源。苏联历史学这种修正主义的大倒退，正是当前苏联社会历史大倒退的反映。所谓“重新分析”历史，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复辟，是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齐赫文斯基之流违背列宁的教导，恶毒咒骂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是苏联由社会主义蜕化为社会帝国主义的反映，是为了适应苏修新殖民主义向外扩张，争霸世界的政治需要。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成为新沙皇称霸世界的极大障碍。正因为如此，苏联叛徒集团千方百计妄图对中国进行颠覆和侵略，大造反华、反共的反革命舆论，所谓“重新分析”中国历史，正是苏修反华大合唱的重要组成部分。

伟大的义和团运动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咒骂七十多年了，非但无损于它的光辉，相反地，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越来越看清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意义。义和团运动的革命精神是抹杀不了的。人民群众的反帝革命斗争是诬蔑不了的。历史无情，齐赫文斯基等人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和新沙皇拴在一起，站在革命人民的对立面，总有一天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本文注释转至 62 页）

上
才
可
曾
勾
盖
于
全
而
内

有
人
少

赫
历

人
形
根
重
上
社
的
正
革

相
革
基
扫

苏修的《中国近代史》和艾奇逊的“白皮书”

徐 立 亭

一九七二年，苏修叛徒集团把精心炮制十五年的《中国近代史》公诸于世。充当该书主编的是齐赫文斯基。这本书，不仅在观点上极端反动，而且在史料上错误百出，暴露了作者对中国历史一窍不通。但是，这并不妨碍齐赫文斯基们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看到他们的这副嘴脸，不由得使我们联想到当年的艾奇逊。

艾奇逊曾经当过美国政府的国务卿，是一个反动的帝国主义代言人。一九四九年，正当中国人民打败美帝扶植的蒋介石，朝着解放全中国目标胜利进军的时候，“艾奇逊以一个资产阶级大学教授讲述无聊课本的姿态”，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恶意诬蔑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这就是那臭名昭著的“白皮书”。

马克思说过：“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论波兰问题》）今天，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就的时候，苏修御用学者抛出了所谓的《中国近代史》，扬言要“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过去的发展重新加以分析”。这本贴上“红皮”的黑书，和二十多年前艾奇逊的“白皮书”，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苏修御用学者和艾奇逊一样口蜜腹剑，把恶毒咒骂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反华大毒草，说成是献给中国人民的“友好”之花。艾奇逊说，他所编的“白皮书”与众不同，很客观，很坦白，是“和美国有着极亲密的联系”国家的坦白记录。齐赫文斯基则宣称：“提供读者的这部著作将促进苏、中两国人民更能彼此了解和相互友好。”这番表白，简直就像“犹大之吻”一样的虚伪。

齐赫文斯基之流对待近代时期的中国人民并不是那么“友好”。在书中，他们攻击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叫嚷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不能称为“革命”，否则就是“过高估计农民的革命可能性”，胡说太平天国“没有直接反对外来列强侵略”；诽谤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浸透着神秘主义及迷信色彩”，“对外国文化”“盲目仇视”，甚至“否定一般进步事物”；歪曲辛亥革命的性质，把它描绘成“具有大汉族沙文主义色彩”的“反满”运动。一部波澜壮阔的近代中国人民革命史，被苏修御用文人糟蹋得不成样子。

齐赫文斯基之流否认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性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然背叛。太平天国是不是革命？马克思做过明确的结论。一八五三年，正当太平天国勇士们胜利进军的时候，马克思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清楚地指出：“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马克思把太平天国农民战

的文各一个外义当定但们过对给对匪赫力號做亞宣西手“批十璽俄乘俄

争称之为“强大的革命”。我们要问齐赫文斯基之流，是马克思“过高估计农民的革命可能性”，还是你们对马克思的结论进行“修正”？你们标榜“遵循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指示”，装腔作势，故弄玄虚，好象各国历史上的每次群众运动，究竟够不够“革命”，得要由你们发“许可证”，这简直是一种社会帝国主义学阀老爷态度。

太平天国“没有直接反对外来列强侵略”吗？历史事实给了谣言家们最有力的回击。

西方列强把鸦片做为侵略中国的武器。太平天国针锋相对，严禁鸦片输入。他们指出：“洋烟为妖夷贻害世人之物”，警告外国商人“不应再卖鸦片”。①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设租界，划分势力范围。太平天国声明：“租界属于‘天朝’，所以它应该象中国其他的地方一样，绝对受太平天国的管辖。”②侵略者认识到，让太平军承认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极不可能的”。③西方列强伙同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太平天国严正警告侵略者，不许干涉中国内政，帮助清王朝。④而且，太平军和外国侵略者直接作战，打死了所谓“常胜军”头目华尔、“常捷军”头目勒伯勒东和买忒勒，使西方侵略者吓破了胆。就连反动头子李鸿章、左宗棠都承认：“西兵为‘贼’所慑，从此不肯出击‘贼’，”⑤“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⑥正反两个方面的事实都说明太平天国是“直接反对外来列强侵略”的。

至于苏修御用学者诽谤义和团“迷信和无知”、“对外国文化”“盲目仇视”等等，并不是他们的新发明，完全是重复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沙俄政府的陈词滥调。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胡说，义和团是“无知迷信与暴民歇斯底里的产物”，是“一种要以屠杀手段驱逐所有外国人出中国来恢复过去闭关主义”。俄国政府的报纸也曾疯狂煽动什么“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极力为沙俄出兵镇压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制造舆论。这种谬论，当时就受到革命导师列宁的痛斥。他说：“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一八五六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中国的战争》）苏修御用学者把列宁批驳过的反动谬论，几乎一字不差地搬了出来，这就表明他们是十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

义和团群众果真那么“无知”吗？当年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⑦在义和团勇士们的沉重打击下，就连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瓦德西也不得不正视的事实，而扬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齐赫文斯基们倒矢口否认了，这是多么严重的倒退！

诚然，义和团供奉神位，念咒降神，认为刀枪不入。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义和团群众自身的罪过，而是反映了社会现实的落后，以至于为了发动暴风骤雨般的运动，人民群众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齐赫文斯基们不去说明产生这种“迷信色彩”的社会历史条件，反而，对待义和团群众，如同马赫主义者对待“自在之物”一样，用尽了

中国与世界十强是怎样产生的

“恶言秽语”，进行冷嘲热讽。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苏修御用学者把辛亥革命描绘成“具有大汉族沙文主义色彩”的“反满”运动，这不仅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的歪曲，而且是有意挑拨中国各民族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历史上，有时由这个民族的统治者建立政权，有时由那个民族的统治者建立政权。清朝是满族统治者建立的。鸦片战争以后，这个政府逐步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出卖民族利益，充当帝国主义走狗。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曾经提出“反满”口号，借以发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正如列宁所说：“每一个口号都应当根据一定政治局势的整个特点来提出。”（《论口号》）尽管中国资产阶级本身有它的弱点，但辛亥革命的实质决不是一次“反满”运动。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曾经指出：“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而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⑧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家章太炎也说过：对满族也只是仇其皇室、官吏、士卒，对“耕牧”的“编氓”是不仇的。^⑨他认为对国内少数民族应较为平等相待，“必非美国之视黑民若”。^⑩这是辛亥革命领导者赏给齐赫文斯基们的一计响亮的耳光。

其次，苏修御用学者和艾奇逊一样颠倒黑白，把外国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对中国的“友谊”。艾奇逊在“白皮书”里把美国利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团结中美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齐赫文斯基则极力美化老沙皇，胡说“俄国政府与西方列强不同，它奉行另一种政策，致力建立友好睦邻关系。”“俄国政府对华政策仍然是友好的。”这真是当众撒谎，欲盖弥彰。

懂得历史的人们都知道，沙皇俄国一贯奉行的是对华侵略扩张政策。他们把中国当做一块肥肉，总是梦想侵吞中国，“直接占领一直到长城脚下的大片领土，并获得在东亚的霸权。”（列宁：《“帝国主义”笔记》）一八五〇年，沙皇尼古拉一世曾狂妄地宣称：“俄国国旗不论在哪里升起，就不应当再降下来。”^⑪一八五三年，他对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指示说：“中国理应满足我国之‘合理’要求，倘若不允，尔今手握雄兵，可以武力迫其就范。”^⑫二十世纪初年，“俄国资产阶级已拟定在满洲成立‘黄俄罗斯’的计划。”（《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沙俄扩张主义指导下，一批批俄国殖民者把中国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

沙皇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本来同中国并不接壤。“远处西北，从未一达中华。”^⑬十六世纪沙皇俄国开始向东扩张，到十七世纪下半叶才和中国发生了边界问题。沙俄殖民者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占据大片土地，刮起了“血腥的、毁灭一切的风暴。”^⑭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沙皇俄国勾结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加紧推行瓜分中国的侵略政策。一八五八年，沙俄帝国主义乘英法帝国主义侵华联军进攻天津，威胁北京的时候，用武力迫使清朝当局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把乌

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

一八六〇年，沙皇俄国借助英法侵华联军攻占北京的军事压力，借口调停有功，并以“兵端不难屡兴”相威胁，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

沙皇俄国还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和一八六四年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勘界议定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部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一八七一年沙皇俄国出兵强占中国伊犁，盘踞十年之久；一八八一年，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沙皇俄国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和以后的几个勘界议定书，又把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了沙皇俄国的版图。

就这样，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沙皇俄国先后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相当于三个法国或十二个捷克斯洛伐克。难道这就是齐赫文斯基之流所说的沙俄对中国的“友好睦邻”政策吗？

不过，齐赫文斯基们说沙俄“与西方列强不同”，确也有几分真实。比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当英法侵略军北犯时，沙俄公使一面借助英、法发动武装进攻要挟清朝政府，一面又对清朝官吏说：“俄国竭力剿灭英法两国，以期中国有利”，大耍两面派手段，与英法“均沾”所得的侵略利益。正如恩格斯所揭露：“当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一场代价巨大的战争时，俄国保持中立，只是在战争快结束时它才插手干预。结果，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战争，只是为了让俄国得到好处。”（《俄国在远东的成功》）

再次，苏修御用学者和艾奇逊一样贼喊捉贼，他们编造了所谓“中国中心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借以混淆视听，掩盖自己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艾奇逊煞有介事地说：“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中国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后总是能够驯服和融化侵入者。他们自然会因此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齐赫文斯基之流也跟着胡说：“远在中国古代和中世纪产生的中国人优越于其他所有民族的学说，号称‘中央之国’和‘天朝’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四外皆为蛮夷的学说也广泛蔓延起来。”苏修御用文人这席鬼话，完全是抄袭艾奇逊的谎言集。

马克思、恩格斯这样说过：“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古代，“国野对偶”，“国”是对“野”而言的。“古者城臺所在，曰国曰邑”。^⑯古书解释“中国”一词的最早含义，并非是什么“世界的中心”。“中国”者，“京师也”。《史记·五帝本纪》注释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齐赫文斯基之流冒充“汉学权威”，其实对“汉学”一窍不通。在这里，他们使用了一个“障眼法”，说什么“中国”即“中央之国”，即“世界的中心”，即“大汉民族主义”，俨然以推导数学公式的方法来造谣惑众，实在是荒谬之极。

齐赫文斯基跟着艾奇逊胡说了一阵中国即“世界中心”的谬论之后，唯恐他借古喻今的苦心无人理解，索性来个“图穷匕首见”。他叫嚷：“即使到了中国的现代时期，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也使劳动群众背离争取自身社会解放的紧迫任务，扩散轻视国际

并 约 书
自 政 定
的， 难
二 次 明 政
行 手 术
莫 行
) 强
奇 伸
古 染
会 因
也 跟
“中 卡 修
节 和 野”
非 是
王 所 通。
的 中 罗 之
古 榆 期，
国 际

革命运动经验的情绪，以致造成极度夸张中国所有的一切、不加区别地骂倒一切外国事物、维护反动的旧传统的情况。”很清楚，齐赫文斯基之流扬言对中国的“重新加以分析”，并不是鉴赏古董，借以消愁，而是借题发挥，猖狂进攻。他们编造“中国”即“世界的中心”，是诬蔑社会主义的中国怀有对外“侵略”的意图，这是无耻的诽谤，是玩弄“贼喊捉贼”的诡计！

当代各国人民，对苏联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社会帝国主义的历史事实并不陌生。自命为“老子党”，大搞“以我为中心”，强制各兄弟党服从自己的修正主义指挥棒的，是苏修；控制、干涉一系列国家内政的，是苏修；出兵武装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是苏修；在邻国边境陈兵百万，制造一系列流血事端的，是苏修；在世界各个角落，到处疯狂争夺霸权，搅得世界不得安宁的，还是苏修叛徒集团。当年艾奇逊编造“中国”即“世界的中心”的谎言，目的是掩盖“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这一称霸世界的侵略计划。今天，苏修重弹艾奇逊的老调，是为了掩盖争霸世界，建立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大帝国的狂妄野心，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最后，苏修御用学者和艾奇逊一样贼心不死，在他们侵略中国的计划遭到可耻的破产后，仍然念念不忘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妄图颠覆新中国，复辟旧中国。

艾奇逊的“白皮书”，“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克服，使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美国出钱支持的蒋介石虽然已经完蛋，然而艾奇逊和中外一切反动派一样，决不会从自己的失败中总结教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艾奇逊在“白皮书”里依然表示，美国不愿放弃“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即重新干涉中国。他们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即“美国的第五纵队”，认为他们终于会“再显身手”，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重返人吃人的“自由世界”。

苏修叛徒集团在他们反华反共反人民的政策碰得头破血流之后，也和艾奇逊一样，企图借助于他们所谓的“国际主义者”，即刘少奇、林彪一类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从内部来瓦解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叫喊什么“国际主义原则最终会在中国获得胜利”，实质上就是要让修正主义在中国上台，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种痴心妄想是永远也不能得逞的。

苏修御用学者紧步艾奇逊的后尘，煞费苦心地歪曲中国近代史，是因为他们仇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仇视中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仇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制定了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了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敌人，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又在社会主义革命大道上阔步前进。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尖锐武器。因而，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者拼命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当年，艾奇

逊胡说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受“外国的羁绊”；今天，苏修御用学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诬蔑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他们使用的语言虽然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都是仇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这些反面教员，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极端重要性。

苏修的《中国近代史》和艾奇逊的“白皮书”，相似之处是如此之多，决不是偶然的。二者的共同语言，导源于他们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共同阶级本质。当然，他们之间也有区别：艾奇逊是明牌的帝国主义分子，齐赫文斯基仅仅是社会帝国主义的吹鼓手。艾奇逊赤裸裸地宣扬反动的唯心历史观，齐赫文斯基则要用马列主义词句掩盖自己的唯心历史观。因此，苏修的《中国近代史》，就其说谎和伪装的技巧而言，“白皮书”还远非可比。

但是，世界的形势不同了。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苏美两霸内外交困，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苏修叛徒集团妄想掉转这个历史潮流，未免是自不量力。

注：

- ①《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第907页。
- ②王崇武：《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22页。
- ③见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一卷，第113页。
- ④《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第903页。
- ⑤《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一。
- 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六。
- ⑦《义和团》资料（三），第86页。
- ⑧《民报纪元节演说词》，《民报》第12号。
- ⑨《排满评议》，《民报》第21号。
- ⑩《社会通诠商兑》，《民报》第12号。
- ⑪涅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123页。
- ⑫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第56章。
- ⑬《大清实录》，第91卷，顺治十二年五月乙巳条。
- ⑭洛巴特金：《滨海地区民族志》（1923年）。
- 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克虽使
然之鼓已皮
，拒

给人民公社社员讲点政治经济学(中)

榆树县秀水公社治江大队理论组
吉林大学经济系教育革命小分队

第五讲 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前头几讲，主要说的是生产关系的第一和第二两个方面，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和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这一讲和下一讲，我们要说的是生产关系的第三个方面，即产品的分配关系。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报告里教导我们：“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毛主席这段话，深刻地概括了我们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分配关系和分配原则，是我们正确处理分配问题的总纲。在生产队的分配中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调动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都是非常重要的。

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生产资料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建立，使产品分配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任何社会里，生产本身都不是目的，也不是终点，生产出来的东西，都要按一定原则分配给各个阶级所有或消费。但是，由哪个阶级进行分配，按什么原则分配，各个社会却是不同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着产品分配权，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产品分配关系。在旧社会，生产资料掌握在地主资本家手里；地主资本家就掌握了产品的分配权。他们把我们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产品的绝大部分，以利润、地租、利息、捐税等名目攫为已有，过着挥霍浪费、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而我们劳动人民以工资、劳金等形式得到的东西，连温饱都难以维持。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劳动人民成了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者，不再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由于“所有制变更了”，分配关系就完全改变了：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产品归劳动人民所有，并按照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原则进行

分配。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社会产品归劳动人民所有，由劳动人民所支配，这是不是要把全部社会产品都直接分配到劳动者个人手里呢？还不是。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提出的社会产品的分配原理，应该扣除：（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在我们农业中就是要从当年的收入中扣除生产中消耗掉的种子、化肥、饲料、农具等费用，否则下年就无法维持规模不变的简单再生产。（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不断满足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社会主义的生产必须是一年比一年增加，即进行扩大再生产。为此，就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和资金。（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为了防御战争和自然灾害，出现荒年和灾年，必须要留点储备，以保证再生产不致中断。在总产品中扣除上述部分，剩下的就可以用于消费了。但是这一部分是不是都分给直接参加生产的人消费呢？还不能。因为，由于社会分工和其他原因，社会上的人并不是都能直接参加生产的，因此还要扣除：（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这主要指国家机关和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这些支出对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必要的，我们农民应该担负一部分。（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即用于教育、科学、艺术、卫生设施等费用，也包括为这些部门服务的工作人员的工资。这是非常必要的。（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如农村为“五保户”设立的公益金等。另外，由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存在，我们还需要有国防费用；由于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获得解放，“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因此，我们还需要有援外费用。

上面所谈到的这些费用，虽然不是直接分配给劳动者个人的，但它们对于维护劳动人民的政权和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都是必要的，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劳动人民谋利益的。

生产队总收入的分配直接体现着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社员个人利益的“三兼顾”生产队在一年中所生产出来的农林牧副渔产品，叫做生产队总产品。把这些产品进行核价，用货币表示出来，叫做总产值。它们是生产队全体社员在一年内所创造的物质生产的总成果，所以也叫总收入。

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有一部分不能用在当年分配。例如，尚未出售的仔畜，正在增重的育肥畜，正在成长的林木，尚未捕捞的鱼虾等，都是在当年末实现的收入，所以也不能在当年内分配。在总收入中扣除这部分，叫做生产队可分配的总收入，一般简称总收入。生产队总收入，在当年进行分配。它的分配完全体现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分配原理，体现了毛主席关于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三者利益的指示。生产队全年的总收入，扣除去年全年各种费用（即费用部分）支出以后，剩下来的部分就是收益分配部分。这部分数额，按照党的分配政策，在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三者之间进行分配。代表国家的就是“国家税金”；代表集体的就是“公共积累”，其中包括公积金、公益金、生产费基金和储备基金；代表社员个人的就是“社员分配”。从我们治江大队各生产队的分配情况来看，在生产队总收入中基本上都

是：上缴给国家的税金占百分之五左右，留给生产队集体的占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包括各种费用和公共积累），分配给社员个人的占百分之五十左右。

我国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决定了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三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生产队总收入中归社员个人的部分，是直接用于社员消费的，是直接为社员谋福利的。归国家和集体那一部分，是为社员的集体福利和长远利益服务的。正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留给生产队的“费用部分”，基本上就是“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公积金和生产费基金就是“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储备基金就是“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公益金就是“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这对生产队集体经济的发展和保障、提高社员生活都是必不可少的。至于上缴给国家的农业税，国家把它用于工矿业、农田水利、交通运输建设上，用在银行信贷、文教卫生、国防、外援等方面，对于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对于壮大国家支援农业的物质力量，对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对于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都是十分必要的。例如，解放以来，国家向农村提供的农机具、化肥、农药以及各种工业日用品，数量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低，发放的各种农业贷款越来越多，这对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社员生活，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要注意调节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一定矛盾

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还存在着非对抗性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也就是说，三者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说它们之间是统一的，因为国家和集体的积累越多，国家和集体扩大再生产的速度越高，改善社员个人生活、提高社员个人消费水平的物质基础就越雄厚。说它们之间是矛盾的，因为生产队一年的收入是有限的，如果用于增加国家和集体的积累部分多了，用于增加社员消费的部分就少了。多增加一些积累，固然可以加快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速度，但是社员当前生活水平的提高就要放慢一些。相反，如果用于增加社员消费的部分多了，相对来说，用于增加国家和集体积累的部分就只能少些。多增加消费的结果，固然可以较多地满足社员当前的生活需要，但是国家和集体的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就不能不放慢。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阶级矛盾，而是国家、集体整体利益和个人局部利益之间的矛盾，是社员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之间的矛盾，是三者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的矛盾。

尽管如此，我们也绝不能把它看作是无足轻重的。要看到，分配在经济生活中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东西。分配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分配又反作用于生产，反作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反作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三者关系处理得当，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处理得当，就有助于调动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国家和集体经济稳步地向前发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

义公有制；相反，就会挫伤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助长农村资本主义倾向，削弱和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

坚持思想政治路线教育，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矛盾。为了处理好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三者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我们要抓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经常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经常地对广大社员进行思想路线方面的教育，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使社员认识到多打粮、多卖粮、多积累，就是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多作贡献。要象大寨社员那样，在收益分配上本着先国家再集体，先集体后个人的原则进行。因为只有国家富裕了，才能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支援世界革命；只有集体富裕了，才能更好地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第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三兼顾”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党的方针政策是以客观实际为依据制定的，代表着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在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还以手工劳动为主，产量还不很高，而且还受自然灾害影响，产量不是十分稳定。同时，由于农民在解放前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解放后生活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底子还较薄，还不很富裕。由于这些情况，我们必须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基本政策：“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在这个基本政策指导下，我们既要批判“分光吃尽”不顾积累的倾向，又要防止一下子积累过多。国家实行征购一定五年的政策，保证生产队多产多留，“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生产队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积累，积累率因年景丰欠而变化，采取欠年少留、丰年多留、以丰补欠的办法，因时因地地及时调节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我们生产队“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这对备战备荒、发展生产，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第三，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努力增加生产队的收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论是生产还是分配，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满足劳动人民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而满足需要的根本途径是增加收入。决定生产队收入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劳动量的增加。社会财富是我们劳动人民创造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参加生产的劳力越多，生产出来的产品就越多，总收入也就会相应地增加。因此，生产队应该组织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参加劳动。对于男女劳力和半劳力，都要根据实际情况，经过民主评议，规定每人应该完成的基本劳动日。（二）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就是指劳动者生产的效率。在一定时间里，完成的工作任务和创造的产品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收入也就越大。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是劳动者的革命干劲，熟练程度、耕作技术、生产组织形式和生产工具好坏等。因此，生产队应该坚持政治挂帅，努力提高社员的耕作技术，实行科学种田，改善经营管理，改进生产工具。（三）生产资料的节约。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的使用越节约，生产费用就越少，生产成本就越低，总收入中的积累部分和社员分配部分就越大。因此，我们要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对各种农机具、大牲畜要精心管理，对种

籽、化肥、农药要节约使用，尽可能节省一切开支。

要狠狠抓分配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之流鼓吹“分光吃尽”的反动谬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斜路上去。”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上，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我们一定要狠狠抓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个纲，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之流鼓吹“分光吃尽”的反动谬论，否则，就分配搞分配，就必然迷失方向，走到斜路上去。

大叛徒刘少奇出于他反革命的需要，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在分配领域，他极力反对社会主义积累，鼓吹什么，社会主义就是要“多分一点”、“多拿一点”。叛徒林彪则故意抹煞社会主义积累同资本主义积累的本质区别，诬蔑我们是什么“‘国富’民穷”，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积累是“变相剥削”。这帮家伙用的语言虽然不同，但他们的主张却是一个，就是“分光吃尽”。如果照他们的主张去办，社会生产就无法进行下去，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就会瓦解，劳动人民就不能继续生存。

我们都应该知道，人是一天也不能停止消费的。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消费需要，生产必须不间断地进行下去。生产按原有规模进行下去叫简单再生产；生产按扩大规模进行下去叫扩大再生产。社会要前进，生产就要不断地扩大下去。而生产要不断地扩大下去，就必须不断地从社会总产品中实行扣除，以增加社会积累。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如果把全部社会产品“分光吃尽”，不仅不能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整个社会生产就会停止。我们农村的生产队也是同样，如果把社员们全年创造的总产品一下子“分光吃尽”，生产队下一年的生产就无法进行，生产队集体经济就会因此而垮台。可见，“分光吃尽”的后果是严重的。

刘少奇、林彪之流鼓吹的“分光吃尽”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而是从老机会主义分子拉萨尔那里拣来的破烂货。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分子拉萨尔就叫嚷什么，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领取“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或“全部的劳动产品”。我们在政治夜校里学过《哥达纲领批判》，都知道马克思在这本书里深刻地批判了拉萨尔的这种反动谬论，针锋相对地指出，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所得也还是“有折有扣的”。怎么扣法，马克思在这本书里讲的很详细具体，我们前面已提到了，这里不再重复。

刘少奇、林彪之流步老机会主义分子拉萨尔的后尘，鼓吹“分光吃尽”的反动谬论，其用心是十分险恶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取消社会主义积累，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目前，在我们农村的一些生产队，由于受刘少奇、林彪之流鼓吹“分光吃尽”的影响，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上，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还存在着“只顾个人一头”和“只顾当年红”的现象。有的生产队不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

积累，而是想方设法压低和不留积累，甚至有的社队为了少留多分，竟虚打冒分，分掉积累，结果使积累成了虚数，账上有数，而实际无钱无物，严重地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所以，我们还必须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之流鼓吹“分光吃尽”的反动谬论，肃清其影响，以保证集体经济健康地迅速地向前发展。

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正确解决超支欠款问题。所谓超支欠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角债”。这个问题在我们大队的一些生产队里，由于超支欠款户数多、数额大，造成了分配不能兑现，甚至挖空了集体积累，分掉了国家贷款，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群众集体生产积极性，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造成超支欠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阶级敌人的煽动和资本主义思想对某些干部的侵蚀。具体说可分为四种情况：一种好吃懒做，“靠社会、吃集体”的。他们不积极参加集体劳动，有钱就吃喝，到秋照样分柴分粮，造成欠款；二种是“花钱靠自己，吃粮靠集体”的。他们当中有两类人，一类是职工干部，工资自己花，领粮不交款；一类是几匠外出单干，挣钱不交队，这些人往往是“家里有存款，队里欠着钱”；三种是干部借职权之便，抱着“上台捞一把，下台也够本”的思想，多吃多占，多借多欠；四种是家庭人口多劳力少，或因长期闹病，生活确有困难，不得不超支欠款。在上述四种情况中，前三种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有意挖社会主义的墙脚，都是农村“三两斗争”的表现。因此，解决超支欠款问题，必须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向干部社员进行爱国家、爱集体的教育，克服“超支有理，还款吃亏”的思想，对超支欠款区别情况，认真清理，正确解决。

第六讲 正确理解和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上一讲谈的是生产队总收入的分配，这一讲谈谈社员个人消费品分配。

毛主席最近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是我们正确理解“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钥匙，是我们正确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指针。

目前，在我们农村生产队，社员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也和全国一样，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正确理解和实行这个原则，对于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加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阶级和阶级对立以来的几千年里，实行的都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

分配制度。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直接占有生产者——奴隶。奴隶们在奴隶主的棍棒和皮鞭下劳动，劳动的全部产品归奴隶主占有和支配。奴隶主用少得可怜的一部分消费资料来维持奴隶的生命，目的只是使奴隶象牛马一样能继续为他们劳动，在封建社会，农村里的土地、耕畜等一切生产资料，绝大部分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广大农民根本没有生产资料，或者有点也不多。无地、少地的农民，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不得不去给地主、富农扛活，或租种地主、富农的土地。租地种的农民，拚死拚活地劳动一年，要把收获的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交给地主、富农。给地主、富农扛活的农民所得的工钱，很难维持他本人和家庭的极其低下的生活。他们创造的绝大部分产品，被地主、富农无偿地占有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家掌握着全部生产资料，工人除了劳动力而外一无所有，所以不得不到资本家的工厂里去做工。工人辛勤劳动创造的全部产品，绝大部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而工人获得的一点微薄的工资，连维持自己和家庭生活所必需的那一小部分消费资料也买不来。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在以前的阶级社会里，实行的都是“劳而不获，获而不劳”的分配制度。这种制度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是极端不平等，不公平的。它使少数剥削者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广大劳动人民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造成严重的阶级对立和生产停滞，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劳动人民创造的产品都归劳动人民所有，按照有利于劳动人民利益的原则进行分配，并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上，实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它根本否定了几千年来阶级社会的“劳而不获，获而不劳”的人剥削人分配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分配制度的一次深刻革命和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从此，任何人都再也不能靠着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去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了。每个劳动者只要尽力地为社会劳动，社会就能按照他提供的劳动多少和好坏，分给他相当的消费资料。这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同工同酬的“按劳分配”制度，对于树立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肃清“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思想，克服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恶习，调动人们为社会而劳动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都有积极作用。因此，“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同历史上一切分配制度相比，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是从未有过的平等，从未有过的合理。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分配原则。我们说“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平等和合理，是跟旧社会相比，如果跟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相比，它又是不平等，不合理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条件实行“按需分配”原则。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分配原则，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随意选择和确定的，而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并受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制约。社会主义社会只具备实行“按劳分配”的条件，还不具备实行“按需分配”的条件。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很高。社会主义社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给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建国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生产，较解放前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产品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因为我国原来是一个“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国家，并且刚从旧社会脱胎出来不久，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

是较低的，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也还不可能提供极其丰富的产品，充分满足全社会成员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实行“按劳分配”，不能实行“按需分配”。

第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仍然存在，劳动者之间还存在着技术、文化水平和劳动能力上的差别。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和差别，造成了各个劳动者能够向社会提供的劳动在数量和质量上还有相当的差别。这些差别只能逐步缩小，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灭。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以劳动为尺子分配消费资料，就是承认这些差别。如果一律拉平进行分配，势必挫伤相当一部分人的劳动积极性，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第三，适应人们的思想水平。解放以来，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劳动人民经过各项政治运动，思想政治觉悟已有很大提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但是，劳动对大多数人来说，还被看作是谋生的手段，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就是说，还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能够自觉地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忘我的劳动。由于剥削阶级“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等丑恶思想的侵蚀和影响，还没有人人都树立起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这就决定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不能实行“按需分配”，而必须实行“按劳分配”。

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基础和条件，决定我们在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正象马克思所说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刘少奇一伙为了破坏人民公社化运动，复辟资本主义，曾大刮“共产风”，鼓吹“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否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毛主席及时地识破了他们的阴谋，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批判了他们制造的谬论。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的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就会妨害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

必须限制“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

“按劳分配”中的“平等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虽然我们还必须坚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它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就是说，它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范围。这是因为，按劳动量来分配消费资料，用劳动作为同一的尺度来计量，还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并没有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就拿我们社员来说，每个人的劳动能力是不同的，有的体力强些，有的体力弱些；有的劳动技能高一些，有的劳动技能低一些。体力强，劳动技能高的社员，他就可能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量，或者可以比别人从事较长时间的劳动。体力弱、劳动技能低的社员则做不到这一点。这样，由于各个不同的社员为社会提

供的劳动量实际上不等，因而，他们从社会领到的消费资料也就不等。体力强、劳动技能高的社员，从社会领取的消费资料就多些，而体力弱、劳动技能低的劳动者从社会领取的消费资料就要少些。再说，每个社员的家庭成员和负担也不同，有的已经结婚，有的则没有；有的家庭人口较多，负担较重，有的则家庭人口较少，负担较轻。这样，家庭人口多、负担较重的社员，即使他提供的劳动量和别人一样，他家庭每人平均所得到的消费资料也要比别人少些。就拿我们治江三队两户社员来说，他们两家都是两个劳力，每年收入基本上一样多，但一家是七口人，一家是三口人，结果两家的生活水平大不一样，前者生活较困难，后者生活很富裕。因此，用同一把尺子——劳动来衡量不同的劳动者，事实上就不平等了，这种不平等虽然与旧社会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不平等是根本不同的，但是，它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限制“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 我们对“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采取什么态度，是限制它，还是扩大它，这是关系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巩固的大问题。我们农村有的队干部利用职权，过高地规定自己的劳动报酬，甚至占取集体的财物；有的担任一点职务就脱产，但取得的报酬却高于上等劳力；有的木匠、泥瓦匠等不执行上级的规定，凭着自己对某些技术的垄断，索取比农业劳力高几倍的收入；有的生产队在农忙季节大搞包工和工分刺激，以“多劳就该多得”为名，扩大工分等级。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我们要知道，“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是社会主义社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对它不加以限制，任其扩大，必然造成两极分化，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这样，少数人就会利用资产阶级法权，打着合法的招牌，采用非法的手段，侵占国家或集体的财产和产品，积聚起大量的货币和商品，把它们转化为资本，或者放高利贷，或者开设地下工厂，或者进行投机倒把，去从事剥削他人的罪恶活动，成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新富农。这种现象如果大量产生并发展下去，就会出现不劳而获的特权阶层，就会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改变社会主义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旧社会那种广大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情景，就会重新出现。苏联由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苏联所以变修，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扩大了“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在苏联，高工资和低工资相差几十倍，甚至上百倍。除工资外，还有高奖励、高津贴，高稿酬。结果，出现了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他们剥削、压迫广大劳动人民，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了资本主义。这个深刻的教训，我们应该记取。

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是限制还是扩大，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刘少奇一伙大肆推行“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多劳多得”作为调动群众劳动积极性的“动力”，极力扩大“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胡说什么“干劲是从物质刺激中来的”，“不加点钱，生产积极性不高”。林彪一伙也鼓吹什么“利己，多欲，乃规律”。他们用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腐蚀我们广大农民，企图用工分和金钱来“刺激”我们的劳动积极性，就是妄图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年做多少分
底分量，即生的准，均三刘挂这命能道上生狠尽它限的头

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一再号召，任何工作都要政治挂帅，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并且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和国家提倡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制定了一些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规定和措施，这些都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冲击和限制，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斗争的实质，就是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自觉限制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战士。

坚持政治挂帅，正确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破除雇佣劳动观念，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 对“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要全面理解，正确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绝对不能把“各尽所能”，同“按劳分配”割裂开来。实行这个原则，首先要做到“各尽所能”，就是要求每个劳动者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社会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多出力、多流汗，多做贡献。而后，社会才根据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情况分配消费资料，那种不讲“各尽所能”，只片面强调“按劳分配”，甚至说什么“按酬付劳”，是对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一种歪曲，是十分错误的。因此，我们要正确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必须坚持政治挂帅，破除雇佣劳动观念，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

什么是共产主义的劳动呢？列宁说：“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种产品的权力，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这种自愿的、无定额的，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在我们广大农民中间已经出现一些，我们要热情支持，大力发扬。但也有些人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是单纯为了挣分、挣钱。因此，他们“给多少钱干多少活”“分多多干，分少少干，无分不干”，这种“按酬付劳”的劳动态度，就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观念，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的表现，与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是根本对立的。正如列宁所说：“做事就是为了拿钱——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有了这种思想，就不能尽其所能地劳动，或者是藏奸取巧，或者是出工不出力，甚至“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我们一定要克服这种雇佣劳动观念，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为革命种好田，大干社会主义，为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创造条件。

认真搞好评工记分，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和“工分挂帅” 在我们农村生产队，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因为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所以可以按照党的政策自己直接组织分配，并且分配一般都在年终进行。怎样进行这种分配呢？采取的具体形式是工分制。工分，是衡量我们社员在生产队劳动消耗的尺度，同时也是我们从生产队分得劳动报酬的尺度。一个社员从生产队分得多少收入，除了决定于他一

年做的工分多少之外，还取决于每个工分值。而每个工分值，是生产队根据全年的收益多少，做了各项必要扣除之后确定的。每个工分值确定之后，工分多，分配的就多；工分少，分配的就少。所以，要实行好“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一定要认真搞好评工记分。

所谓评工记分，就是根据社员的体力强弱和技术高低，划分出不同的等级，按级定出底分。社员参加劳动之后，根据其劳动态度和分级评定的底分，参照社员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评定工分。这种评工记分的方法，叫“底分活评”。也有些生产队实行定额记分，即生产队根据农活的轻重、技术高低、辛苦程度、在生产上的重要性和季节差别，确定合理的劳动定额和工分标准。社员完成劳动定额规定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可按定额的工分标准，算出应得劳动工分。无论采取哪种记分方法，都要坚持政治挂帅，既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工分挂帅”。当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农村有些社队干部，由于受刘少奇、林彪一伙“物质刺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不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而是靠工分来调动。这样做，必然使一些社员为工分而劳动，劳动求量不求质，追求高工分。工分高时拼命干，工分少时一边站。用工分调动起来的积极性，决不会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只能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积极性，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工分挂帅”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原则，危害性是很大的。它不仅腐蚀了广大社员的思想，而且扩大了分配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助长了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阻碍集体经济的发展，甚至会瓦解生产资料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所以我们农村社队干部，必须提高思想政治路线觉悟，狠批刘少奇、林彪一伙鼓吹的“工分挂帅”的反动谬论，肃清其流毒。

总而言之，我们一定要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为指南，辩证地看待“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既要看到它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有积极作用，还要坚持实行它，又要看到它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有很大的“弊病”，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使它在我们农村得到正确的贯彻实行，不致于犯“左”或“右”的错误。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第七讲 利用商品制度的积极作用限制它的消极作用

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懂商品制度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弄清商品制度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明确我们贫下中农对商品制度应取的态度，对于我们坚持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方向，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商品制度就是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制度

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毛主席所说的商品制度，就是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制度。为了弄清楚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制度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商品和货币发展的历史有所了解。

商品，就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生产，就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的产品生产。譬如我们生产队生产的农副产品，收成后卖给国家，就是商品，这部分产品的生产就属于商品生产。我们劳动人民生产的物质财富，即劳动产品，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为交换或出卖而生产的商品。在原始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共同劳动所获得的产品，直接分配给氏族成员，全部消费掉了，没有什么可以用来交换的东西，因而那时没有商品和商品生产。到了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畜牧业和农业分离了，生产的东西多了些，出现了剩余产品，于是在游牧部落和农业部落之间，出现了相互交换剩余产品的事情，也就是出现了商品交换。不过，当时人们还不是为了交换而生产，仅仅是拿多余的产品来交换。社会再往前发展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发生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手工业又和农业分离了。这时，社会生产力不仅更高一些了，有了更多的剩余产品，而且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成了人们的专门职业，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私有制度出现了。这样，不仅有了更多更大范围的商品交换，而且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

因此，我们可以说，从历史上看，产生商品生产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分工，一个是劳动产品归不同集团或个人所有。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产生的社会前提。因为在社会分工的情况下，每个集团或个人只生产某一类产品，如有的氏族或个人只养牲畜，有的只种植粮食，有的人专门制作铁器或陶器，这就不能不相互交换产品，互通有无，以满足生活的多方面需要。劳动产品归不同集团或个人所有，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产生的经济基础。因为只有劳动产品归不同集团和个人所有，他们之间相互交换劳动产品才不能不计报酬和不计价值，必须实行等价交换。总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是开天辟地就有的。

货币也是一样，它比商品交换出现得还晚，它是商品交换发展的结果。最初的商品交换，是以物易物的直接交换。但是，以物易物的交换有许多困难。例如，张三想用一头牛换李四的粮食，可李四并不需要牛，而是想用粮食换布匹，这就难以成交了。如果张三想用一头牛同时换粮食、布匹、食盐等几样东西，那就难以找到“对口”的交换对象了。这种交换上的困难，随着交换的扩大越来越突出。要解决这个困难，就需要有一种大家普遍接受的、都愿意跟它交换的特殊商品，专门起着交换的媒介作用。于是，这种特殊商品——货币出现了。货币本身也是劳动产品，例如，最初牲畜、粮食、兽皮、贝壳、布帛等，都作过货币的材料，后来逐渐固定到金银上。金银作为货币是很合适的，体积小，价值大，分割大小都行，因此它很自然地担负起货币的角色。由于货币在交换过程中长期使用，不断磨损，它所代表的价值量渐渐地与它本身的重量不符合了，但人

们还有照样承认它的价值，这就产生了一种可能，只要用一种社会公认的东西就可以代替金银充当货币，于是就产生了纸币。纸币是金属货币的代表，是由国家发行并且在市场上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它本身没有多大价值，但只要用它能买到与票面额价值相等的商品，人们也就信任它了。货币出现以后，交换就方便多了。任何商品都可以同货币交换，有了货币就可以买到任何商品。这种通过货币进行的商品交换，就叫货币交换。

商品生产对剥削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以后，对原始公社公有制起了很大的瓦解作用。恩格斯说：商品和货币“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最初的商品交换是在氏族公社之间，以集体为单位，由他们的氏族首领为代表进行的，交换的东西是公共财产。但是，随着交换的扩大，氏族首领利用自己的权力，逐渐地把经手交换来的公共财产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了。后来，交换渗入到氏族内部，氏族的各个成员也把自己的产品当作私有财产来交换了。于是，集体劳动被个体劳动所代替，公共财产被私有财产所代替，氏族组织被独立谋生的个体家庭所代替，原始公社制度瓦解了，商品和货币越来越变成了少数剥削阶级剥削和搜刮人民的工具。

进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大量商品和货币被集中到奴隶主和封建主手里，变成了他们过花天酒地生活的物质来源和残酷搜刮人民的工具。例如，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利用发行货币搜刮民财，发放高利贷残酷剥削农民。但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一直占统治地位，只有一小部分劳动产品是为出卖而生产的商品。而且，这时的商品经济，还是简单商品经济，或叫小商品经济。它的特点是商品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通过自己劳动进行生产，然后出卖自己的产品，再去购买自己生产和生活上所需要的产品。封建社会的小农和手工业者就是如此。这种小商品经济，在封建社会末期，造成了小生产者的阶级分化，产生了最初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革命导师列宁说：“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在封建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瓦解了，农民从封建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手工业者从封建行会中解放出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了为市场生产的独立小商品生产者。这些小商品生产者，在不断扩大的市场上，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他们由于生产条件、熟练程度的不同，生产各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同种商品在市场上只能按同样的价钱出卖。这样一来，生产条件好的生产者就赚了钱，生产条件差的生产者就赔了本，从而引起了小生产者的两极分化：大多数生产者贫困破产，变成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少数生产者则发财致富，积累了资本，雇工剥削，变成资本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发展到了顶点。这时不仅一切劳动产品都成了商品，就连工人农民的劳动力也变成了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甚至象马克思说的：“本身不是商品的东西，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拿去交换货币”了，到处由买卖原则支配着。这时的商品经济的特点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一无所有，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替资本家生产商品，受

资本家剥削。所以，劳动力变成商品，标志着由简单商品生产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质的变化，体现着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必须实行商品制度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实行商品制度。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是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的否定，但它还是刚刚从旧社会的基地上建立起来的，还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消除旧社会的痕迹。商品制度就属于这种痕迹。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还不很高，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不同所有者的情况还存在，因而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经济基础。从我们农村的角度来说，实行商品制度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工业生产主要由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经营，而农业生产主要由我们集体所有制的农村人民公社经营。为了保障工业生产和城市居民生活的需要，必须从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取得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为了满足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需要，又必须从国营经济取得农业生产资料和日用工业品。这就是说，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和我们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经济之间，需要相互交换劳动产品。但是，它们代表着不同所有者，国营经济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属于由国家代表的全体劳动人民所有，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属于一部分劳动群众所有，两者之间都不能无偿地调拨对方的产品，只能通过商品交换进行。例如，国家除了按政策规定向我们生产队征收农业税和由于特殊情况国家给予生产队一些无偿支援外，生产队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是以统购、收购的形式卖给国家的，生产队从国营企业取得的农机具、化肥、农药以及其他工业品，也都是花钱买来的。

第二，现阶段的农村人民公社，一般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都是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这三级所有制之间以及同级所有制之间，除了公社和大队按政策规定可以从生产队提取一定数量的公积金外，也不能实行“一平二调”，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只能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

第三，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还需要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产品属于社员所有。这部分产品，社员除满足自己的需要外，剩余部分可以支援国家和在社员之间交换，这也只能通过商品交换来进行。

第四，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也要采取商品的形式。例如我们社员劳动工分所得，秋后是以货币来计算和支付的。社员的货币收入，一部分用于支付从生产队分得的口粮，柴草及其他农副产品，一部分则拿到商店去购买自己需要的日用工业品。

商品制度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积极作用的。我国生产的商品，我们集体经济给国家提供的商品粮和经济作物，不是多了，而是还不够多，不够丰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统帅下，在国家计划的统一领导下，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对于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两种形式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支援和

协作的关系，对于巩固工农联盟，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满足和丰富人民的生活需要，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限制商品制度，是限制商品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法权，限制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限制商品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并不是要缩小商品的生产量，降低农村集体经济的商品率。今后，我们还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向，根据党的政策，有领导，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生产，组织好城乡交流和物资供应。那种认为我国现阶段就可以削弱甚至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看法，是根本错误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商品制度是农村滋长资本主义倾向的土壤和条件

商品制度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 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商品制度虽然是必要的，有积极作用的，但它毕竟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是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正象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针对苏联的经济情况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其根本原因，就是商品制度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

不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都必须遵循一个共同的原则，即等价交换原则。这个表面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原则，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为了说清这个道理，我们对商品交换再作点分析：

上面已经说过，商品是用于交换或出卖的产品。商品要出卖，它就有两种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所谓使用价值，就是商品的有用性，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如粮食可充饥，衣服能保暖，否则是没有人买它的。但光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还不是商品，如阳光和空气也都有使用价值，可它们不是劳动创造的，所以还不是商品；即便是劳动产品，如果不是为交换而生产的，也不属于商品，例如我们自种自食的蔬菜，自做自穿的衣服等，就不是商品。商品必须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那么，商品是千差万别，各有各的用处，它们是根据什么进行交换的呢？原来，各种各样的商品中都有一个共同的，能相互比较的东西，这就是生产它们的时候都耗费了人的劳动。这种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就是商品的价值。譬如，一把斧子能换一双鞋，就是在生产它们时都花费了一样多的劳动，在价值上是相等的。

商品的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商品的价值是大是小，就决定于生产这个商品花费的劳动时间是长是短。生产一种商品的劳动时间越长，所耗费的劳动越多，这种商品的价值就越大。但是，不同的人生产同一种商品，花费的劳动时间往往不是相同的。例如，有人使用的工具比较先进，技术比较熟练，体力比较强，两个小时可以生产一把斧子；有人使用的工具比较落后，技术比较生疏，体力比较弱，四个小时才能生产一把斧子。那

么，一把斧子的价值，是按哪一种劳动时间来确定呢？商品的价值并不决定于每个生产者自己花费的劳动时间，即不决定于个别劳动时间，而是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说：“社会必需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假定，在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按照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制造一把斧子需要耗费劳动三小时，这三小时就是一把斧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三小时决定一把斧子的价值量。这就是说，制造一把斧子不管你花费了两小时，还是花费四小时，在出卖时都承认是花费了三小时。

我们懂得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两重性，又懂得了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我们就可以明白商品交换中的等价原则是资产阶级法权了。大家知道，资产阶级法权的基本特征，是用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等价原则就是承认同样质量的商品卖同样的价钱，例如同样质量的斧子，不管是谁生产的，在商店里的价格是一样的，这从表面上或形式上看是平等的。但是，生产斧子的工厂和劳动者，由于生产条件，技术设备，熟练程度等不同，生产同一把斧子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是不同的，而被社会承认的劳动时间是相同的，就必然产生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就是商品制度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对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如果不加以限制，就要产生贫富差别和阶级分化，就要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要批判和防止从商品制度中滋长资本主义倾向 由于商品制度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就会有人利用它或受它侵蚀，自觉不自觉地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就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来说，从商品制度中滋生的资本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使一些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生产队，产生自由种植，重钱轻粮和弃农经商的倾向。

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是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说二者相互统一，是因为二者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缺一就不是商品；说二者相互矛盾，是因为二者互相排斥，生产者只是为了自己取得价值才给别人生产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被人接受才能实现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的主要表现，是资本家的工厂企业为了追求利润，也就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它们是什么卖的快，什么利润大，就生产什么，从不关心使用价值，甚至不惜采取弄虚作假、粗制滥造等手段欺骗消费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不是为了追求利润，因而它最注重的是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但是，由于实行商品制度，对于生产队来说，产值的多少直接关系到集体和社员的收入。因此，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生产队为了追求产值，增加收入，不认真执行“以粮为纲”的方针和国家规定的种植计划，大搞自由种植，多种价钱高，收入大的作物，有的甚至走上弃农经商的道路，在农忙季节仍派出大车拉脚，要钱不要粮，发展下去就会把生产队变成了“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

第二，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矛盾，使生产队之间产生贫富差别和在社员之间发生阶级分化。

上面谈到，商品价值的大小，不是决定于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而是决定于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我们每个生产队，在生产条件方面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土地好些，机具多些，车马壮些；有的则土地差些，机具少些，车马弱些。条件好的队，生产某些农产品时所花的劳动时间就会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条件差的队所花的劳动时间就会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它们的农产品是按同一个价格出售的。这样，条件好的队比较条件差的队收入就高，底子就厚，社员就富。社员个个经营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这种贫富差别如果不断扩大，就会引起阶级分化，产生资产阶级。例如在农村就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收入低的生产队社员向收入高的生产队社员借粮、借钱，而富队社员中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就乘机抬粮放债，进行高利贷剥削，造成贫者更贫，富者更富。

第三，价值和价格的矛盾，是农村产生投机倒把分子的重要条件。

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按照它们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这在政治经济学上叫价值规律。价值是在交换中通过货币表现出来的。价值用货币来表现就叫价格。价值规律通过价格经常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是说，价格和价值在交换中是经常不一致的。这是因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生产是盲目无政府的，商品经常是处于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的状态。当供过于求时商品就要落价，也就是说价格就要低于价值；当供不应求时，商品就要涨价，也就是说价格就要高于价值。这种物价的涨落就是价格与价值矛盾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些投机商就是利用这种价值与价格的矛盾，大搞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损人利己，大发横财。在社会主义社会，绝大部分商品由国家掌握着，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是由国家统一计划规定的，商品价格不能自发地涨落。但是，国家还要利用价值规律，通过价格政策来调节社会生产和消费。如有的商品价格定的高些，特别是农村还存在集市贸易，在这里供求关系起着重要作用，商品价格经常涨落，并与国营商品存在着差价。一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利用商品的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国营商品和集市商品的差价，以及集市商品价格的涨落，通过在这个地区买到那个地区卖，在这个季节买到那个季节卖，在国营商店里买到黑市上卖，在商品多时买到商品缺时卖等手段，进行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变成不劳而获的新资产阶级分子。

第四，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和社会财富的代表，使一些人能够把它变为剥削人的手段。

在商品制度下，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说，货币可以代表或换来任何商品，可以转化为社会财富。谁有货币，谁就能得到商品；货币越多，占有的社会财富越多。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能够购买一切，支配一切，谁掌握的货币越多，谁的财富和权力就越大，货币放出去就可以生息，可以转化为剥削人的资本。所以在资产阶级的眼里，“金钱万能”，“钱能通神”，为了追求金钱，他们什么罪恶勾当都干得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所有制变更了，发行和管理货币的大权掌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手里，货币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有力工具。但是，既然在分配和交换方面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货币仍旧是一般等价物和社会财富的代表，反映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意识形态还散发着臭气，毒害着人们的思想，那些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和想发财致富的人，就会

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货币，并且又能把它转化为高利贷资本，变成剥削他人的工具。

第五，商品交换原则侵蚀到政治生活中，使一部分党员、干部、青年被“资产风”刮倒，被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打中，甚至蜕化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商品交换原则侵蚀到党内生活和政治生活，就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在农村中，有的人象资本家一样，把一切都当作商品。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他们不顾党的路线和政策，拿党的原则做交易，甚至敌我不分，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打中，他们“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利用职权方便化公为私，贪污盗窃，多吃多占，接受贿赂，走后门等等，逐渐蜕化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实践告诉我们：如何对待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制度，是关系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非问题。商品制度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这就决定我们对商品制度必须采取既要肯定又要限制的态度。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在党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等方针、原则指导下‘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多给国家提供商品粮和经济作物，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自觉限制商品制度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政治生活和思想意识的侵蚀，批判从商品制度中滋生出来的资本主义倾向，同“资产风”“走后门”等歪风邪气作不调和的斗争。

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出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今天叫嚷“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取消”商品制度，明天又大肆鼓吹“贸易自由”，夸大货币的作用，妄图用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自由价格，自由竞争，代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对于他们这套反动鬼把戏必须揭穿，进行彻底批判。

本期附刊更正如下

页数	行数	正	误	页数	行数	正	误
3	倒17	划	画	11	1	靡	糜
4	22	蜒	蜒	12	26	回	迥
7	倒2	肆	肄	15	12	修正	正修
7	倒7	阶级	级阶	15	倒16	霉	菌
8	倒9	伦	伦	16	8	者效	效者

理论学习

一九七五年第五期

编辑者 理论学习编辑部
(长春吉林大学)

出版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通辽教育印刷厂
总发行处 哲里木盟邮局
订阅处 全国各地邮局

代号 12—18

定价 0.35元